

目 录

- 我们所知达理札雅先生的一生
.....辛文秀、张元尉、张宏达 回忆
辛文秀执笔 (1)
- 关于恩和巴雅尔从事“红党”活动的史料辑要
.....那顺巴雅尔撰写
宝音翻译、整理 (28)
- 抗战时期驻在河套的三位蒙旗女司令
.....宝音德力格尔 (49)
- 袭取包头、会战绥西、五原歼灭战的回忆
——傅作义将军在三战役中的指挥艺术
.....靳书科 (66)
- 塞外硝烟
——忆红格尔图战斗
.....景璞口述 景朝阳整理 (125)
- 朔宁罹难、惨遭浩劫.....周维民 (137)
- 傅作义部进袭中公旗.....王兴亚 (142)
- 冯玉祥将军五原誓师
.....武英士 苏希贤整理 (152)
- 冯玉祥五原誓师前后见闻补遗...李述唐 (170)

- 我在傅作义部三十五军作政治工作的简忆
.....徐秀全(175)
- 河套推行新县制的形势及其人事训练配
备概况.....罗德宗(183)
- 回忆我在狱中和李本洪相处的日子里
.....李敏才(196)
- 临河戒烟所始末.....王廷英(208)
- 禁烟禁赌亲历记.....吴辉生(215)
- 磴口地区的汉族嫁娶婚俗.....朱永丰(219)
- 河套地区解放前汉族丧葬习俗.....居正(234)
- 安北基督教会史略.....董玉奇(243)

我们所知达理札雅先生的一生

辛文秀 张元慰 张宏达回忆

辛文秀执笔

一、青年时期

达理札雅字锐荪，是阿拉善霍硕特旗第十代世袭亲王。一九〇三年即清光绪二十九年农历腊月十二日出生在本旗的定远营（现在的巴彦浩特镇）王府。父为塔旺布理甲拉，母名姜静德，共有兄弟姊妹四人，二弟达都拉旺希格，三弟达穆林旺楚克，妹名塔祉华。

达理札雅的幼年时代，是以阿拉善霍硕特旗亲王的大阿哥身份度过的。其母太福晋（夫人）姜氏，出自名门，知书识礼，并且教子甚严，他在慈母的管教下成长。并在王公贵族家庭的熏陶下养成了浓厚的道德伦理观念，对父母至孝，对弟妹友爱。

当他十四岁时，其父塔旺布理甲拉携眷居住北京。辛亥革命成功，清王朝被推翻，孙中山先

生领导的民主革命政府成立。当时居住在北京的塔王曾积极赞助共和，并出任袁世凯政府的京都翊卫使和蒙藏院总裁等职务。

此时的达理札雅正值少年时期，由于久居北京，因此，生活习惯已完全城市化了，能讲一口流利的北京话。并在北京开始接受教育。先跟汉文老师张煜学习汉文，主要课程为四书、五经等古典书籍。嗣后又从师蒋先生学习英法文，后又跟阿拉善旗蒙文程度很高的俞世珍先生学习蒙文。在老师们的精心教诲和父母的督促指教下，他的学业进步很快，尤其是汉文程度较好，阅读、写作能力大进。

那时的北京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正处于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伟大民主革命的新时代，尤其是在“五四”运动后，欧美各国的进步思潮和科学文化知识传入中国。各方面的先进人物纷纷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各大城市集会结社，建立党派，大力提倡新学，进行革命。当时达理札雅正是青年有为之时，生活在北京那样的社会里，当然也接触了许多新学知识，经常阅读各种报章杂志，广开见闻。并在北京社会上广泛交游，当时的一些社会名流如张学良、于学忠、宋哲元等人都是他的好友。

在同这些人的交往中，极大的丰富了他的社

会阅历，政治视野，人情世故等方面的知识，这给他奠定了从事社会活动的基础。

在思想、性格、情操等方面他也日渐成熟，思想倾向于民主进步。由于他天性孝友，敦厚温和，待下宽厚，平易近人，崇尚节俭，很少有一般贵族子弟的纨绔习气。

在学文化知识的同时，他还兼习骑射，尤其对马匹有着特殊的爱好，曾畜养名马四十余匹，雇用名骑师为其调教训练马匹。他本人的骑马技术是很精良的，经常带领下属及侍卫人员，到郊外跑马射击。他还有另一爱好照像。大公报的名记者范长江在他的《中国的西北角》一书中曾写道：“骑马、打枪、照像，是达理札雅的三大爱好”。

随着年令的增长，他已到了结婚年纪，于是和晚清皇室近支贝勒载涛之女金允诚婚配，婚后伉俪情笃，相敬如宾，先后生下六女一子。

在此期间，却发生了不幸事故：一九三一年春，他二弟达都拉旺希格在北京死于车祸，弟媳服毒殉节。其父塔王悲痛爱子夭亡，积郁成疾，也于同年七月谢世！

塔王逝世后，当即呈报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和蒙藏委员会。旋即由国民政府行政院按蒙旗惯例，正式任命达理札雅继承父职，为阿拉善霍硕

特旗礼萨克。他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在北京府邸就职，当时，曾受到北京有关方面的大员及友好人士的庆贺。

二、袭位以后的事迹

阿拉善旗地处祖国西北边陲，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全旗土地面积十二万多平方公里。境内有广阔的牧场；有丰富的煤、盐、硝等矿产资源；还有名贵的药材。惟因地处荒漠高原，人烟稀少，风沙大，雨量少，是一个十年九旱的地方。加之以地方偏僻，交通闭塞，与外界很少往来，因而，文化知识不高，牧业生产落后，牧民们除负担衙门征收的包道税和差役外，还要受寺庙和“边客”即流动商人的剥削。一旦遇到大旱之年，牲畜死亡，粮食短缺，牧民群众只能挣扎在饥饿线上。

民国初年，因老王爷塔旺布理甲拉，在北洋政府供职，长住北京。旗内政务委托当时的协理，章京及几个有声望的贵族台吉管理。除遇重大事件，派员赴北京请示外，一般事务只是照章行事。但时间一长，便产生了矛盾。加上受到国内军阀混战的影响，有些人为了争权夺利，各自为政，互不团结，发生磨擦。在塔王离开阿拉善旗近二十年内，曾连续发生过多起武装内乱，如

清宣统三年的“哥老会事件”，民国十六年的“小三爷事件”，“南寺活佛和毛巴图尔事件”等。这些武装变乱，造成阿拉善旗政治上群龙无首，四分五裂，动荡不安的局面，加之连年干旱，致使牧业生产遭受极大的破坏。在这种天灾人祸的侵袭下，全旗牧民的生活更加困难。

达理札雅正是在这种严重时刻，承袭阿拉善旗札萨克职务的。在这种局势面前，达理札雅并没有畏难退缩。而是以继承祖宗基业，造福于全旗牧民群众的远大理想，毅然肩负起阿拉善霍硕特旗札萨克职务。他首先团结旗内各巴格的上层人物和贵族台吉，在取得他们的支持后，又采取了一系列革新措施，使得阿拉善旗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安定团结，牧业兴旺的局面。其具体措施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政治方面：蒙旗的政治制度一直是沿用清朝时代的王公制度，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是不可能一下子彻底改变的。因此，在国民党统治时，国民政府除按着旧制只任命一个札萨克执掌旗政外，对旗内具体军政事务则不予过问，蒙旗享有一定的自治权利。

当达理札雅担任札萨克后，虽然锐意革新，但也局限于历史条件，不可能完全废除王公制度。他采用的是折中办法，保留了部份旧制度，

也采用了一些新办法。首先撤销了旧衙门（也称印房），成立了新的阿拉善霍硕特旗政府。他任札萨克，札萨克下设正副两个协理为札萨克的助手，协助札萨克处理全旗军政事务。协理之下设管旗章京数人，为行政事务的执行者。以下设立具体办事机构，计有四个处，即政务处，财政处，秘书处，教育处。司法方面，将旧有的听差处也叫堆子，改为理事官厅。在定远营城内设立了综合性的机构，即阿拉善霍硕特旗定远营稽查局。用以处理汉回族等居民和商人的行政事宜，并办理警务和地方税收工作。

旗以下划分为三十六个巴格（相当于乡），管理牧区地方行政事务。又在与边界发生事务较多的磴口、四坝、奴尔盖等地设立三个总管公署，处理汉民和过往商旅的一般事务。

人事上，选拔了一批有声望，有资力而又具有一定工作能力和文化知识的中青年人士进入旗政府任职。如任命罗恩凯巴图和巴图孟柯为正副协理，任命陈爱尔德呢巴图、段巴图尔、白图布巴依尔为管旗章京，任命陈那笋巴图、胡爱立佐巴依尔，黄孟柯艾立佐，李巧格登、左甲木英、金对岱、罗月亭、俞世珍、谢尚德等人为旗政府各处正副主任，任命张仁为理事官厅总管，张元忻为稽查局局长，杨富存为磴口总管，敖其尔为四坝

总管，司乔英为奴尔盖总管。聘用文化高，富有行政经验的汉人担任旗政府秘书长或秘书职务，负责对外交涉和公文往返等事项。

各巴格也都选用正直能干的人担任巴格达木尔（巴格长）和保什哈即付达木尔。这就使旗政府的组织机构及地方组织健全完善，人员充实，提高了工作效率。

在改革政府及地方机构之后，又立即下令废除旧的陈规陋习，如：废除封建的跪拜大礼，在上下老幼之间以及社会交往中，一律实行鞠躬礼，废除奴隶制，裁减王府内伙役，压缩王府内开支，从而减轻了财政负担。

此外，废除乌拉制，旗内的公文传递，公物运送等所需用的骑乘、运输驼只以及费用等，均由公家负担，用以减轻牧民与商户、作坊的负担。

一切公职人员的待遇则仍沿用旧的义务轮换制，上班期间由财政处发给口粮、砖茶等生活用品，其他自理。

接着发布了禁烟、禁赌、禁娼等禁令。严禁盗匪及一切奸宄宵小的不法行为，使全旗各族人民安居乐业。

（二）军事方面：建立了阿拉善霍硕特旗保安大队。这个大队，是在原清朝政府颁令建立的阿拉善霍硕特旗亲王亲兵马队的基础上改建的。

任命罗曹格图盖立勒为大队长。兵员无定额，沿用历代传下来的寓兵于牧的政策，凡旗内蒙族男性青年年满十八岁的都要服兵役和其他差役。平时大部份人在家放牧或打猎，只有少数士兵在旗政府执行保卫任务和维持地方治安，或供其他方面的差遣。为轮换制，两个月换班一次。如有重大事故需用武力时，一声令下，就可以全旗动员。凡是青壮年都须自带枪马集中待命。新建立的保安大队概仍其旧。只是在武器装备上和士兵待遇上，进行了一些改革。

在武器方面，达理札雅通过他和东北军总司令张学良的私人交情，由张学良给补充了一批武器弹药。然后，由国民党二十五师师长关麟征拨给步枪五百支，轻重机枪和迫击炮若干挺，更换了原来使用的火枪、老套筒等旧式武器，增强了战斗力。

在官兵待遇上，士兵在上班期间除供给原定的军粮四十五斤，砖茶一方，燃料若干和发少数零用钱外，并发给军装。

聘用汉籍教官以新式操法训练士兵，并曾举办了二期军事训练班，受训人数一百多人，培养了骨干力量。

阿拉善旗原在贺兰山各山口及边境周围各重要路口设有边卡四十余处，各派卡长一名，巡兵

若干名，用以防守边界，盘查行人，防范盗贼、土匪等。对这些防卡也进行了整顿，裁汰老弱，任用年青能干的人担任卡长，加强了边防。

（三）财政税收方面：阿拉善旗是以畜牧业生产为主的经济，农业很少，只有在东北部的磴口至四坝一带有农田五万余亩，并有乌拉河、沈家河大渠灌溉之利。是盛产粮食的基地。沿贺兰山各沟口的有水处和定远营城周围也有一些耕地，约万余亩。

由于经常受旱灾的威胁，阿拉善旗牧业生产落后，而磴口一带的农田，在阿拉善旗人民参加义和团反帝运动失败后，三盛公天主堂趁庚子赔款之机，提出赔款要求。经清政府决定，由阿拉善旗赔银五万两。当时阿拉善旗只交出现银二万两，所欠的三万两无力交出，只好用三盛公一带的土地抵偿，收益全被教堂夺去。因而多年来收入很少，入不敷出，左支右绌。

在达理札雅执政后，对这方面也作了不少工作，于一九三五年（民国二十四年），对教案进行清理，与教堂重新订立合同。收回了全部土地所有权，令其向旗政府交纳租粮，充实了府库。

阿拉善旗有号称“聚宝盆”的大小盐湖多处，储量丰富，是人民生活和生产中不可缺少的物质资料，也是地方财源之一。已开采的有吉兰

太、雅布赖、查干布鲁格、和屯敖包等四大盐湖。多年来都是由官商合资的西北盐务局经营开采，年产食盐约数十万担，绝大部份利润均为盐务局所得，阿拉善旗只能收取极少数的池租。对此，达理札雅也采取了措施，他设立了自己的盐务所，派陈爱尔德呢巴图为所长，在吉兰太和屯敖包盐湖经常开采。其它盐湖因资金、人力不足，无力开采，仍由盐务局经营，但对池租作了合理调整，盐务局按年向旗政府交纳。

贺兰山一带煤的储量十分丰富。多年来也是由富户、把头承包开采，从中牟利，而旗上则没有什么收益。因此，达理札雅也对煤矿加以整顿，将产量最大的河拐子即现在的乌达煤矿收回，由旗政府派员经营开采。其它几处较小的如呼鲁斯太、古拉本煤矿，仍以合理租金包给私人开采。

定远营是旗政府所在地，俗称王爷府。近百年来就已经形成集镇，至民国初年已十分繁华，有小北京之称。镇内有大小商号数十家，各种手工业作坊近百家，粮店、旅店十余家，饭馆近十家。商业交易十分活跃。因其地位适中，东可通宁夏、包、绥以至京津等地，南至甘肃的兰州、平凉、张掖、武威和青海的西宁。北至河套。均有驼马大道相通。每到秋冬季节，骆驼起

场后，四方商旅、农牧民云集，进行交易活动，市面一派繁荣景象，是阿拉善旗的主要税源。对这方面采取的措施是，在定远营稽查局内设立税务股、参照邻近各地税收办法，制定合理的税率，向商民征收一定的税金。

由于采取了上述各项得力措施，使阿拉善旗的财政面貌大为改观，收入大大增加。

（四）兴办教育：在达理札雅执政前的阿拉善旗，从来没有过学校，识字的人也非常少。除政府官员一般能粗通文字外，在全旗牧民中有文化的人为数不多。记得在民国初年，只在定远营有三四名蒙汉文塾师，设立私塾授徒；再就是旧印房有达司呼尔即练习生制，选拔旗里青年到衙门学习蒙文，成绩好的可充当下级官吏。除此再无别的教育设施。

在旗政府财政收入增加的基础上，达理札雅立即着手兴办教育事业。民国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在定远营设旗立完全小学一所，内分蒙汉两部份，学制为初小四年，高小二年。任命蒙汉文兼优的公爷塔旺策林为校长，聘用蒙汉文教师教人任教师。所授的课本，汉文是国民党教育部颁行的白话文标准课本，蒙文教材仍用旧本教读。并在王府内设立初级女子小学一所，由福晋金允诚亲自担任校长。其后在定远营又设立了一

所蒙文小学，专收牧区儿童。在磴口设立初级小学一所。这些学校完全是公费。随着学生人数增加，学校逐年都有扩大，教员人数由原来的四、五人，增加到二十余人。还办了一个简易师范班，培养师资。并把本旗高小毕业生保送到兰州中学、兰州师范，宁夏黄渠桥的绥宁师范等中等学校深造，为本旗培养出不少的有用人材。

由于上述各项有力措施的执行，使阿拉善旗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安定团结，齐心协力发展生产的政治局面，初步改变了广大牧民贫穷落后的面貌。加之天公作美，气候转好，风调雨顺，连年普降大雨。在阿拉善旗广阔的草原上，到处牧草生长丰茂，牲畜膘肥体壮，牧业生产不断地获得了大丰收，广大牧区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人欢畜壮的兴旺景象。

为了庆祝丰收，阿拉善旗曾于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秋季，在定远营城东郊贺兰山脚下的大草滩上，举办了一次数十年未曾举办过的盛大的祭敖包大会。在大会上进行了蒙古民族传统的文娱、体育活动。全旗大部份牧民，携带帐篷马匹前来参加。邻近各地商贩也驮载了百货前来赶会。这次盛会历时多日，盛况空前，热闹非凡。也是当时阿拉善旗繁荣兴旺的标志。

三、在抗日战争时期与国民党马鸿逵反动势力周旋抗争经过

正当达理札雅整顿旗务，带领全旗牧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并初步取得成效的时刻，伟大的抗日战争爆发了，阿拉善旗也不可避免的受到抗日战争的影响。首先是国民党加紧对这块边疆要地的控制。他们设立了军事专员办事处；蒙藏委员会也派来协赞专员就近监督，还建立了国民党阿拉善旗特别党部，三青团阿拉善旗分团部，军统、中统等特务机关也建立了秘密组织，进行活动。

对国民党的监督、控制，达理札雅是无法摆脱的，只能以消极态度与之应付、周旋，以期保持阿拉善旗的安宁。

其次是盘踞在宁夏的军阀马鸿逵，早就想把阿拉善旗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以实现其扩张野心。他以近水楼台的优势，打着蒙汉分治的幌子，于民国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强行割去阿拉善旗磴口巴格的大片土地，设立了磴口县。及至抗日战争初期，又在定远营设立了宁夏省政府驻定远营办事处，军警联合督察处。接管了市镇的行政工作，在市区内建立保甲，清查户口，

为其征兵、收税。接着，又派来宁夏省银行办事处，后改为富宁公司办事处；为了镇压阿拉善旗人民，马鸿逵还设立了一个木料场；并派来马宝琳的警备旅，经常驻扎在定远营。从政治、军事、经济各个方面控制了阿拉善旗。

对马鸿逵的这种扩张野心，达理札雅采取的是以抗拒的办法，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如马鸿逵在强行设立磴口县之后，又要在三盛公建造一座城池，此事却遭到阿拉善旗政府的拒绝，并曾使用武力，迫使马鸿逵取消建城打算。

在定远营城镇内，达理札雅也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与之对抗，如：充实了旗稽查局的力量，在稽查局警务股下增设一个四十余人的警察队，在理事官厅增设三十余人的法警队，对保甲长、商会、各手工业行会加以控制，严格禁止保甲长到牧区及定远营城内抓兵。由于达理札雅用这些办法与马家势力抗衡，从而触怒了马鸿逵。民国二十七年初（一九三八年），马鸿逵以三个团的兵力围攻定远营，收缴了旗保安队的全部武器和无线电台。并以莫须有的罪名，强迫达理札雅全家离开旗境，送交兰州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处软禁达七年之久。

同时，马鸿逵对阿拉善旗又使出更加恶毒的手段，他实行粮食封锁，严禁宁夏一带的粮食进

入阿拉善旗，想把阿拉善旗的人民饿死。他的军警联合督察处，在定远营周围各路口设卡日夜巡逻，抓获贩运粮食的商贩、驮户后，人即治罪，车马骆驼，粮食都被充公。造成阿旗境内粮食奇缺，粮价飞涨。广大劳苦大众在饥寒线上挣扎，而一些有势力的官僚，奸商、趁机囤积居奇，大发横财。

当达理札雅全家被软禁在兰州期间，旗内事务则由协理罗恩凯巴图、罗巴图孟柯、章京陈爱尔德呢巴图、段巴图尔、白图布巴依尔（白诚禧）等人主持，他本人虽身在兰州而心怀故土，经常与旗内函电往还，遇有重大事务则派人联系，并指示办法。在被禁的七年中，他与国民党应付，与马鸿逵抗争，终于以忍辱负重，委曲求全的精神，保住了全旗，稳定了牧区，使阿拉善旗没有落入宁夏军阀马鸿逵之手。

趁达理札雅不在旗内之机，马鸿逵又要出花招，他以抗战需要为名，编造出一些毫无根据的理由，呈报国民党中央行政院，要在定远营设立县治，企图将宁夏省政府驻定远营办事处改为县政府，与旗政府对立，造成旗县并存局面。

达理札雅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与罗巴图孟柯等取得联系，以阿拉善旗有史以来就是一个单独的政治实体，从清朝到民国，数百年来都是由中

中央政府领导的特别旗为根据，并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举出充足理由，急向蒙藏委员会和第八战区长官部具文呈报，坚决反对在定远营设县。实际上蒋马之间是有矛盾的，国民党并不希望马鸿逵的势力扩大。在阿拉善旗的呈文报上去之后，经蒙藏委员会慎重考虑，对马鸿逵在定远营设县的报告未予批准。这个阴谋破产了，使马鸿逵大为恼火！曾下令宁夏省政府驻定远营办事处和驻军，把给阿拉善旗起草这份呈文的秘书王克昌抓往银川处置，幸好旗政府早有准备，暗暗派人把王从草地护送到兰州，才幸免于难。

对于达理札雅被软禁的事件，他曾费尽周折，亲赴重庆向国民党当局申辩，并揭露马鸿逵的扩张野心和对他的诬陷。后又经旗内的上层人士罗恩凯巴图、罗巴图孟柯，陈爱尔德呢巴图、段巴图尔、陈那笋巴图、张仁、张元忻等人，联名上书给蒙藏委员会和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申述蒙民对达的深厚民族感情，强烈要求达理札雅回旗执掌旗政，如使他久居兰州，则恐地方生变。这样才迫使蒋马同意让他回旗。于是他于一九四四年八月携眷由兰州回到阿拉善旗，受到旗府官员和广大牧民的热烈欢迎。

此时抗日战争已近尾声，胜利在望。而蒋介石在美帝的支持下，正在准备大打内战，因而对

待达理札雅的办法也有所改变，即由原来的监视、控制，改为拉拢，利用。当时任命他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将銜区防司令部司令等职务。并于一九四六年九月按地方武装编制，给旗武装部队开始发给粮饷、装备，扩充原有的区防司令部机构，下属一个骑兵保安总队，总队下属五个中队，一个通讯分队，一个勤务分队。共有官兵一千三百余人（轮班制）战马一千余匹，骆驼一千五百余峰，作为地方保安团队。

国民党特别党部，三青团分团部，军事专员办事处等机构，此时则加紧进行反共宣传活动，为大打内战制造声势。

但是达理札雅对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政策，并没有积极执行。他所抱的宗旨是继承祖业，保境安民，对国民党则采取消极应付的态度。当时，他在旗内一面操练士兵，保卫地方；一面安抚牧民，加强团结，安心生产。

此时，马鸿逵虽未达到设县目的，但始终未放弃其向阿拉善旗扩张的野心。他积极配合蒋介石的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在定远营大肆抓兵、征税。经常派一个加强营的兵力驻守镇压，使得这一时期的定远营百业凋敝，市面萧条，居民四散逃亡，整个镇内几乎看不到青壮年男子的踪影。当实在无兵可抓时，他们就改用以马代丁

或以驼代丁的办法进行压榨。其办法是：以四匹好马顶一个兵，或四峰骆驼顶一名兵。在这种残酷的压榨下，造成商号倒闭，民不聊生，广大劳动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因此，人民群众对蒋马反动派倒行逆施，祸国殃民的苛政，是恨之入骨的。

时至一九四九年，当全国人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进行的解放战争在全国各战场上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国民党反动政权即将彻底垮台之时，定远营又演出了一场令人发笑的闹剧，那就是以德王为首搞的所谓“蒙古自治”活动。他们经过几个月的上窜下跳，多方活动，于一九四九年七月间，得到逃到广州的国民党行政院院长阎锡山的批准，急急忙忙在定远营组成了蒙古自治政府。在这场闹剧中，达理札雅虽被选为副主席，但内心深处他并不赞同德李一伙的作法，只是因为当时的阿拉善旗还处于各种反动势力的包围之中，迫于形势，不得不虚与委蛇，应付而已。但他的继承祖业，保境安民的宗旨，并未改变。他曾向旗政府官员们表示说：“他们（指德王）失去了地盘，才跑到我们阿拉善旗来搞蒙古自治的，不是我请来的。他们搞的是蒙古自治运动，在这顶大帽子下面我们不能拒绝他们，但是我们也要绝对保持阿拉善旗的独立性，不能让他们插手或干预我们的旗政”。

这时，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节节胜利，势如破竹，国民党军队土崩瓦解。西北重镇兰州就要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进军宁夏，眼看大势已去。顽固到底的德穆楚克栋鲁普、李守信、苏和巴特尔等人，于九月二十日率领残部，匆忙逃出定远营，向中蒙边界的图克木庙、沙尔札、拐子湖一带流窜去了，变成一群流寇，给阿拉善旗北部牧民带来极大的祸害。从此，成立不足两个月的蒙古自治政府便短命夭折。

四、和平起义

当国民党反动派在祖国大陆立足不住，中国人民解放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席卷全国的时候，反动派并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企图利用马鸿逵的残余兵力，组成宁夏兵团，以马鸿逵之次子马敦静为司令，妄想利用贺兰山的天然屏障，设防阻止大西北的解放。为此，特派军令部长徐永昌，从广州飞来宁夏和绥西陕坝，给这一带的残余势力打气，妄想把河套地区的残余反动武力和宁夏马家军撮合在一起，抗拒大西北的解放。

一九四九年七月，徐永昌飞抵银川后，即打电话请达理札雅去银川和他见面。当时达理札雅和白海风及他三弟达穆林旺楚克一同去了银川。及至见面后，徐首先谈了一下当前国内的形势和

宁夏地区军事部署情况，然后，便向达理札雅提出三个问题：第一、关于马家军在贺兰山设防问题，这事至关重要，阿拉善旗必须大力支持，以便贺兰山的防务设施早日建成。第二、关于阿拉善旗骑兵保安总队与德李的新一旅配合问题，必须抓紧进行，以期在贺兰山以北的大草原开展游击战。至于武器弹药以及一切军用物资，可以空运补给。并胡说什么，只要能坚持三年，国军便能反攻回来。第三个问题是徐再三拉拢达理札雅去台湾，并说住在大陆上有危险，人身、财产都不安全。与此同时，马敦静也向达理札雅施加压力，提出要阿拉善旗支援他军马三百匹，全副鞍具的运输骆驼一千峰。

此时，达理札雅的头脑是清醒的、冷静的，他没有被徐永昌的甜言蜜语所迷惑，也没有被马敦静的威胁所屈服。他首先向徐永昌表示决不去广州和台湾。对马敦静的要求，则用拖延应付的办法，以天旱驼马乏力，无法征用为词，推掉了事。

实际上，此时的达理札雅早已在考虑自己的出路问题了。面对现实，自己将如何办？摆在他面前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率领全旗各族人民和平起义，站到人民一边来；另一条是自己携眷外逃，追随国民党反动派到底，走与人民为敌的道

路。何去何从？在选择上他曾感到犹豫、徬徨，有些举棋不定。但在思想上，早已倾向于前一条道路。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中国革命形势的认识，也在不断地发展，达理札雅经过一个阶段的观察与思考，对和平起义，思想上已经有了准备；而政治态度，也日趋明朗。特别是当他听到老朋友张治中将军脱离国民党政府，参加到革命阵营中的消息后，对他的思想启发更大。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兰州进军之际，达理札雅即派区防司令部办公室主任朱门于七月中旬赴兰州与西北野战军取得联系。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六日兰州解放，阿拉善旗代表朱门，随同兰州各界民主人士、起义人员欢迎了西北野战军，晋见了彭德怀司令员，递交了达理札雅的亲笔书。彭总见了高兴地说：“达理札雅先生脱离国民党反动派，站到人民方面的行动，我们表示欢迎。”随后让联络部部长范明转告朱门随十九兵团赴宁夏，早日返回定远营。朱门回来把在兰州欢迎西北野战军的情况和彭德怀司令员的指示，向达理札雅及旗府官们作了详细汇报。大家都是第一次听到共产党的声音，感到亲切、温暖，心中有了底，消除了疑虑。

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在北京

开幕之际，达理札雅于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三日，以阿拉善霍硕特旗札萨克的名义，代表全旗向会议主席毛泽东发去致敬电。电报中说：“我代表阿拉善旗各族人民，热忱拥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并郑重宣布，我旗从此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束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时又分别向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和解放宁夏的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发去了电报，表示热烈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来阿拉善旗。并派出罗瑞光、张光耀、司乌图那笋，翻译蒙太等人星夜前往银川黄河渡口的任春渡，欢迎十九兵团杨得志司令员。杨司令员在会见罗、张等代表时，对阿拉善旗的行动甚表满意，重申了不向阿拉善旗进军的决定，要求蒙旗地方部队，要确保地方治安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并邀请达理札雅在适当的时候来银川会晤，当面商谈阿旗起义后的有关事项。达理札雅遂于十月十一日，亲自前往银川，受到了杨司令员和宁夏省党政军领导人的热情欢迎和盛情款待，使达理札雅深感安慰和鼓舞。经过会谈，达成了有关阿拉善旗和平解放的八条协议。从此，一个完整无缺的阿拉善霍硕特旗，在达理札雅的率领下，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达理札雅的这一爱国的行动，是他一生政治

生活中的重要转折点。他由一个封建王爷，经过许多坎坷曲折的道路，冲破蒋马反动势力的阻挠，终于投入伟大的革命阵营中来，走上了为人民服务的光明大道。他的行动是正义的，难能可贵的，值得为人们称颂。

接着，达理札雅便依据宁夏省委处理阿拉善旗问题的八条意见，着手作好旗政府改组和军队整编的准备工作。

同年十月间，宁夏省党委派云祥生，郭全德带领工作组来到阿旗工作。不久就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阿拉善旗工作委员会，由曹动之任书记，云祥生为副书记。从此，阿拉善旗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展开了民主建政和民主改革工作。

首先根据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原则，于一九五〇年五月，将旧旗政府改组为宁夏省阿拉善旗自治区人民政府，任命达理札雅为主席，罗巴图孟柯等三人为副主席，政府委员有：曹动之、段巴图尔等十六人。由巴文峻担任秘书长。

在旗人民政府下，设置的职能机构有：政务、财政、文教、秘书、生产事业，公安等处局，由胡爱立佐巴依尔等分别担任处局长。另设有人民法厅。基层三十六个巴格也都建立了巴格人民政府。

同时，达理札雅还兼任宁夏省人民政府副主

席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北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

撤消了旗区防司令部，将骑兵保安总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阿拉善旗人民保安总队，任命罗巴图孟柯为总队长，朱子春为政治委员、罗瑞光为副总队长，罗永寿为参谋长。

阿拉善旗自治区人民政府的诞生，它标志着统治阿拉善旗有二百六十三年历史的封建制度的结束。从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全旗各族人民，充分地享受着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

自从阿拉善旗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后，在旗工委的直接领导下，顺利地开展了各项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主要有：在旗与巴格之间，建立了六个苏木公署，成立了党的苏木工委，加强了党对牧区的领导；根据党的政策，规定了牧工的合理报酬，促使牧业生产的大发展；调整了市镇的房租，承认汉族居民有房屋所有权；在农区，实行了土地改革，将旗地、庙地及上层人士的私有土地分给了农民；僧官喇嘛由寺庙自由选举任职；开展抗美援朝活动，全旗共捐献人民币一百六十多万元；根据宪法，实行普选；在达理札雅的带动下，政府官员与富户，自愿献出他们所有的土地分给农民，实现了巴彦浩特地区和沿山四巴格的农业合作；在农

业合作化运动的带动下，又实现了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者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生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基础上，曾于一九五二年七月间，召开了具有重要纪念意义的那达慕大会，用以庆祝阿拉善旗的和平解放。

一九五四年，宁夏省在阿拉善旗，额济纳旗、磴口县之上，设立了巴彦浩特蒙古自治区，达理札雅任主席。同年秋，宁夏省建制撤销，巴彦浩特蒙古自治区划归甘肃省，按宪法规定改称为巴彦浩特蒙古族自治州，达理札雅担任州长，并兼任甘肃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当选为甘肃省第一届人大代表。一九五六年划归内蒙后，又改名为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盟，达理札雅仍任盟长兼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还被选为内蒙古自治区第二、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第一、二、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

达理札雅在担任上述各项重要领导职务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关怀下，他一直忠于职守，勤奋工作，认真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特别是民族政策，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各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同时，也加强了自身的思想改造，刻苦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各种理论书籍，努力钻研，领会其精神实质。

使自己的政治思想和理论水平，有了进一步的提高。逐步改变了旧的思想意识，走上了民主进步、热爱祖国、热爱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道路。

当达理札雅在党的领导下，为内蒙古自治区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争取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努力奋斗的时候，却因年老体弱，患了严重疾病，无法继续工作。他的夫人金允诚也因年老多病，就医治疗，因此，他们夫妇便移居北京，居家休养。

恰在此时，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林彪四人帮及其在内蒙古自治区的追随者，对达理札雅进行种种迫害，终于在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八日死于斗争会上，终年六十四岁。

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生前对达理札雅先生十分关心，曾几次接见过他，并当面教育、鼓励过他。他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热爱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他曾亲自向毛主席、党中央敬献锦旗，以表示自己对党中央、毛主席的忠心。他还关心台湾早日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大业。

可惜的是这样一位蒙古民族中的上层人物，一位具有爱国主义和民主进步思想的人士，竟然遭到林彪四人帮及其一伙反革命极左路线的残酷迫害，含冤去世！不能不使人们痛惜万分！

在党中央正确路线的指引下，粉碎了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以后，落实了政策，达理札雅先生的这一大冤案才得到了彻底纠正。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和自治区人民政府于一九七八年九月二十三日在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为他和夫人金允诚女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对林彪四人帮及其在内蒙古自治区的追随者，强加给达理札雅先生和金允诚女士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统统推倒，为他们夫妇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并对其子女亲属和受株连的其他亲友表示亲切慰问。这充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也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伟大、英明、正确的党，所有这些足可告慰达理札雅先生和金允诚女士在天之灵了。

我们在达理札雅先生身边工作过多年，这篇《我们所知达理札雅先生的一生》，是我们的记忆所得，因限于文化水平，写的很不完全，遗漏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知情者和达理札雅先生的亲属和子女给予批评指正。

关于恩和巴雅尔从事“红党”

活动的史料辑要

那顺巴雅尔撰写 宝音翻译整理

关于恩和巴雅尔从事内蒙古革命活动的情况，是根据他的妻子米德格玛（今年八十一岁）和他生前好友洛布桑旦必扎拉生（今年八十七岁）、阿茹苏布热格庙喇嘛（现年八十岁）以及恩和巴雅尔之子僧格诺如布（现年五十七岁）等人提供的史实材料整理编写的。

在这里，我所写的仅仅是恩和巴雅尔从事革命活动的点滴情况，并不全面。尚希后来撰写恩和巴雅尔革命史的同志们加以补充完善，并切望恩和巴雅尔的革命传略早日问世。

所谓“红党”，是指从事内蒙地区革命活动的革命党人。那时，由于恩和巴雅尔不仅直接同苏联、外蒙古取得了联系，同时他本人又参加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并在1927年8月乌兰巴托召开的“内人党”中央特别会议上，在恩和巴

雅尔本人未参加的情况下，被选为中央委员。因此，人们称他是“红党”恩和巴雅尔。

根据搜集到的史料，我分别把它整理成恩和巴雅尔的少年时期和他的生活；恩和巴雅尔赴喀尔喀蒙古和苏联的经过；恩和巴雅尔主持召开革命大会；恩和巴雅尔为革命壮烈牺牲等四部分，以飨读者。

一、恩和巴雅尔的少年时期和他的生活

恩和巴雅尔于清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出生在乌拉特西公旗勃鲁珠亥（地名）的一个世代贫苦的牧民家庭里。他阿爸叫巴勒道日吉，额吉（母）叫宝迪曹。

父母共生有十一个儿女，其中四男七女，恩和巴雅尔在儿子当中排行老三。他家家境贫寒，全部家当也不过十几只羊的光景。为了全家生活，巴勒道日吉每年都在割芎芎、红柳、马莲和挖甜草根；而宝迪曹也夜以继日地给人做针线、推磨、舂炒米，放庙仓的苏鲁克和役畜，夫妻俩就这样辛辛苦苦地抚养着一群孩子。恩和巴雅尔从小聪明好学，他阿爸为了让他学习文化知识，把他送往顿达公旗（中公旗），二等台吉官其格身边做学生。（后来官其格因和当地官吏不和，搬到西公旗居住。）官其格知识渊博，蒙汉兼通，是当

时难得的人才。他教授的学生经常有二三十名，当时，在西公旗的军政要员中，绝大多数都是官其格的学生。恩和巴雅尔天资聪颖，又勤奋好学，在三十名学生中是出类拔萃的佼佼者。因此，颇受官其格老师的赏识和器重。那时，因条件所限，每隔几天，须组织学生上山砍柴，以供日常需用。可是，官其格老师发现，在往回背柴时，恩和巴雅尔每次都落在其他学生的后面。起初，老师很生气，以为他偷懒，不肯出力；后来经过了解才知道，原来他每次上山打柴时，都悄悄带着书本，别人打柴他看书，别人往回走时，他才开始打柴，所以总是落在别人的后头。当老师知道事情的真象后，不但不责怪他，而且为他刻苦学习的精神所感动。从此，留他在家里专心读书，不再上山背柴了。

恩和巴雅尔读的是蒙汉文，因此，他从小便掌握了蒙汉两种语言文学，这对恩和巴雅尔以后进入政界和投身革命都有极大的好处。正因为他有蒙汉兼通的才能，在当时人才极端缺乏的情况下，十三岁时，他便进入官府当了笔贴式（文书）。当时他连马都上不去，每逢骑马，还得让额吉扶上去。在衙门里，恩和巴雅尔有时起草公文，有时抄写文件。由于他的字写得刚劲有力，使人爱看，因此，公庙子的喇嘛们，请他用毛笔

抄写蒙文经卷——《甘珠尔经》。从此，恩和巴雅尔成为牧区受人喜欢的文人墨客了。

西公旗札萨克诺彦贺希格德力格尔逝世后，因无子嗣，在大吐斯拉克其（协理）额尔贺道日计的提议下，由贺王堂弟石拉布多尔吉继任了札萨克诺彦。对于此事，公庙子的依西达格敦大喇嘛始终坚决反对。因为他企图让其侄子巴图巴雅尔接充札萨克诺彦，成为一旗之长，（依西达格敦与贺希格德力格尔为叔伯兄弟）。从此，西公旗围绕谁接替札萨克诺彦职位的问题，形成为两大派。斗争的双方各执己见，互不相让。额尔贺道日计上书绥远省主席商震和乌兰察布盟长巴布道尔济王爷，呈请批准由三等台吉石拉布多尔吉为札萨克诺彦。这个报告的起草人，便是恩和巴雅尔。后来额尔和道尔吉官司打赢了，由石拉布多尔吉接任了西公旗札萨克诺彦之职。于是恩和巴雅尔进一步受到官府的器重，被晋升为衙门的师爷。恩和巴雅尔十八岁那年，被任命为笔贴式长，接着又奉命与黄毛二人赴北京蒙藏院任文书。由于恩和巴雅尔的才华出众，当时在蒙藏院也声誉大著。

二、恩和巴雅尔赴喀尔喀蒙古（外蒙古）和苏联的经过

在北京任职期间，恩和巴雅尔很注意观察和了解国内外形势变化的情况。当时，国际上正值俄国十月革命爆发，沙皇被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所推倒，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在国内继辛亥革命之后，“五四”青年运动的革命浪潮席卷着整个中国，同时，喀尔喀蒙古正酝酿着革命独立。国内外这些革命运动，对恩和巴雅尔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面对这种形势，他决心返里宣传革命，接受改革。在他回西公旗前，首先剪掉了脑后的长辫子，以示决心。他从北京回到家乡后，怀着满腔的热情，向全旗人民宣传“五四”青年运动的伟大意义，大讲俄国革命的胜利，对世界革命的影响。接着，在一九二二年秋季，他向往革命，追求真理，离开家乡，去了喀尔喀蒙古。临走时，他悄悄告诉妻子：不久后在内蒙地区将发生革命，他先到那边（指喀尔喀蒙古）看看。此事除妻子外，他对任何人都没有透露，他的行动非常秘密。

恩和巴雅尔到了喀尔喀蒙古以后，在那里过了一个春节。据说蒙古人民革命领袖苏赫巴特和

乔巴山曾接见过他，并给他许多重要指示。他的额吉也说，恩和巴雅尔从喀尔喀蒙古回来后，曾和她商量，要把家搬至喀尔喀蒙古住。当时，由于他额吉没有表态，就只好作罢。

按西公旗旧制，从每年腊月三十日起，为封存衙门官印的日子，启封日期，则在次年的正月，在十八日至二十一日四天中选择。在这四天內，选择天气最好的日子为启封日，并举行隆重的启印仪式。在官印封存的二十多天里，衙门（官府）一律不办理公事，惟当启封大印的这一天，全旗高级军政官员和十二个苏木的台吉、章京以及二十四座寺庙的格斯贵以上的喇嘛们，都潮水般地来到官府，参加官印启封大典。一九二三年的官印启封大典，和往常一样，庄严而隆重。除公庙子的大喇嘛依希达格敦的人马外，全旗上下贵族台吉和大大小小的官员全部赶到，真是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热闹非凡！恩和巴雅尔抓住这个良机，站在会场上的高处，向全旗人民进行宣传，他报告了自己去喀尔喀蒙古的经过，并且公开号召西公旗各界人士，积极行动起来进行革命。当人们听了恩和巴雅尔的宣传后，大为震惊，许多人当场表示拥护，要求参加革命。就在这次启印大会上，根据大家的一致要求，起草了西公旗人民致革命党书，书中表示拥护、赞成内

蒙革命。经旗吐斯拉克其（协理）额尔贺道日计加盖官印后，当场交给了恩和巴雅尔，请他转交给革命组织。

恩和巴雅尔是一个杰出的宣传活动家。从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四年，他不仅在广大牧民群众中进行了宣传组织工作，还巧妙地深入到上层人士中，逐个去说服和启发他们起来参加革命。在进行革命活动中，有时还为牧民们解决具体问题。如顿达公旗（中公旗）吉昆（东）苏木的关其格家，窝藏抢了西公旗牧民的土匪，该旗不予惩办，恩和巴雅尔便出来替西公旗牧民打官司，结果赢了顿达公旗。一九二四年，恩和巴雅尔第二次去了喀尔喀蒙古（是年他二十四岁）。这时，恩和巴雅尔的名字在草原上的牧民中，已经家喻户晓，人们亲昵地叫他“红党”恩和巴雅尔。究竟他哪年加入过哪些党，人们并不清楚。有人说恩和巴雅尔是“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党员；有人说他是“布尔什维克党”党员，有的材料记载着他参加过“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在他第二次赴喀尔喀蒙古时，同行的是一位汉族同胞。他们俩人随身携带了以全旗人民名义起草的革命书，当他们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喀尔喀蒙古已推翻了以哲布尊丹巴为首的黄教统治，建立了革命政权，宣布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在乌兰巴托，他分别见

到了乔巴山和苏联驻蒙古特使。苏联特使告诉恩和巴雅尔说，你可以去莫斯科。于是，他便去了苏联。他在莫斯科时，由第三共产国际的代表接见了。他除向代表汇报了西公旗革命发展的情况外，还要求第三国际支援西公旗革命运动。当时，第三国际的代表回答说：“第三国际将派维辛斯基去中国，今后你们可以直接和他联系。”同时，苏联同志也答应给他们支援六百支长枪，两挺机枪还有些手枪，并派两名俄国人和一名翻译来中国，双方约定时间在包头接头。还告诉恩和巴雅尔说，蒙古革命党人也会支持你们革命的。又说，为了便利革命活动，你们暂时可以打起俄国革命的旗号。当时，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国共两党开始合作，共同进行北伐战争。对此，第三国际的代表说，内蒙古和喀尔喀蒙古的情况不同，没有条件实行独立，要想取得内蒙古人民的解放，必须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此同时，第三国际的代表还告诉恩和巴雅尔，过完年你要尽快返回家乡，为一九二六年夺取革命胜利做好准备。恩和巴雅尔根据第三国际代表的指示，在喀尔喀蒙古过罢年，立即返回西公旗。他返回时，蒙古方面决定派四个人来协助工作。这四个人都是我国西部区的蒙古族人。他们是赛音

巴雅尔（包悦卿）赛兴阿·墨尔斯（郭道甫，呼伦贝尔人），另两人名字不详。蒙方给他们每个人制做了一件一样颜色的蒙古袍子一顶帽子。然后用汽车把他们送到了中蒙边界。他们入境后，先是步行到了阿纳斯太（地名）。然后从那里借骑乘回到西公旗孙岱家。在这里躲了两天以后，又继续往南走过了黄河，先后到鄂托克、乌审和杭锦三个旗，见到了西尼喇嘛（乌日吉杰日嘎拉），看了独贵龙运动的组织情况。在此期间，恩和巴雅尔从协日召（庙名）派人回旗通知地方官员，说明他已来到伊盟地区。西公旗接到信后，立即派高勒苏木的三等台吉阿木嘎和他的随从宝迪仁钦，仁庆道日吉三人专程到协日召迎接恩和巴雅尔返旗。之后，把恩和巴雅尔一行，安置住在乌日吐高勒庙上。

恩和巴雅尔进行革命活动，必然会招致敌对分子的仇视和反对。公庙子大喇嘛依西达格敦得知恩和巴雅尔从事革命活动，并去过“红党”国家的消息后，便认为旗札萨克诺彦石拉布多尔吉，努里津杭赖（前旗札萨克诺彦贺希格德力格尔之妻）有加入“红党”的嫌疑。因此，他把恩和巴雅尔看成眼中钉肉中刺，必欲置诸死地而后快。为此他们处心积虑地进行策划，企图谋杀恩和巴雅尔。依西达格敦大喇嘛的阴谋，被巴润庙

的活佛喇嘛探知后，他迅速报告给石拉布多尔吉、努力津杭赖，并把他们二人转移到额尔贺道日计协理身边，以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与此同时，恩和巴雅尔他们也由乌日吐高勒庙回到了旗衙门，会见了额尔贺道日计协理。恩和巴雅尔一面向额尔贺道日计介绍了从喀尔喀蒙古新来的四位客人，又向他介绍了喀尔喀蒙古和苏联的革命形势。后经过反复协商，终于使额尔贺道日计同意召开全旗的革命大会。

三、恩和巴雅尔主持召开革命大会

二十年代中期，乌拉特西公旗的军政大权完全操纵在额尔贺道尔计一人手中。因此，恩和巴雅尔开展革命活动，必须首先争取和利用额尔贺道尔计。他同额经过一番协商，决定一九二六年旧历八月二十五日，在乌日吐高勒庙召开革命大会。并对大会议程及需要通过的事项，都做了具体的研究安排。

在革命大会召开之前，恩和巴雅尔、赛音巴雅尔和墨尔斯一起到了包头。他们在包头勘察确定革命指挥机关驻地的同时，并赶制了旗帜。与此同时，按原定时间，如数接受了苏联支援的枪支弹药。他们留下二百支步枪，把其余枪支弹药给了西公旗团长沙格德尔和他的儿子玛西巴雅尔

营长，重点武装了这支部队。因为沙格德尔对革命态度坚决，积极支持恩和巴雅尔的活动，并且他又是掌握全旗军队实权的人。

一九二六年旧历八月二十五日，在乌日吐高勒庙上，高挂标有镰刀斧头的鲜艳红旗高唱着革命进行曲，由恩和巴雅尔主持了革命大会。到会的人们精神振奋，喜气洋洋，充满着坚定的革命信心，大会开得异常成功。据说，大家唱的歌词是恩和巴雅尔亲自写的。记得在歌词中，有这样的一段话：“举起那革命的红旗，要使革命的歌声响遍四海；使敌人怕得失魂落魄，快快把百姓从苦难中解救出来！英特纳雄奈尔，必定要胜利，要胜利！！”大会上恩和巴雅尔的讲话，受到了与会者热烈拥护，并激起一阵又一阵雷鸣般的掌声。他号召大家组织起来，砸烂旧制度，解放全人类，争取民族的解放和自由。在大会期间，青年人积极报名参加革命，及至大会结束后两天，就有二三十名青年报名参军。其中有牧民，也有喇嘛。有一个年仅十三岁的少年柯什达赖（现在白彦花医院当医生，七十四岁）报名要求参加革命。当时他的身个连一杆枪高都没有，但他的态度非常坚决。他额吉知道后，多方劝说方才作罢。乌日吐高勒庙活佛喇嘛洛布桑旦必扎拉参（八十七岁，健在）、班弟喇嘛宝迪仁钦和仁庆

道日吉，也积极报名加入革命行列，从而使革命队伍迅速发展。恩和巴雅尔将枪支弹药，发放给参加革命的青年后，接着便在乌日吐高勒庙搞集中训练，由赛兴阿直接担任军事教练。后来，这支队伍成为恩和巴雅尔直接指挥的革命军队。

同年旧历九月二十日，根据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恩和巴雅尔把部队从乌日吐高勒庙移驻到包头，把指挥部设在城西附近的关老爷庙周围。同时，为了进一步和中国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取得联系，并了解中国革命形势发展情况，恩和巴雅尔曾到过不少地方。据说，曾和毕力格巴特尔有过联系。毕力格巴特尔告诉他，蒋介石叛变了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国共两党发生分裂，给革命造成了重大损失。毕力格巴特尔建议恩和巴雅尔返包头后，派一名可靠的人去北京，直接同第三共产国际远东代表联系。恩和巴雅尔根据毕力格巴特尔的建议，又征得一道工作的几位苏联同志同意，派赛音巴雅尔去北京找共产国际的代表。为了安全起见，他们从乌日吐高勒庙喇嘛那里，借了一套喇嘛服装，把赛音巴雅尔打扮成喇嘛模样，以去雍和宫拜佛磕头为名到了北京。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共产国际的代表。当时共产国际代表指出：中国的革命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要求他们进一步观察形势的发展变

化。如形势不利，应立即从包头撤往喀尔喀蒙古。共产国际的代表还告诉说，他将在一九二七年回国。赛音巴雅尔返回包头后，把共产国际代表谈话的内容和所提出来的意见，向恩和巴雅尔一一作了汇报。经过一番讨论，大家认为暂时还呆在包头，等过了春节，看看形势的发展情况再定。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蒋介石背叛了革命。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人开始了大屠杀，使中国革命遭受了严重损失。鉴于形势的进一步恶化，经研究决定，恩和巴雅尔去鄂尔多斯找西尼喇嘛。如果伊盟形势对革命有利，就将革命力量转移到鄂尔多斯；如果情况仍然不好再投奔苏联和外蒙古。另外，恩和巴雅尔已经估计到，当革命处于低潮时，会有人背叛革命出卖同志，特别是西公旗上层人物之间的矛盾很多，又犬牙交错，必须防止和警惕有人背叛“红党”，给革命造成损失。不久，他亲自带领二十余人，过黄河直奔西尼喇嘛处，不料国民党反动派已经动手，开始暗中监视西尼喇嘛的活动。于是，恩和巴雅尔当机立断，作出了向北转移的决定。当时，在包头驻有革命队伍百十人左右，他们有十六辆车，八峰骆驼，把所有的东西全部装运上，离开了包头。当他们走到昆都仑河畔，准备在两户汉族大院安营打

尖时，突然有几百名军人包围过来。据老乡说，这些家伙住在离村不远的正南方，经常出没在特标勃勒西（昭君坟）一带。每隔一个时期，就要四出抢劫、掠夺老百姓的东西。谈起这些部队，不论是老人或小孩，都叫他们是张老爷部队。根据这一情况，几位苏联人提出来要收拾这帮土匪，同时已把机枪架起来准备向他们开火。正在这时，恩和巴雅尔部队中的一个叫额尔登和什克和一个莫日根庙的喇嘛诺木罕出来说，他俩曾与张匪为结拜兄弟，我们可以出面说和，让张匪让路。大家轻信了他俩的话，派他们去联系。结果他们俩给对方实话实说，说恩和巴雅尔的部队路过这里，要回西公旗。张匪便问，是否是“红党”恩和巴雅尔，他本人现在哪里？这两人一一如实回答。说恩和巴雅尔前几天就过去了，谈话中，并把几个苏联人也告诉给他们。张匪了解此情况后，马上装出同意撤兵让路，并提出请革命的部队来其驻地休息。额尔登和什克、诺木罕二人中了敌人的计，跑在高山头上，呼喊大家过去。就这样，恩和巴雅尔的部队上了当，三位苏联人和翻译都叫敌人给活捉了。其他人连情况也没来得及搞清楚，就被敌人缴了械。最后敌人扣留了苏联人、翻译及其它两人，然后宣布其余人员可以回家。

绝大部分士兵向西北方面走去，及至到了阿嘎鲁泰（地名）包红布家时，恩和巴雅尔正好由沙日召赶到此地，遇上了此种情况。他对几个领导人的遇险感到十分焦急。他非常难过地说：“失掉财产没有什么可惜的，而失去了几位革命同志，是革命的最大损失！”他悔恨自己当时不该离开包头。接着召集大家开会，除说明中国革命处于低潮，形势暂时对我们不利，革命的同志们要有清醒的认识外，还告诉大家，西公旗额尔贺道日计叛变了革命，他勾结依西达格敦大喇嘛，企图袭击我们。他心情沉重地说：“事已至此，现在每个同志要各拿自己的主意，愿意回家的可以回去；愿意跟我去喀尔喀蒙古的也可以去。但，是走是留，我们大家都要到乌日吐高勒庙后再分手。说完，全体人马越过古日本达巴（三道坝），到了小吐斯拉克其（协理）斯冷宝家。斯冷宝看到恩和巴雅尔部队遭受敌人的袭击惨况后，主动支援部队十支步枪，这样以来，他们算上原有的枪支，已有三十来支枪了。在部队继续走到莫日根北口子时，和那顺傲其尔带领的十来个兵相遇，于是，他们汇合在一起，奔赴乌日吐高勒庙。

乌日吐高勒庙，原是召开过革命大会的地址，也可称作革命发源地。当恩和巴雅尔的部队来到乌日吐高勒庙时，由于革命遭到失败，他们

正在面临着新的考验。当时，有的人提出离开部队回家放牧，但绝大部分人则坚持留下来去喀尔喀蒙古继续革命。其中最使人感动的是：乌日吐高勒庙的活佛喇嘛洛布桑旦必扎拉生坚决要走。但由于庙上执事喇嘛们的执意挽留，没有达到活佛的要求。个别战士一心想走，惟因家庭困难走不了，最后，他们不得不流着眼泪，恋恋不舍地离开了部队。

之后，恩和巴雅尔为了进一步摸清西公旗各类上层人士对革命的态度，他特意找到额尔贺道日计，请他谈一下他自己对当前形势的看法。额尔贺道日计是个狡猾而又诡计多端的人。他对恩和巴雅尔只是说：“现在，你们对一个旗的安全都很难保证，还谈什么苏联和蒙古出兵支援呢？”他对恩和巴雅尔去喀尔喀蒙古的问题，避而不谈。显然，额尔贺道日计对革命的看法，是抱着消极失望的态度。

四、恩和巴雅尔为革命壮烈牺牲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他恨不得把共产党人斩尽杀绝。为了镇压国内革命力量，扑灭革命火焰，他纠集了所有的反革命武装力量，疯狂地屠杀革命人民，围剿革命苏区。当时，绥远都统把西公旗的吐斯拉克其额尔

贺道日计叫到归绥，让他汇报苏联人在西公旗的活动情况，并下令追查逮捕革命党中的主要头目。额尔贺道日计原是个口蜜腹剑的伪君子。他尽管加入过“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但他貌合神离，和革命党人并不是一条心。关于额尔贺道日计与绥远都统之间究竟有过什么秘密勾结，人们并不清楚。可是，在额从绥远返回西公旗以后，立即着手布置消灭恩和巴雅尔领导的革命队伍。他首先采用拉拢利诱的手段，企图哄骗恩和巴雅尔叛变革命，投降国民党。恩和巴雅尔是一个坚定的革命战士。对他的甜言蜜语，嗤之以鼻，致使额尔贺道日计的阴谋没能得逞。于是他又采取了围歼方法。即利用他全旗大协理的权势，发布围歼恩和巴雅尔革命部队的命令。他命令三等台吉石拉布多尔吉出兵，与骑兵配合攻打恩和巴雅尔，但石拉布多尔吉拒绝出兵。他质问额尔贺道日计：“作为堂堂有名的西公旗吐斯拉克其大诺彦，你曾经亲自带领大家宣誓参加过“红党”，如今出尔反尔，竟命令我去打恩和巴雅尔，这是什么意思？现在，不用说我的部队不在，即便在，也不会给你出兵打人家。”此话是朝仓巴特尔亲自听他说的。额尔贺道日计恼羞成怒，又给本旗阿拉塔钦苏木梅林章盖宝音陶克特下道命令，让他在七月二日，务必出兵从恩和巴雅尔驻地的左侧发起

进攻。可是额尔贺道日计没想到宝音陶克特与恩和巴雅尔是老朋友，两人的关系非常密切。宝在接到命令后立即将额的行动计划通知给恩和巴雅尔。

额尔贺道日计费尽心机，始终没达到消灭恩和巴雅尔的目的。于是，他又施展了阴谋诡计。按过去的老传统习惯，在每年的旧历七月初二日，旗衙门都要举行祭军旗仪式。老奸巨猾的额尔贺道日计，今年突然在吉日嘎楞图庙上提前祭军旗。军旗长九尺，旗尖是一块三棱铁，旗周围都是用淡黄色的绸缎和哈达制作的穗子，旗中心刻有奔腾的四条巨龙；旗杆把上套着带长辫子的人头皮。在祭军旗的仪式上，所有的士兵都须列队跪倒在军旗前面发誓效忠。

及至七月初二日凌晨，由额尔贺道日计部下的排长西日门带队，向恩和巴雅尔驻地的右侧发起了进攻。当时，恩和巴雅尔正在院中烧毁文件。同时在左侧也响起了枪声。这时，恩和巴雅尔埋伏在西沟里的十个士兵，有一个喀尔喀人中弹身亡，其余的人退下来了。西日门的部队愈打愈烈，三番五次地扑上来，但均被恩和巴雅尔给打退了。当恩和巴雅尔发现左侧来的是宝音陶克特的部队时，便告诉大家不要管左侧的枪声，要集中力量对付西日门。经过半天的战斗，西日门的部

队开始后退了，宝音陶克特的部队，也撤回乌宝力格驻地。恩和巴雅尔借战斗暂时停止的间隙，很风趣地对大家说：“西日门能把我们消灭在这山沟，那是西日门的幸运；我们能冲出他们的包围圈，那是西日门的失败”。接着，恩和巴雅尔还动员大家说：“敌人可以打死我们，但消灭不了内蒙地区的革命。我们一定要突破额尔贺道日计的封锁，求得生存，争取革命的胜利。最后他宣布：每个战士只需带一匹马，一套马鞍和一杆枪，其他东西留给群众，以便轻装突围。

在夜幕低垂，暮色四合时，枪声又响了。西日门部队再次进行反扑。激烈的战斗一直持续到午夜时分。恩和巴雅尔吩咐大家：“估计西日门也许变换战术，他很有可能放弃骑马，率众徒步进行攻击。我们则趁机骑马突围，尽快摆脱敌人。”还说，“我们是人，西日门也是人，只要中弹，他们也逃不脱死亡的命运。”接着恩和巴雅尔吻了一下五个月的儿子，然后告别了妻子，接过警卫员递过来的轻机枪，骑马率领大家冲杀过去。顿时，在战场上，枪声大作，火光烛天，带着风声的子弹呼啸着飞过他们的头顶，雨点般地落在西日门的阵地上。经过一场激烈战斗，恩和巴雅尔的部队，终于突破敌人的包围圈，于次日一早安全地到达了莫日根庙。

恩和巴雅尔的部队，经过这场铁与火的洗礼，素质明显地提高了。在莫日根庙上，他一边设岗加哨，防止敌人的袭击，同时还看望了一起战斗过的同志和战友。并对士兵家属也逐个地做了工作。沙格德尔团长是西公旗坚决支持恩和巴雅尔革命的上层人士。他闻讯赶来看望恩和巴雅尔。并劝恩和巴雅尔不要去喀尔喀蒙古，自己保证出兵保护他们的安全。恩和巴雅尔当时反复讲了他之要出走的理由，并请求老团长在他走后，多方面关照他的母、妻及幼子。还请老团长代他向色仁宝吐斯拉克其和宝音陶克特梅林章京作解释，说明他当前的处境和苦衷。过去这三个人都解救过恩和巴雅尔，并帮过他的忙。因此，恩和巴雅尔很感激他们，并愿以诚相告。

额尔贺道日计，消灭恩和巴雅尔的阴谋虽然失败了，但他并不死心，他先后又与大余太和顿达公旗（中公旗）取得联系，准备切断恩和巴雅尔的去路，企图把他们消灭在边境线内。一九二八年八月（阴历七月十七日），当恩和巴雅尔的部队路经大余太以东乌兰呼都格时，突然遭到贺连长部队的袭击，战斗持续了一整天。在战斗中虽然战士那顺敖其尔牺牲了。但部队再次冲破了敌人的封锁，继续往北前进。终于在旧历七月二十日到达了中蒙边境的索伦山南麓的恩格尔庙。

由于长途行军人困马乏，他们决定在恩格尔庙休息后再动身。不料，他们却被早已接到额尔贺道日计通报的顿达公旗的齐布格扎卜率领的二百多名士兵所包围。在第二天黎明双方便开始接火。在战斗中恩和巴雅尔爬上山顶用轻机枪掩护着战士安全地脱离了敌人的火力网，但在他个人最后撤离阵地时，不幸中弹身亡。

一九二八年旧历七月二十一日清晨，年仅二十七岁的恩和巴雅尔同志，为了革命的胜利，为了民族的解放，英勇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的高大形象永远活在人民心中，他的英雄业绩永远为人民所传颂。

恩和巴雅尔同志永垂不朽！

抗战时期驻在河套 的三位蒙旗女司令

宝音德力格尔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寇发动芦沟桥事变，开始大举进犯我国，华北各省相继沦陷。内蒙各盟、旗，除伊克昭盟之杭锦旗、郡王旗，札萨克旗、乌审旗、鄂托克旗，以及西部之阿拉善旗，额济纳旗外，其余各盟、旗均陷敌手。它包括：东部区的哲里木盟，卓索图盟、昭乌达盟、呼伦贝尔部，西部区的乌兰察布盟、锡林郭勒盟、察哈尔部之八旗、四群，土默特旗及伊克昭盟之准格尔旗、达拉特旗。其中，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的王爷德穆楚克栋鲁普早已由住在达尔罕旗贝勒庙（即百灵庙）内化装成喇嘛的一名日本特务，从中牵线暗地与日寇勾结，狼狈为奸了。一九三五年德王已公开投靠日寇，并为日寇侵绥作开路先锋。一九三六年秋，德王以与绥远省政府征收捐税为借口，掀起了百灵庙战役，实则是为虎作伥给日

寇侵占绥远作准备。在日寇入侵内蒙各盟之后，蒙旗人士深明大义的土默特旗总管荣祥，他携家带口随绥远省政府及绥蒙指导长官公署迁往陕西榆林。并担任绥境蒙政会蒙旗宣慰工作，驻在伊盟札萨克旗。伊盟杭锦旗之何王，尽管该旗未被日寇占领，可他本人因久住归绥（呼和浩特）、包头，当时也已投敌。那些在敌占区之蒙旗王公、仕官则多数屈服于日寇势力之下。

在这种情况下，乌盟出了三个女司令，她们不甘心受侵略势力的摆布和控制，毅然出走，寻求抗战救国的道路，成为巾帼英雄。她们的事迹不仅轰动一时，并且也为后世传颂。兹分述如下：

一、乌盟乌拉特前旗的奇俊峰

奇俊峰是乌拉特前旗（旧称西公旗）石王的福晋（夫人）。西公旗原为乌盟六旗之一，也是乌拉特三公旗之一。在解放前是个混乱多事之旗。本世纪二十年代老王爷贺喜格德力格尔死亡后，因后继无人，旗政大权暂由文书协理额尔贺道尔济（汉名额宝斋）代行执掌。嗣因札萨克位子不能久悬，根据蒙旗成例，选准贵族台吉王爷近支在公庙子当喇嘛的石拉布多尔济承袭爵位。额尔贺道尔济等，原想把石王当作傀儡，由他们控制利用。后见石王握权不放，他们就设法捣乱，企

图推翻石王。尤其是公庙子大喇嘛达格丹，他原是石王的族叔，对札萨克职位垂涎已久、梦想以其亲侄接替石王。于是就联络梅力更庙大喇嘛和野心勃勃的额尔贺道尔济等共同谋划，并勾结德王，与石王展开斗争，最后发展到以兵戎相见。当时晋绥绥靖主任兼绥蒙指导长官阎锡山，认为石王之承袭王位是经南京中央政府批准的。为维护中央政府的威信，并维持地方治安。他命令驻在包头的王靖国部队，就近协助石王解决矛盾，阅墙之争始告平息，但已造成两败俱伤了。公庙子大喇嘛达格丹失败后，被部下所杀，而石王亦因病死于包头。时在一九三六年。

据说石王曾娶过四位福晋，唯第三位福晋奇俊峰生有一子，蒙名阿拉腾敖其尔。此子生在一九三七年，其时石王已故。石王逝世后，奇俊峰因儿子年幼不能掌政，遂名正言顺的代行了旗札萨克的职务。此时她大权独揽，励精图治，不遗余力地整顿旗政府。任命素有威望的色林保、沙格德尔为协理，同时还委任了一些精明能干的人接任了梅林、甲浪，（甲喇、札兰，即参领职务）负责旗内行政事务。至于原与石王为敌之徒；有的投奔德王为敌效劳；有的隐居归绥，等待时机，东山再起。由于敌对双方、死走逃亡的缘故，当时在西公旗的政治舞台上，呈现出一种暂

时安静的局面。

谁料好景不长，不久便发生了“七七事变”。一九三七年冬至一九三八年春德王成立了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地点在归绥市。为防备河套部队东进袭击，同时也为了扶持额尔贺道尔济等回旗夺权，并可就近监视奇俊峰的动静，便派了一个团的伪蒙军，驻防乌拉山南之恒胜号。该团白团长见奇俊峰孀居，年轻貌美。欲攫为己有，于是极力表示亲近，希冀奇俊峰俯就。奇在伪军的控制之下，不得不假意与之周旋，其实她不愿屈从敌伪军，早已成竹在胸，等待时机准备脱逃。后来当白团长听说奇俊峰与傅作义在秘密联系之后，就突然请奇俊峰到团议事。对此，奇俊峰预感大事不妙，在她婉言哄走来人之后，立即收拾行装，带上小儿及心腹数人，冒险出走。她们由乌拉山前的敦达高勒出发，经吉尔格勒图庙北上，从山后来到河套奇俊峰的娘家。可笑白团长还油蒙心窍以为奇已成为笼中鸟，瓮中鳖、可以手到擒来。谁知候至黄昏，尚无踪影。始知失策，欲追已晚，悔之莫及，唯有兴叹而已。

白团长由妄想、而至受骗。其原因在于他事前并不了解奇俊峰其人。殊不知奇俊峰出自名门，自幼受过较好教育，而又素有胆识、为他人莫及。奇俊峰是阿拉善旗小三爷的女儿，蒙名色

布勒玛，与阿拉善旗王爷达理札雅为叔伯姊妹。她幼时过继给其姑母诺月朋养育。诺月朋住五原县西边达拉特旗西仓的贵族府第，她丈夫也是达旗贵族，曾任管旗章京。诺月朋有文化，为人精明。她为了教育子女，立有家塾。奇俊峰从小好学，成为既有文化，又有教养的名门闺秀。她很尊重养母，遇事常向养母请教，就是在她出嫁之后，还经常住在娘家，母女关系颇为密切。由于她聪明能干、胆识过人，所以在石王死后，她掌握旗政、号令全旗，无人敢与之抗衡。只此即可见其为人。“七七事变”后，她明知前途险恶、不好应付，但为全旗人民着想，重任在肩，不肯离尔旗贪图个人安逸。一直到她受制伪军，而白团长又觊觎于她时，她以其才智一面虚与周旋，一面将旗印交与沙格德尔护理，然后伺机出逃。

当奇俊峰从日伪控制中逃来绥西的消息，为国民党六十七军军长兼绥西警备司令门炳岳得悉后，立即派游击军第一支队司令武俊峰（小名驼羔）到大余太与奇俊峰联系，并护送她们到五原。奇俊峰是敌战区归来的第一个蒙旗王公夫人，门炳岳对之格外欢迎，并请准委其为西公旗游击司令。她先住隆兴昌镇内之永生号店、后移住其养母附近之拉僧庙。

奇俊峰之归来，表面看是躲避敌伪的威胁欺

凌，实则她是投入祖国的怀抱，参加抗战、为驱逐侵略者，收复西公旗，贡献力量。

一九三九年奇俊峰偕同养母诺月朋赴重庆中央，谒见蒋介石，当面汇报了西公旗的情况后，颇得蒋的嘉许和赏识，立即允许拨给军事补给。奇返回河套后，即着手招兵买马、扩充军队。并在此基础上组织了司令部，以杭锦旗参谋长黄楚三担任参谋长，黄的文书员李俊卿任副官处主任。司令部驻陕坝南门外。在建军的同时也组成了流亡的旗政府，她以护理札萨克的名义，委任西公旗流亡在河套的人员为中下级军政官吏。如：阿拉腾朝鲁（汉名郑玉山）明珠尔、沙格德尔（人称沙囤长在同义隆山口住）札木苏荣扎布，额尔肯巴彦尔等在司令部和旗政府内任职，这些人为打回老家去出谋献策、流血流汗。但河套的抗战必须由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统一指挥，不能轻举妄动。尤其是当时敌人正集结重兵于西公旗境内，企图进犯河套，在这种情况下，打回老家去的夙愿无法实现。她们只好移住五原、同义隆一带，经常派人去山后探听旗内消息，并将重要情报报告给长官部，作为对抗战的贡献。正在此时，西公旗前协理色林保之子陶克陶巴图（汉名郝游龙），由旗内带兵数十名来投，表示愿在奇司令的领导下打回老家去，重整旗鼓。对郝游龙的来归，奇

俊峰只委以轻职，不敢过于信任，这是因为郝游龙素性狂妄、遇事满不在乎、并且反复无常，专横跋扈。

郝游龙来套后，依靠他在套的族叔郝跃飞（当时任西公旗连长）的名望，开始招兵，扩大势力。共招兵三个连。其中蒙汉兼收，良莠不齐。奇俊峰虽知郝游龙胆大妄为，但为了壮大部队声势，遂委郝游龙为团长。奇俊峰经过惨淡经营的力量，虽在不断壮大，但在强大的敌人面前，还不能有什么作为，更谈不上实现打回老家去的雄心大志。所以她又移驻陕坝西南的大小苏台庙，在后方帮助地方工作。记得奇部在苏台庙驻防时，曾对防疫及地方治安工作，起过很大作用。等到一九四五年秋日寇投降，抗战胜利，她才率部返旗。首先驱除敌伪，整顿旗政，所有敌人任命之伪职人员自札萨克以下，一律清除。同时请准，任命其八岁幼子承袭西公旗札萨克职位，并兼任旗保安司令，奇俊峰仍为护理札萨克。同时为报答前协理色林保夫妻对她的关心与帮助，任命其子郝游龙为旗保安副司令，以协助旗政，安静地方。从此旗内安定平稳约二年之久。

岂料郝游龙恶劣成性，贪得无厌，竟收罗散兵游勇、招纳土匪张崩楼等，造谣、诬告，攻击奇俊峰，阴谋夺权。并策划杀害奇俊峰。奇俊峰

也知道郝游龙不甘人下，野心极大，因而于一九四七年秋，再次整顿旗政，整编部队。并在公庙子旗府，召开楚格拉大会，将郝游龙的副司令撤职。当时郝游龙心怀怨恨、顿起杀机。未等大会闭幕就先行离去，准备在奇俊峰返包头时，半路邀劫。会毕，奇俊峰带卫队回包头。途次乌兰计村打尖时，郝游龙带兵前来以拜见奇司令为名，乘机将卫队缴械，立即劫持奇俊峰到乌拉山中的苏波尔盖庙，并召集士官重新开会。绥远省政府闻讯后，董其武主席立即派包头警备司令温永栋前往苏波尔庙劝解。但去了两次均被郝游龙阻在山外，既不晤面也不答话。温无法，只得返回包头。及至士官们来到山中开会时，奇俊峰在胁迫下允诺郝游龙仍为副司令。谁知郝游龙心存狡猾，怕上当受骗，与同伙士官商定，让他们出面试探奇峰俊对待郝游龙的口气。奇俊峰为人正直，不说假话，竟以实话相告。申明任郝为副司令乃权宜之计，等被释回包头后再另行设法处理。此事被郝游龙探知后，决心处死奇俊峰以绝后患。他表面佯作镇静，表示要送奇俊峰回包头。并以到山中找牲畜为名，拖延时间，暗中却部署了杀害奇俊峰母子的方法和步骤。直至下午四五点钟，才吩咐套车，并请奇俊峰母子启程。等奇俊峰母子准备上车时，郝游龙手下人突然开枪将奇俊峰

击毙。小札萨克见势不妙，躲入屋内一木柜中，凶手追入房中将小札萨克拉出，一并枪杀。

女司令奇俊峰，不愿受制于日伪，仗义出走，谋求抗战，不仅精神可赞，也曾产生过积极影响。抗战胜利了，而她竟遭此厄运，了结了她的一生。

二、乌盟乌拉特后旗的巴云英

巴云英是乌拉特后旗（亦称东公旗）额王之妻，人称额福晋。乌拉特后旗是乌盟六旗之一，亦为乌拉特三公旗之一。据说乌拉特三公旗，原与四子王旗是一个家族的弟兄，因让第四子继了王位，故称四子王旗。其余三子分来西部，当时均授予公爵，所以称为三公，以后皆晋封为贝子爵位。乌拉特三公旗因系叔伯兄弟，三旗所占土地，并未详细划分，只是以每旗人口所占地之多寡，来决定旗境之大小。也就是该旗旗民住到哪里，哪里就属该旗管辖。乌拉特后旗（即东公旗）位于大小余太以北，高台梁一带。由于该旗人口不旺，所以在三公旗中地方窄小，但该旗农牧业兼备，收入虽不太多，也可以维持现状。因此一般人对东公旗多不注意。

“七七事变”后，该旗沦为敌占区。额王福晋巴云英，原系土默特旗包头人。据说在她未嫁额王之前，已有丈夫。她前夫之子曾一度随巴云英居住，现仍住在磴口县巴彦高勒。巴云英在嫁给额王

后，生有一子，蒙名贡格色楞，汉名贡世明。巴云英虽无文化，但因自幼居住包头，对汉人的习俗语言一概熟悉，加上本人聪敏，性情和蔼、颇得额王宠信。巴云英处事豁达，额王在世时，一切对外事务，多由巴云英主持洽办。我于一九三五年夏季，随安北县设治局关科长去东公旗协商丈量烟地征收罚款税问题时，曾见过额王及福晋巴云英一次。额王貌不惊人，且言语短少，因脖子有些歪，人称歪脖王爷。在商谈中由巴云英出面接洽，额王坐于一旁，似乎并不过问。又在一九三六年秋，亦因丈量土地及征税问题，我再次去东公旗王府协商时，其时额王已故，只有巴云英母子二人在家。此次商谈由巴云英全权负责。另外在旗内士官中了解到，他们对巴云英福晋无不心悦诚服。由于其子贡格色楞年纪幼小，当时旗政，均归巴云英掌握。巴云英执政，得力于汉族军政人员和汉族地主的帮助不少，其中给她帮助最大的是史钦芳。他是河北人，在小余太居住多年，并在兴盛照村置有土地房产。据说，史钦芳曾在王英部队任过团长，后来山西晋绥绥靖主任阎锡山收抚王英为骑兵副司令，有意歼灭王英部队。史钦芳非常机警，他闻风事先逃跑回到小余太。为了给个人寻找庇护，就主动地亲近东公旗，常给旗里帮忙，并担任东公旗名誉保安队长，还不时给旗里出谋

划策。因此他与巴云英来往甚密。“七七事变”之后，巴云英觉得她在旗内虽有威信，总不如额王在世时舒展，又怕在敌人占领东公旗后遭受欺压。她想与其当亡国奴，倒不如投入祖国怀抱，追随国军抗战，方为光明磊落。东公旗离大余太很近，消息灵通，当她得知西公旗奇俊峰投奔陕坝后，便跟史钦芳商定，决心步奇俊峰的后尘，终于投奔到陕坝。巴云英是从敌占区来的第二个王公夫人，门司令也尽情予以欢迎。巴来陕坝后，知奇俊峰已赴重庆。于是也接踵前往，晋谒蒋介石汇报旗内情况，并谈她对抗战的志愿。也得到了蒋介石的赞许，批准其子贡格色楞承袭札萨克位兼旗保安司令，同样允许补给军需。

巴云英回陕坝后，立即跟史钦芳一起着手组织军事力量。首先召集史之旧部，同时在套内也招了一部人马，号称两团，实则一、二百人。因札萨克贡格色楞年幼不能理事，有关军政事宜仍由巴云英掌握，并代替其子发号施令。在组织司令部时，曾请准由巴云英任司令、史钦芳任副司令。于是人称巴云英为巴司令。巴云英原也想回旗活动，但因部队力量薄弱，大部分士兵均为农民，他们为了躲避抓兵，才投她避风，没有一点战斗力。当时敌人的部队经常驻在大余太，势力正大。因此未敢轻举妄动。幸好当时乌梁素海以

东，后山一带，为我方的游击区，游击部队常来往其间，利用这个机会，巴云英可以派一些部队随游击队前往，探听敌人在三公旗一带的消息；或到旗内进行招抚工作，但不能久呆。因此她的部队就经常留在河套，多驻扎在陕坝与米仓县之间的张留柱圪旦。直至一九四五年八月间抗战胜利后，巴云英和史钦芳率部回旗。回旗后整顿了部队，并遣散了一部份没战斗力的人员。司令部里留下少数人员及原来的保安队员在旗里工作。至于巴云英和史钦芳则常住在设在包头西街园子巷的东公旗办事处和司令部内。这时贡格色楞已长大成人，正式就职旗札萨克并兼任旗保安司令。关于办事处和司令部所需经费，除由中央补给外，其余皆由旗内供给。至于旗内的军政事务，士官们不时来包报告、请示工作。上下关系颇感融洽。

一九四七年在国民党选举国大代表时，巴云英曾被选为国大代表。

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九日绥远起义时，巴云英母子同东公旗各族人民参加了起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向康庄大道。

三、乌盟茂明安旗的额仁钦达赖

额仁钦达赖是茂明安旗札萨克齐王福晋。茂明安旗位于达尔罕旗之西南，三公旗之东北，固

阳县之北，地域辽阔，人烟稀少。整个固阳县境，原来都是茂明安旗的报垦地。就连日寇在包头北开铁矿的白云敖包，原来也是茂明安旗的属地。以后不知何故归属达尔罕旗管辖了。由于茂明安旗报垦地多，所以该旗旗境逐渐缩小。至于茂明安旗的人口，原来就很少，在清初建制之时，称该旗为“茂明安”旗，意为“不满一千人”的旗。该旗虽出产不大，但牧业尚称发达。齐王之为，人，青年有为，精明强干，不仅精通蒙文。对蒙医也颇有研究。他又热心于教育事业、在办理旗务之外，还从旗内选出青年多人，由他亲自教学，故门生遍全旗。齐王本娶有福晋，但那位福晋，出生牧区，不谙王府礼仪规矩，又不生育子女，所以不受齐王宠爱，责成她管理牧养王府牲畜。后经人介绍，才迎娶额仁钦达赖为福晋。据说额仁钦达赖原是外蒙古喀尔喀部人，在召河居住多年。召河在归化城正北八十公里处的普会寺所在地，距武川县城三十五公里位于大青山北。普会寺建在“设并”（蒙语为徒弟）草原上的一座小山之前，山与寺之间横贯着一条河流，称为召河。召河的土地原属于乌盟达尔罕旗；召庙则归土默特旗的舍力图召管理；其牧民原为喀尔喀人，系外蒙给舍力图召第四世活佛陪送的奴隶。因为这位活佛出生在外蒙一个王爷家，王爷不愿

其子远离，乃出资在召河建庙，作为活佛居住的地方，并陪送奴隶、牲畜在草地放牧。后经土默特旗清准，把召河周围的草地，划归舍力图召，人称这块土地为“设并”地。

这里的一切风俗人情都和土默特旗相同，故额仁钦达赖的汉语，以及举止动作、风俗习惯，皆与土默特旗人相同。原因是额仁钦达赖虽生长在召河地区，但其父母离婚后，她随同其母后嫁到了归绥土默特旗云家，已成为土默特旗籍的人了。额仁钦达赖生性聪明伶俐，其继父把她视为掌上明珠。幼时曾读汉文一二年，亦算粗通文字。后经召河瞎团长的介绍，她与茂明安旗齐王结了婚。由于额仁钦达赖机智聪明，又事事勤奋，齐王对她十分宠爱。额仁钦达赖不仅治家有方，而且对于旗政也很留心，所有旗内一切情况，她都了如指掌，因此齐王在处理旗政时，常常跟她商量，她也就处处给齐王当参谋。据说，就是旗内士官，对额仁钦达赖福晋也不敢轻视。

在日寇入侵之后，虽然成立了所谓的“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对蒙旗进行统治，但日寇对各盟旗仍不放心，又在各旗安置了“顾问”。日本的特务机关，利用当地蒙汉奸细，随时监视蒙旗王公的言行。茂明安旗齐王年青，在事变前因报垦等事务，常与国民党政府往来，因此敌人对齐王监

视甚严。而齐王的为人既不惯于阿谀奉承，以求日寇欢心，同时在言谈中又不知谨慎小心。孰知“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他竟被该旗梅林章京某诬告，说他有通国民党政府的嫌疑。于是日寇将齐王调回归绥，遂被特务机关戕害。另立齐王之弟继任旗札萨克。此时额仁钦达赖鉴于国恨家仇决心投奔国民党，参加抗战，以报前仇。当时原绥远省国民党部队，多在河套的临河、陕坝一带驻扎。她一方面央请召河暗团长，派人来河套探听消息，并设法与军政大员取得联系；一面秘密联络齐王的学生，以及齐王生前亲信，准备西行。通过联系得知，陕坝有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傅作义正在整军抗战，并对来归表示欢迎。于是趁敌寇不防之际，星夜离旗西来。不料事机不密被敌伪发觉，用汽车追至中途，终于被胁迫回旗。回旗之后，经过敌寇的威胁，士官的游说，他们都认为额仁钦达赖乃一女流之辈，经此挫折，决不敢再动，因此对她们的管理较松。岂知额仁钦达赖终不灰心，她表面上不动声色，暗中却仍秘密联络上次的随行人员，并在一个队长和十余个士兵的支持下，卒于一九四二年秋，又趁敌伪不防之际，离乡背井，第二次出逃。临行前，他们将蒙奸梅林章京某枪决，然后率其养子吉日木图，其弟南木开（汉名云世明）及部众三十余

人，脱离虎口，日夜兼程，经中公旗东公旗之间，到达河套前防孙兰峰军长的驻地。在她们说明来意后，孙兰峰即派队将他们护送陕坝，受到了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傅作义的特别欢迎和嘉勉。立即向绥远省政府请准在陕坝成立茂明安旗旗政府，并任命额仁钦达赖为茂明安旗札萨克。其所率部属，则编为该旗保安队由额仁钦达赖统率，一切经费均由重庆中央供给，从而逐渐开展了工作。额仁钦达赖虽是一女流，但做事非常经心。如在归来之前，即将旗府印信随身携带。又为了组织军队等需要，行前就筹集了蒙疆票及硬币数千元。不料初到陕坝，暂住客店时一时不慎，钱财被盗。对此额仁钦达赖并不气馁，仍极力设法东挪西借，一心效仿东西两公旗的样子，在套内招收兵马，扩大力量。

一九四三年秋，她们移居下蛮会。由于她们人地两生，所招来的人员多数是地痞流氓，也有土匪。于是发生了一九四四年的哗变，叛兵在枪杀队长之后，向山后逃窜，使刚刚组织的力量受到严重的打击，但额仁钦达赖对国仇家恨，始终耿耿于怀，念念不忘。后经请求重庆国民党中央政府补给经费，又向杭锦旗的巴营长借得一小队兵马，于一九四四年冬季，由其弟南木开率领回旗招抚旗民，开展工作。但事与愿违，南木开回旗后，不

知因何缘故被外蒙抓走，直到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尚无确切消息。

抗战胜利后，额仁钦达赖一心想整顿旗政，可是这位坚韧不拔的女司令又陷入了本旗协理、士官的各种阻挠之中，直到解放。

一九四九年绥远起义之后，她在内蒙古自治区和乌盟政府中担任过很多职务，尤其在卫生事业方面作了很多工作，此处不再赘述。

综观以上三位女司令，从敌占区归来，原因及经过不同，但其不愿向敌寇屈膝，不屈不挠地与敌对抗的决心及热爱祖国的赤诚精神则是一致的。堪为民族巾帼英雄。在抗战过后，时过境迁，她们的卓绩很少为人们所了解，久而久之，她们的事迹也许湮没无闻。为此尽个人所知，草成此文以供参考。

袭取包头、会战绥西、五

原歼灭战的回忆

——傅作义将军在三战役中的指挥

艺术

新书科

前 言

傅作义将军是一位爱国主义者，抗日名将，军事家，自北伐战争时起，他率一师之众驻守涿州，抗击奉系军阀五万余众达三个月之久；一九三三年长城抗战时，他在怀柔抗击日本帝国主义者，保卫了古都北平；一九三六年绥远抗战时，他击退蒙奸德穆楚克栋鲁普的伪蒙军进犯我红格尔图，收复百灵庙；“七七事变”全面抗日开始，他率部首战南口、平型关、忻口，继而孤军防守山西省会太原；而后转战石楼、中阳、交城、大午、绥南等地，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一九三九年十二月至一九四〇年三月间，傅作义将军担任

西北抗日最前线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时，率部连续一百五十多天同日本侵略者在包头至绥西河套之间地区，进行了名闻中外的，袭取包头、会战绥西、五原歼灭战三个战役。当时我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参谋处作战科参谋，亲身参加了这三次战役。现将傅作义将军在此三战役中的指挥艺术及战斗经过分述于后，以供研究史料者参考。由于时隔四十多年，虽在撰写过程中曾与当时部分参战的同志进行了核实修正，查阅了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所著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仍难免有遗漏或记忆不确的地方，希望参与这几次战役者，给予纠正和补充。

一、袭取包头

包头，当时是平绥铁路的终点，我国西北边陲军事重镇，人口约八万左右。“七七事变”后不久，日寇侵占包头，一方面血腥镇压无辜居民，一方面构筑永久性工事，妄图继续进犯我大西北。傅作义将军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后，率部自晋西北河曲转战至绥远省西部河套，事实形成了担负保卫西北大门的态势。这次战役我军奔袭五百里，经过五昼夜，日伏夜行，一举攻进包头城内，予守城日寇以沉重打击。傅作义将军高超的指挥艺术，赢得了以劣势装备、少量兵力，

战胜装备优良数大于我的敌人。鼓舞了抗日士气，坚定了抗日信念。

（一）积极备战，待机反攻

傅作义将军自一九三九年春率部进入河套后，为保卫河套这个粮仓，以及准备将来反攻，收复失地，进行积极备战。为此，他厉兵秣马，整军经武，成立“抗战建国讨论会”（简称抗建会），以训练军、政干部，统一思想认识，树立抗战必胜信念，提高部队政治素质，研究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和战斗方法，增强战斗力。傅作义将军经常讲：对装备优良的日本侵略军作战，过去那一套旧的战略、战术、战斗方法已不适用。必须针对日军目前所采用的战略、战术、战斗情况，研究出一套新的对付办法，才能战败日军，收复失地。如日军的战略是速战速决，我军即采取持久消耗战以对付之；日军的战术是集中优势兵力，在步炮协同，陆空联合，用猛烈的火力攻击我军，我军即以不与敌打硬战和阵地战，用“避不利，找胜利，不失机，不吃亏”的战术，以对付之；日军的战术是用飞机、大炮、坦克掩护步兵在远距离攻击，我军则以坚固工事和二百公尺内近战消灭之。又如日军凭藉其飞机、大炮、坦克之优势，多利用白天同我军作战，我军则利用夜间袭击敌人，使敌之优势不能发挥。为了便于同日军作

战，扬我之长，击敌之短。傅作义将军特制定几项主要战术训练课目：攻击城镇据点，夜间袭击，软顶硬打，围点打援，拉出来打进去，用开打一路，袭击炮兵，打敌坦克，二百公尺近战，投掷手榴弹，飞刺刀射杀（在同敌人拼刺刀之前，先发一粒子弹，名之曰勾口弹，射杀敌人后再对敌拼刺刀）等。傅将军对这些课目特为重视。每一课目讲授和演练，他都要去听课，参加讨论和亲临现场指导，发现问题及时阐明纠正。一方面在各重点地区构筑防御据点工事；在敌人进犯河套的必经路上埋设地雷，设置陷阱。一方面在黄河两岸沙梁及狼山山内储备粮秣、武器、弹药，以备敌人在大举进犯河套时，同敌打游击消耗战之用。另外成立省县乡各级动员委员会，积极组织民众，增强抗敌力量。并在重要城镇进行“空室清野”训练演习，使日寇即便侵入河套也无法立足。

此外，傅作义将军为了确实掌握华北日军在各地的分布及作战情况，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特成立情报人员训练班，训练各部队的情报参谋及派往各地的情报特工人员。由第八战区副长官部参谋处情报科长韩伯琴任班主任，我任教官。训练课目除情报专业外，还讲授一些简单日语。如：优待俘虏，交枪不杀……，以备在

战场上喊话瓦解日军之用。为搞好这一训练，傅将军还亲自到这个班作过两次精神讲话。训练结束时，傅还对准备派往包头、归绥（现呼和浩特）、大同、北平、天津等地的主要负责人员，作了个别召见和指示。

由于傅作义将军的深谋远虑及言传身教，身先士卒的模范作用。上上下下对各种训练，都非常认真，学习气氛十分热烈。为此，各种训练取得的成绩非常显著。部队增加了新的战术素养，战士增加了新的战斗技能。尤其是派往敌占区情报人员发回来的情报（在各重要城市均派有电台），都比较及时准确。为以后我军在作战中对敌情的分析、判断起了重大作用，达到了傅将军平日所讲的：“不打糊涂仗，不打无准备之战”的要求。

一九三九年冬，蒋介石为扭转各个战场上的被动局面，拟对日寇发动一次冬季攻势，令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傅作义将军配合湘北战场，向绥西安北高台梁地区之敌，发动一次攻击，以牵制华北地区之日寇不得南调，用以支援湘北战场。傅作义将军接电后，认为向高台梁地区进攻，军事价值不大，对战局起不到牵制作用。唯有向西北重要战略据点包头发起反攻，才能起到牵制华北日军南调之目的。作为军事家傅作义将军对此早有预见和准备，只是等待时机而已。接到蒋的电令

后，认为时机已到，一则为收复失地，解救沦陷区同胞的灾难；二则由于各个战场战斗失利，为振奋士气，扭转战局。于是主动向蒋介石提出愿全力以赴，向包头之敌发起反攻，以收牵敌之效。

（二）奇袭包头前的措施

傅作义将军在决定攻击包头之敌后，即首先召集团长以上部队长会议，研究反攻包头的作战计划。会上有的认为包头是日军重要的战略据点，既有装备精良的日军扼守，又有坚固的城防工事，我军以劣势的装备，攻击优势的日军，而且要经过五百里的长途行军，极容易被敌发现，难操胜算，应慎重考虑。傅将军为统一部队认识，增强信心，特将敌我双方情况，作了详细的分析。他说：“从军事观点来讲，在部队的武器、装备及战斗训练方面，敌军比我军占优势；从作战情况来讲，敌守坚我攻坚。我长途奔袭，敌人是以逸待劳，似无必胜把握。但从战争的本质来说，日寇是侵略，我军是反侵略，敌人是非正义的战争，我军是正义战争。在道义上日寇是失道，我军是得道，“失道者寡助，得道者多助”。我军保家卫国，挽救民族的危亡，有亿万人民的声援。日寇杀我同胞，奸我姐妹，掠我财产，除极少数卖国求荣，认贼作父的汉奸败类以

外，有着爱国传统的中国人民，日夜盼望我军反攻，一旦战争打响，必然陷敌于我民众攻击之中，胜利必属于我。从整个战局讲，即使是难操胜算，也要全力以赴，狠杀敌人嚣张气焰，牵制华北日军南下。完成战略任务。促使战局向有利我方发展”。最后他又说：“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必须有打敌必胜，怕敌必亡的信念，才能打败日寇，收复失地。为此，这一战役必须要打，并且还要打好、打胜。但我军反攻包头，必须采取：奇袭的战略，强攻的战术，顽强的战斗，才能取得胜利。在进攻之前尤需采取有力措施，方可免遭失败”。

1、为确保奇袭取得成功，取“兵不厌诈”之法，操欺骗代秘密之术，并“以攻示守”，先将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从前方的五原撤到后方的陕坝。其次对外宣扬日军将在冬季利用乌加河结冰期向我河套进犯，我方必须在敌进犯之前，加修防御工事；在敌人进犯必经路上，破坏桥梁，设置障碍，阻敌前进；并在乌梁素海动员民众打冰窟以迷惑敌人。使敌人误认为我军只是在防御，而无反攻的意图，放松对我军戒备。

2、以包头为假设敌，拟定袭击计划。命令部队进行攻城训练和战斗演习。并对攻城战斗中

可能发生的问题，作出充分的估计，预有腹案，打有把握之战。

3、对包头方面的伪军分化瓦解，积极利用各种关系进行策反工作，使之相机反正。最低限度也要在我军进攻时，不为日寇出力，起牵制作用。并令情报特工人员，对华北各地的日军调动、部署等情况速查报部。

（三）敌我兵力分布情况

敌方：日本侵略军在伪“蒙疆地区”驻有一个军团的兵力，军团司令官部设在张家口，司令官是冈部直三郎中将。其中主力部队分驻于察南、晋北和归绥、包头一线。伪蒙军有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李守信的骑兵九个师，分驻伪蒙疆的一些地区。绥包线上的日军有骑兵集团军的二十六师团之一部，装备炮数十门，汽车二百余辆。敌酋骑兵集团长小岛；骑炮兵联队长熊川长致中佐；战车队，骑兵第一旅团长片桐茂少将，驻萨拉齐；骑兵第十三联队联队长小原一明大佐及独立步兵第三大队驻固阳；骑兵第十四联队联队长小林一男大佐。及独立第四守备队驻安北大余太；驻包头日军指挥官为小岛司令，司令部设在包头前街绥西屯垦办事处院内，所辖部队兵力约万余人。另有日本宪兵队，特务队等，分驻于包头东营盘，西脑包等处。伪蒙疆炮兵团驻包头东营

盘，伪蒙骑兵第一师住包头西营盘，伪地方警备队分驻于包头城内外各据点。包头城内外均筑有坚固防御工事，城周围挖有深宽各四米的壕沟，壕外有路砦及通电的铁丝网。

我方：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驻五原，其直属主力部队有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将军兼），辖三个师：一〇一师师长董其武，所属三〇一团团长王建业，三〇二团团团长郭景云，三〇三团团团长王赞巨；新三十一师师长孙兰峰，所属九十一团团团长刘景新，九十二团团团长郁付义，九十三团团团长安春山；新三十二师师长袁庆荣，所属九十四团团团长杨新剑，九十五团团团长张世珍，九十六团团团长黄纯烈。军直属部队有警卫营营长刘福生，骑兵一个团团团长刘春方，炮兵第二十五团团团长刘振衡，通讯兵一营营长郭奠元，无线电一大队队长郭泰山。上述各师及军直属部队，分驻在五原，安北扒子补隆两城镇及其附近各主要据点。另有配属副长官部指挥的蒋介石部队骑兵第六军，军长门炳岳，所属骑兵第七师（师长门炳岳兼）；所属骑兵第十九团团团长赵太，第二十团团团长张绍成，第二十一团团团长胡逢泰，分驻在安北东南马七渡口及前山藉亥滩一带。另有宁夏马鸿宾部的步兵三十五师师长马腾蛟，骑兵旅旅长马彦，分驻在五原东北的乌镇，乌不浪口一带。阎锡山留在

河套的屯垦部队五临警备旅旅长徐席儒，所属第一团团团长于霖瑞，第二团团团长贾世海驻在临河及百川堡（今新华乡）一带。绥远游击军（此部系绥远省国民兵改编）司令马秉仁，所属第一旅旅长马逢臣，第二旅旅长马秉仁兼，分驻于西山咀至公庙子之间地区。还有新编骑兵第三师师长井得泉，新编骑兵第四师师长石玉山，新编第五旅旅长安华亭，新编第六旅旅长王子修，分驻于河套各地（这四支部队都是在一九三六年绥远抗战百灵庙战役后，反正过来的部队，人员武器装备等均差）。另有归傅作义部指挥的东北挺进军马占山部，（驻伊克昭盟准格尔旗哈拉寨地区）以上总计兵力约三万余人，实际真正能参加作战的兵力还不到二万人。

（四）昼伏夜行，秘密进军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三日，傅作义将军亲率作战指挥部人员，由陕坝进抵五原，召开部队长军事秘密会议。首先将攻击包头日军对整个抗战的重大意义，敌我双方情况及袭击包头战斗应注意的事项与可能发生的一些情况，作了详细的指示。而后，即命令各部队：

1、我军以奇袭的战略决策，强攻的战术准备，必胜的战斗信心，并按在进军途中与敌打遭遇战进行战斗部署，预计在十二月二十四日夜间

向包头之敌发起进攻。

2、骑兵第七师由马七渡口渡河，于十二月二十日前进至包头以东萨拉齐县与归绥之间地区，先破坏平绥铁路，然后以游击战术牵制敌人，阻止萨拉齐以东的敌人向包头增援。

3、新三十一师附五临警备旅第一团于霖瑞团及山炮一营为左纵队，沿包五公路向包头前进；新三十二师附山炮一营为右纵队沿包五大道向包头前进，并与左纵队确保联系；一〇一师附山炮一营为后续部队，跟进左纵队。

4、游击军马逢臣旅秘密潜入包头以北山地埋伏。如包头之敌在包头以西迎战我军时，该部即乘隙抢攻占领包头城。

5、新六旅王子修部进驻大余太至包头之间的后口子，构筑阵地以阻击由大余太方向增援包头之敌。

6、三十五师马腾蛟部附马彦骑兵旅，沿乌镇及乌梁素海至西山咀一线布防，守备河套地区。

以上各部均须于十二月十五日夜开始行动。向包头挺进的各项部队务要昼宿夜行，途中尤需注意严密封锁消息。各部队均需于十二月二十日前到达指定地点，并将执行情况及时电知本部。

各部队奉令后，同时于十二月十五日夜开

始行动。十八日下午，傅作义将军为及时指挥部队打好这一战役，率参谋长鲁英麟及幕僚从人进至新三十一师宿营地，召集孙兰峰师长，王雷震副师长，孟昭第参谋长，刘振蘅炮兵指挥官举行战斗前的紧急会议。令我骑兵第七师过黄河，进至萨拉齐县和归绥之间地区后，歼灭东西老藏营子村内担任守护铁路的伪军，又令将包头至归绥之间的一段铁路破坏，现正向萨拉齐县之敌发起进攻的战报通报后，即给新三十一师下达如下命令：

一、我骑兵第七师已于十二月十八日挺进至归、萨之间地区，铁路已破坏，现正在该地区游击牵制敌人。二、该师附于霖瑞团及炮兵第二十五团（欠一连）为攻城部队，孙兰峰师长为攻城指挥官，刘振蘅为副指挥官。三、如该师进军途中被敌发现，敌出城攻击我军，即行遭遇强攻战，将出城之敌予以歼灭。如敌毫无察觉，该师即于二十日夜间向敌开始攻击，一举袭进城内，全歼守敌占领该城。对伪军要尽量争取其反正。对市民要做到秋毫无犯，纪律严明。攻城时，应由北面主攻，东西助攻。攻城部队突入城后，要递次轮番攻击前进，向敌猛冲猛打，推墙破壁，穿越庭院，歼灭敌人。四、马逢臣旅到达指定地点后，即选择有利地形阻击增援之敌，掩护该师侧背，并归该师指挥。五、在夜间攻击时各部队务

要密切配合，同心协力一举全歼敌寇占领包头城。六、进展情况随时具报。

新三十一师奉命后继续向前挺进。但到十九日下午六时半，傅作义将军接到派往骑兵第七师门炳岳部的联络高参苗玉田来电，称该部于十九日与日寇激战后，已由萨县正南原路向后撤退。这时傅将军考虑，虽然破坏了一段绥、包之间铁路，暂时可以迟滞日军西进，但我军在二十日夜攻击包头时，敌援军赶来，袭击计划则不好实现。为实现战略目的，必须抢在敌人之前。于是决心改变原作战计划，将攻城时间提前一天，改为十九日夜间行动。但此刻新三十一师尚在行军途中，无线电联络停止，变更计划的命令无法下达。傅作义将军为使孙兰峰师长能及时接到改变攻击时间的命令，特派我和王兴参谋二人骑上他的特快坐骑，给孙兰峰师长驰送命令，并令我留在该师监督命令执行。

孙接到改变计划的命令后，即向所属各部下达攻城命令：

1、本师附五临警备旅于霖瑞团，炮兵第二十五团（欠一连）为攻城部队，于今（十九日）凌晨二时向包头之敌开始攻击，进城后要一鼓作气，全歼城内之敌，占领包头城。2、九十一团及于霖瑞团为主攻部队，由北城墙登城，攻击城

内之敌。九十一团靠东，于霖瑞团靠西，分别攻击前进。3、九十三团附山炮一连为助攻部队，由东城进攻，并阻止东来增援之敌，掩护我攻城部队左翼安全。4、炮兵第二十五团（欠一连）由副指挥官刘振蘅指挥，在包头西黄草洼附近占领阵地，于拂晓前对城内各敌据点之敌完成射击准备。5、九十二团为预备队，位于三和号附近，对固阳及东来之敌严加戒备。6、各攻城部队统限于今日二时前到达攻击准备位置。于夜间二时，同时向城内之敌发起进攻。7、师司令部位于黄草洼，由师通讯连向各团构成通讯网。

（五）我军向包头城发起总攻

新三十一师各团奉命后，即以急行军速度向预定点前进。当九十三团安春山团长率部抵包头城西北高地附近时，发现西北门关厢敌阵地及碉堡内无守敌。这真是想不到的良机和最好的突击点，即令该团第一营迅速通过战壕架设云梯，准备爬城。突然听到守城的伪军低声问道：“你们是中国军队吗？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请由这边上，这里好上”。使我军顺利地登城。并在投诚伪军的帮助和指引下，出其不意地将守城的日军十数人，用刺刀刺死，占领了西北门，进入城内。与此同时，盘踞在北营盘的伪蒙军见我军由水巴洞爬城时，也打出白旗投降，至此我军不发

一枪顺利进入城内。由于我官兵同仇敌忾，奋勇杀敌，争先恐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猛烈攻击目标，于是枪声、炮声，手榴弹声，响成一片。包头城内之敌，尚不知我军从何而来，更不知我军兵力多少和已占何处。急切之间，乱作一团。如当时各团能够互相协同，密切配合，一鼓作气向敌猛烈冲击，使敌措手不及，无法招架，包头全城即可一举全部占领。但因夜间作战各部队歼敌心切，只顾各自冲杀，未能互相联系，紧密配合，致使守敌得以进入据点及街道碉堡，以火力封锁阻止我军前进，形成对峙状态。十二月二十日晨七时半，孙兰峰为统一进城部队指挥，令王雷震副师长率九十二团三营到包头城，设前沿指挥所，直接指挥城内各部队互相配合，扩大战果。王雷震到达后，将九十二团第三营拨归安春山直接指挥，以增强战斗力量。各部队归王统一指挥后，即同敌人展开巷战，形成逐街逐巷地争夺。有的据点和院落我军攻进去，又被敌人打出来，形成拉锯状态。我军虽然伤亡很大，（九十一团一营一连连长王纯刚阵亡；二营六连崔新建连伤亡甚重；三营副营长王玉科阵亡；九十三团连长姚德增身负重伤，将腿打断；四连连长程文明被敌机枪打伤阵亡。）但我官兵仍奋不顾身，前仆后继英勇顽强，继续猛冲猛打。最后将敌压缩

在前街以南地区，城内大部地区均为我军所控制。因为我军所占西北地形较高，居高临下，敌虽多次反击，均未奏效。后来敌人又用坦克向我猛攻多次，也被我军击退，我九十三团司号长申士芳用集束手榴弹击毁敌坦克两辆。正当我军同敌进行巷战，战斗最激烈时，北营盘的伪军，见我军袭进城内，占领制高点，控制很大地区，即打出白旗向我军投降。包头的市民见我军攻进城内与敌进行巷战，无不欢欣鼓舞。有的主动上房顶向我军提供情报。如：某院内住的是什么敌人，某处有什么样的工事，某院内敌人最好打，等等。有的冒着敌人的炮火给我军引路，有的将家中仅有的好吃的东西拿出来给战士们吃。特别是饭馆、餐厅以及糕点店等商户，都把最好的饭菜送给我们的战士食用；还有一些人帮抬伤兵、搬送弹药，极大地鼓舞了我军士气。

（六）傅将军亲临前线指挥作战

在我军攻击包头城的同时，傅作义将军特令游击军司令马秉仁指挥骑兵游击部队刘占魁、赵炽昌、王万福等部于十二月二十日晨赶到包头城东二里半以东地区，破坏包头以东铁路。占领有利地形，阻击由铁路来增援之敌。孙兰峰师长也令马逢臣旅，在包头到归绥的公路与铁路中间地区选择有利地形，伏击由公路乘汽车前来增援之

敌。二十日下午由固阳方面向包头增援的日军，进到三和号附近与我九十二团郁付义部发生战斗，被我军击退。与此同时，由包头城内开出小卧车一辆，在一辆满载日军的大卡车掩护下，向归绥方面急遁，被我马逢臣旅曹子谦团阻击，敌惶惶弃车躲进村里，在一有围墙的大院之内，进行顽抗。卧车之内坐有日军官及妇女数人。经炮兵火力掩护曹团猛烈攻击，该敌全部歼灭。

傅将军为了解战况，掌握战机，及时指挥全军作战，特于二十日夜晚十二时，亲到黄草洼孙兰峰师长的指挥所，听取了包头城内战斗情况后，即指示孙兰峰说：“我军既已占领包头城内大部地区，应即保持战果，机动击敌。估计天明后敌人将从各个方面调来大军增援。我们必须将‘攻城打援’改为‘看城打援’，以阻击增援之敌”。适在此时，九十一团副团长白照元，九十三团迫击炮连长王步云受命前来汇报战况。并提出包头城的伪军多愿反正起义，要求傅副长官委以名义，便能调转枪口打击日寇。傅正与参谋处长张副元填写委任状之际，在三和号的九十二团郁付义团长来电话（当时是我接的）报称：“增援之敌数目不详，在数辆敌坦克掩护下向我团沈金声营（第二营）猛烈攻击，战斗非常激烈。”这时在孙兰峰的指挥部也能听到激烈的枪炮声，不大一

会儿，郁又来电话说：“敌在坦克掩护下攻击猛烈，战况紧急，第二营坚持不住，派第一营赵林桥营长率该营前往堵击”。当时我在电话上即对郁说：“头（战时，对傅的代称）在这亲自督战指挥，望速将敌击退，以保安全。”郁团长听到傅亲临前线，精神极为振奋，遂答道：“请告长官放心，我们一定全力以赴，阻击日寇，不使指挥部受到影响。”这时傅将军为鼓励士气让我告诉郁说：“几辆坦克有什么可怕？用集束手榴弹就可以把它炸毁嘛！”在此战局紧张的情况下，我感到指挥中心离第一线太近，向参谋处长张副元建议：“应该换一下位置较好。”张遂向傅说：“总指挥部和孙师长的指挥所在一起不适当，需换下位置才好。”傅遂对孙说：“让郁团把敌人顶住，我马上调部队配合你们将这股敌人歼灭。”同时又指示白副团长及王连长说：“你二人可以带些空白委任状回去告诉你们团长，愿意弃暗投明，调转枪口杀敌立功者，均可委以我军名义，待战后，论功行赏”。

傅将军走后不久，战况即缓，枪声停止。原因是郁团官兵听说傅将军亲来前线指挥，士气大振。日寇从赵营正面攻不破，转而后撤，从右边山后迂回过来。拂晓敌将三和号山头占领，踞高临下直向黄草洼孙兰峰的指挥部猛烈射击。这

时，师部掌握的部队只有一个特务连（警卫连）和通讯连，情况确实紧张。参谋长孟昭第即指挥这两个连占领几处坚固院落，在大门楼上用麻袋构筑工事，准备抵抗冲下来的敌人。孙兰峰师长为激励士气，也登上房顶观察敌情。就在此时，忽听正南方向喊声大震，似有另一股敌人包抄过来，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孙兰峰问我，“你上过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你听这声音是不是日本鬼子的喊声？”我回答说：“听声音不象日本鬼子的喊声，让号兵联络一下就会明白的。”号兵吹号联络，对方回答是新三十二师的第九十四团。接着该团副团长赵晓峰率第三营跑步赶到，向孙师长报告说：“我团前来增援，请示行动。”孙当即命令援兵从右边山崖迂回，从敌之侧背，攻击我正面之敌。赵走后，九十四团杨新剑团长又到对孙说：

“我们来迟了一步，老旅长受惊了！我团在半道上碰到副长官说，老旅长（孙任二一一旅旅长时，杨曾在该旅任过团长）的指挥部被敌包围啦！命令我团跑步增援，所以我团部队一面跑步前进，一面高喊：“老旅长我们来了！”孙说：“不是靳参谋叫号兵联系，几乎发生误会。”

赵晓峰率第三营绕攻敌侧背时，三和号山旁的九十二团也奋力助攻，敌受两面夹击，不支而溃，战情转缓。孙师长即令杨团长着该团苗营留

在原地监视敌人，候令行动。并着该团第二营卢怀义营掩护炮兵第二十五团炮兵阵地（该团集结在黄草洼阵地，准备集中火力支援攻城部队）。其余在原地待命。同时命王雷震指挥入城各团迅速扩大战果，全歼城内之敌，并准备迎击归绥方面援敌。

（七）日援军大批开来，黄草洼展开激战

按照傅作义将军的作战计划和兵力部署，对由大余太和固阳方面向包头增援之敌，已有埋伏部队阻击，敌军不可能大量尽快向包头靠拢。但当大余太之日军行经后口子时，我新六旅只予敌以阻击，未能将日寇歼灭。另一部日军行经前口子时，我新三十二师鲁乐山营发现敌人后，认为敌人数量不多，未予迅速包围聚歼，而是劝敌缴械投降，致使敌趁机逃脱。两部日军在包头附近会合后攻击我军，使整个战局受到很大影响。一〇一师三〇二团第一营在进军中攻占前口子后，伪残骑兵逃进昆独仑召东南新城村堡子里。该营未及时迫敌投降，使之逃脱后又协助日寇攻击我军，也对战局起了不利作用。

二十日下午二时许，日寇由张家口、大同等地，调来大批援军，空中有六架飞机轮番轰炸、扫射；地面有炮火掩护步兵向我进攻。其一部向东门外转龙藏附近我九十三团冯梓副团长指挥的

两个营进攻，战斗非常激烈。其大部向黄草洼孙兰峰师指挥部进攻。当时我军一〇一师和新三十二师尚未赶来，黄草洼的兵力只有九十四团掩护炮兵的一个营，这个营的士兵大部分是新兵，战斗力较差。加之敌军上有飞机轰炸扫射，下有猛烈炮火攻击，一个警卫连，是抵挡不住日寇陆空协同，步炮联合进攻的。为避免不必要牺牲，孙兰峰即将指挥部转移到北山脚下一个村庄（村名失记）继续指挥作战。

大批日寇援军，在攻击我黄草洼的同时，并向占领西北关的我军进攻，被我九十一团击退。这时，我新三十二师袁庆荣师长率九十五及九十六两团挺进黄草洼附近，当即向敌展开攻击，战斗异常激烈，我军伤亡较重。（师部少校参谋王晓鹏在敌机轰炸时阵亡，九十六团两个连长阵亡，一个营长重伤）。接着一〇一师董其武师长也率全军赶到，当即投入战斗。在毛鬼神窑子一带同敌展开激战，战斗十分激烈，三〇三团梁超连打的艰苦顽强，一个排长重伤，连长梁超也受重伤，全连最后只剩十几个人，一直坚持战斗到夜晚。

（八）完成牵敌任务，全军顺利转进

当时傅作义将军的计划是，如果敌援军的兵力不大，即拟在包头城外黄草洼附近地区，运用

“看城打援”的战术，集中兵力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打击一下日寇的嚣张气焰，再行转进。后见日寇援军陆续不断大批增加，兵力达一个多师团约二万人，原计划不易实现。同时华北各地之日军已大部调来增援包头，牵制敌军之战略任务已经完成。遂令各部队停止战斗向河套转进。命令各部：

一、我军攻入包头城内，歼敌甚多，并牵动了华北各地之日军主力，配合湘北战场作战任务已经完成。二、我军为避不利，找胜利，各部队应即于本日（二十一日）夜脱离战斗向中滩转进。三、一〇一师为后卫，待我城内外各部队撤退后随之转进，并派轻装精锐一部阻击追击我军之敌，以保我军顺利转进。

各部队受命后，即行分别转进，唯攻入包头城内之我军，有部分部队因敌我胶着，一时难以撤出战斗，至二十二日天将拂晓始行脱离战斗。另有三位无名英雄，在城内一个庙内，被日寇包围，战斗到弹尽粮绝，最后用手榴弹与冲进庙内之敌，同归于尽。后来称这三个战士为“包头庙内的三位无名英雄”。

这次战役历经两天两夜，打死打伤敌军二千余名，击毙敌骑兵联队长小林一男大佐和另一联队长小原一明大佐等以下军官二十余人（小林、

小原二人负绥敌骑兵指挥之全责。日寇损失之惨重可知），击毁敌汽车百余辆，坦克三辆，缴获敌小炮四门，轻重机枪、步骑枪、手枪、望远镜、防毒面具、地图、战刀、文件等数百件，（此物曾运往后方展览过）。伪军有部分人员反正。另有前口子驻地的伪军于振瀛团，被我一〇一师三〇三团路经该地时全歼，俘虏于振瀛本人。

我军伤亡二千余人，丢失山炮数门。袭取包头之战，虽未全歼守敌，收复该城，但我军之行动完全出乎日寇意外，尤其是我军从远达数百里河套出发，行军数日，一举袭进包头，而守敌毫无察觉。特别是将敌酋、骑兵联队长小原、小林击毙，更使敌受到沉重打击。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军还未有过如此成功的奇袭战例。因此日军侵华大本营老羞成怒，除将包头之日军指挥官小岛司令撤职外，为对我军进行报复，又调集平绥铁路和同蒲铁路沿线各地的日军，向我河套大举进犯。

二、会战绥西

绥西指绥远省西部的河套地区，“黄河百害唯富一套”，就是指的这个地区。这里盛产小麦，是国内有名的产粮区之一，素有粮仓之称，又是祖国的西北大门和战略要地。

绥西战役，是日本帝国主义者进犯河套，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傅作义将军率部反击，自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下旬开始，至准备反攻五原为止，历时三个月之久。

(一) 日军集结重兵企图进犯河套，我军严阵以待

我军袭击包头后对敌构成严重威胁，日寇认为傅作义军队的存在是他的心腹之患。为消除这一隐患，确保其包头、归绥两个军事要地。日军即以膺惩傅作义军为口号。自一九四零年一月十六日起由平绥，同蒲铁路沿线的张家口、大同、太原、临汾等地纠集日军二十六师团，并配以第十一、十二、十三各联队，二十六骑兵联队，第十一炮兵联队共三万余众，汽车近千辆，由黑田重德师团长指挥，在十二架飞机与坦克、炮兵的配合掩护下，向我绥西河套地区大举进犯。并梦想短期内全歼我军。傅作义将军得知以上情报后，即于元月十六日在五原召开团长以上部队长会议，研究对敌策略。经讨论提出三种打法：一、在敌进犯必经之路，选择有利地形伏击敌人。二、在乌镇、乌不浪口一线，利用既设阵地同敌打阵地战。三、诱敌深入河套腹地，将之装进口袋，以游击战消耗歼灭敌人。最后傅将军总结说：日寇集结重兵大举进犯河套，其目的在于以优势兵

力歼灭我军，侵占河套这块粮食宝地。但敌兵力是从各地临时抽调而来，只能与我军短期作战，难以持久。兵力不足是日寇的致命弱点，其战术上要求速战速决，企图很快歼灭我军占据河套。我军为避其锋芒扬长避短。既不能与敌打“阻击战”，也不能同敌打“阵地战”。我们的决策战略是要“避不利，找胜利”，“不失机，不吃亏”，既不能让敌人捕捉到我军主力，打击我有生力量，又要能及时阻击、伏击、袭扰敌人，给敌以沉重打击。在战术上要运用“以少牵多，以多打少”，“能打则打，不能打则走”的游击消耗战，相机歼灭敌人。使能集小胜为大胜，消耗和打击敌人有生力量。做到使敌想打，打不着；想占，占不稳；想走，走不了。从而消耗敌人，使敌无法持久下去。

根据上述原则，傅作义将军给各部队下达如下命令：①骑兵第七师在西山咀、马七渡口地区，阻击由前山向河套进犯之敌。予以沉重打击后，转移到黄河右岸，威胁敌人左侧，机动袭扰敌人后方，截击敌人粮弹，迟滞敌人前进。②三十五师附马彦骑兵旅，利用乌镇和乌不浪口既设阵地，阻击由后山向河套进犯之敌，予以迎头痛击后，转入狼山山麓，威胁敌之右侧。待敌入套后，即以狼山为依托，机动袭扰敌军，游击、牵

制、消耗敌人。③三十五军各师，同敌之主力打机动战，相机歼击敌人。④五临警备旅，绥远省游击军，新六旅在各防地完成阻击任务后，在五原以北狼山东西地区，向敌展开游击，相机打击消耗敌人。⑤各部队的后勤留守人员，一律移至后方磴口、石咀山地区；三十五军政工人员化装潜伏五原城内外，动员组织民众，侦察敌情，传送情报，救护运送伤病员，积极配合我军作战。⑥五原、临河、安北各县政府要充分发动地方各级行政干部，协助农村实行“空室清野”，安定民心，鼓舞斗志，破坏敌占区秩序，使敌无法立足。⑦各部队情况及时报部。

（二）日寇分路进犯，我军迎头痛击

一月三十一日，集结在包头之日伪军，分兵两路向我河套进犯：一路沿乌拉山麓包、五公路前进，行经前山蓿亥滩遭我骑七师前哨部队阻击。激战一日，入夜我军转移，敌继续前进。二月一日敌在马七渡口与我骑七师主力部队发生战斗，敌在飞机、大炮的协同下向我军猛攻。激战终日，双方伤亡均重，夜晚我骑七师转移。该师又在阳高圪旦一带向敌进行侧击，迟滞敌人前进，苦战一日，入夜转移到黄河右岸惠德城一带地区。敌另一路由后山向我乌镇，乌不浪口守军三十五师及马彦骑兵旅发起进攻。敌在飞机、坦

克、大炮掩护协同下自晨至晚，向我军猛攻多次，均被我军击退。入夜敌使用毒气也未得逞。二月一日，我军阵地虽被敌人突破，但仍坚守据点与敌进行顽强战斗。后因敌后续部队大批参战，并以主力向我乌镇围攻。我守军伤亡过重。（迄今在该地还能看到我阵亡官兵坟墓一百四十四处，可见当时战斗之激烈），又遭敌侧后攻击，战斗非常艰苦。当时傅作义将军在五原指挥战斗，得悉此情况后，即令三十五军一〇一师董其武师长率部增援。并派我到该师联络督战。同时又命绥远省游击军马秉仁部在折桂乡（五原北三十华里），从西沙梁地带向敌侧后攻击，支援一〇一师，并派高级参谋苗玉田随军联络督战。傅将军当时看出敌主力在乌镇及乌不浪口，即拟先在乌镇，乌不浪口，与折桂乡之间地区，集中三十五军全力予敌以沉重打击。然后各部再分别向指定地区转移，进行游击消耗战。遂令一〇一师向乌镇，新三十一师向乌不浪口以配合马腾蛟三十五师及马彦骑兵旅围歼进犯之敌，并令新三十二师随时准备出动支援两方面的我军。当我一〇一师先头部队三〇一团急进到乌镇附近时，三十五师马腾蛟及马彦骑兵旅，因阵地被敌军突破，为避免重大损失，已沿狼山向西转进。进犯之敌进至乌镇以西沙梁等地区与我增援部队一〇一

师三〇二团发生战斗。此时，敌军以部分兵力与我三〇二团作战。其主力部队则向我五原方向突进。董其武师长见此情况即亲自指挥三〇三团进入折桂乡堡内，依据土堡，阻击敌人。并令三〇一团在堡外选择有利地形，相机攻敌侧背，支援三〇三团并掩护三〇二团之侧后安全。当董其武亲率三〇三团进入堡内时，被敌机发现，疯狂向堡内我军轰炸、扫射，并给敌炮兵指示目标，向堡内炮击。战斗进入白炽化异常激烈，敌向我多次反复猛攻，均未得逞。当战斗最激烈时，傅将军亲自打电话命董其武师长，务要阻止当面之敌向五原进犯，并要求坚持到夜晚才能撤退转移。董刚接完电话，突然，一颗炸弹落到房旁，要不是房屋坚固，董和我同师部参谋主任师模，将均被炸伤。

董师长奉命后，即令三〇二团郭景云团长阻击进攻之敌，令三〇三团王赞臣团长依堡战斗，务要竭力阻敌前进。又令三〇一团王建业团长派兵支援郭团，掩护其侧背，同时向猛攻我三〇三团之敌进行侧击。并严令各团必须坚持到夜晚，接到师部命令方可转移。各团奉令后即同敌展开激烈的战斗，敌军虽有飞机、大炮、坦克掩护向我猛烈攻击，均被我军奋勇击退，未能向五原推进。战况特别激烈，敌我双方伤亡均重。我三〇

一团高炳仁连长阵亡，梁德龙连长受伤。三〇三团连排长数人受伤，王赞臣团长也受伤。战斗直到夜晚始行停止。这时，敌既不能同我军进行夜战，又不能连夜向五原前进（怕我军伏击）。遂将坦克围在敌部队四周进行露营，并用汽车灯光将阵地外照明，给敌壮胆并防我军夜袭。

战斗停止后，我军即向后方运送伤员，整顿部队准备转移。入夜董其武师长命令各团连夜脱离战斗，沿狼山向西转进。按三〇三团，三〇二团，师司令部，三〇一团之顺序，陆续跟进。是役击毁敌汽车四十余辆，击毙、伤日寇三百余名，我军伤亡也重。董其武师长随军撤至折桂乡以西沙梁地带时，与我游击军司令马秉仁会合，并接到副长官命令，令各部队沿狼山向西撤退转移，对敌进行机动和游击战，相机歼灭其有生力量。董、马两部接到命令后，即甩掉日军向西转移。苗玉田高参和我二人亦相继返部复命。

日寇侵占乌镇和乌不浪口后，又分兵两路向五原攻击前进。一路由乌镇经折桂乡向五原进犯，遭我一〇一师阻击。另一路由乌不浪口沿狼山南麓、乌拉壕北岸前进，行至黑石虎及三女店之间时，被我新三十一师埋伏部队九十三团集中火力痛击。敌仓惶应战，伤亡甚重。敌另一部乘坐汽车行至刘存福圪旦莫苋芦苇道旁时，遭我九十

一团伏击，同敌战至傍晚，战斗始行结束，敌我伤亡甚重。我二营四连三个排长二人阵亡，一人受伤，全连只剩下连长和士兵九人。第六连连长崔新建和代营长吕恒洲均受重伤。黄昏后，敌沿狼山南麓与我军对峙，我军除一部留原地牵制敌人外，主力向西沿狼山迂回至三女店，黑石虎之间敌之侧背，袭击敌之汽车部队，打伤敌百余人，击毁敌汽车数十辆。而后撤至万和长附近。二月二日晨敌在飞机、坦克掩护下，向我新三十一师第九十一团及第九十二团阵地猛攻。我官兵奋勇抵抗，激战达三小时，敌我双方伤亡较重。孙兰峰师长为避免我军过多牺牲，在予敌以严重打击后，即行撤入狼山沟内，相机打击敌人。

二月二日下午沿包、五公路向五原进犯之敌，在四牛头圪旦附近，被我新三十二师九十六团黄纯烈团及九十五团张世珍团，利用沙丘地带敌坦克、汽车不能发挥威力时，同敌激战。敌步兵虽有飞机、大炮掩护向我军冲击数次，均被我军奋勇击退。激战至黄昏，敌主动撤离战场。我军乃乘夜间撤退。新三十二师袁庆荣师长也完成阻击敌人的任务，命所部向西转进。

（三）我军分兵转进，相机歼灭敌人

二月二日夜晚，傅作义将军根据作战情况，将指挥部由五原转移至临河东南。二月三日日寇侵

占我五原县城后，分兵两路向临河、陕坝西犯。我一〇一师、新三十一师及新三十二师，各自与敌保持适当距离，严密监视敌人行动，同时向有利于游击战地区推进。

此时，傅作义将军认为诱敌深入展开游击消耗战的时机已到。即令一〇一师、新三十一师及新三十二师，各自为战，机动打击向临河、陕坝进犯之敌，并令其它各部队在防区对敌展开游击战，打击消耗敌人。并连夜将指挥部移至黄河北岸小召附近黄家壕（临河东南），此时接到蒋介石由重庆发来电报一份。内容：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病，令傅作义将军去兰州代理司令长官，将部队撤退至石咀山一带地区，指派专人负责指挥。傅将军接电后召集司令部处长以上干部开会研究。有的主张部队暂行西撤，进行补充整训，而后再东进收复失地；多数人主张作战到底反对西撤（其中尤以骑兵团刘春方团长最为坚决）。会后傅将军复电蒋介石，电文中有这样几句话：“将不离兵，兵不离阵。将不离兵，兵有主、兵不离阵，阵能存，誓守国土”。表示不去兰州，同敌周旋到底，相机收复失地的决心。并给各部队下达如下命令：

一、敌人进犯我河套，主要目的在于打击报复我军，以速战速决，消灭我军主力，使我无法再

行反攻，从而占领河套，以巩固其绥、包据点。二、我军诱敌深入，采取游击消耗战，主力以顺利转移到有利地区，且予敌重创。三、敌寇调集平绥、同蒲两线兵力入套，后方空虚，不可能久留河套作战。四、我军同仇敌忾，士气旺盛，军民合作，共同杀敌。五、根据以上情况，我军各部将按令在防区内坚持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北依狼山，南靠黄河两岸，疲惫消耗，相机打击敌人，待机反攻，收复失地。六、希各部遵照执行，互相支援，密切配合，同心协力全歼入侵之敌，并将各部战况随时报部。

三日上午敌机三架轰炸，扫射黄家壕我指挥部，炸死骡马十余匹，官兵数人受伤。半小时后又来敌机三架，狂轰滥射，此时已有防空准备，是以无大伤亡。敌机飞走后，指挥部即向什纳格尔庙（黄河南岸沙梁内）转移。那天夜晚正是阴历除夕之夜。由于沙高坡深，步履艰难，人困马乏，傅将军着令暂停休息，找寻沙蒿、芨芨燃火取暖，烧土豆充饥。虽然战火纷飞，生活又是如此艰苦，但官兵精神振奋，谈笑风生。认为这个大年三十过得非常有意义。四日晨（农历大年初一），上午十时半到达什纳格尔庙，又遭敌机轰炸、扫射，炸毁寺庙房屋十余间，伤马数匹，骑兵团连长梁学曾负伤。这时大家都在怀疑，为

什么我们走到那里，敌机就跟踪轰炸到那里？是不是有汉奸跟着我们？事后得知原来骑兵第七师向伊盟桃力民地区集结，被敌机发现跟踪而来。傅将军得知是门炳岳军长率骑兵第七师到此，即令三十五军副军长张耀清前往迎接。门见傅说：

“骑兵部队伤亡过重，必须到后方桃力民整训一个时期。”与此同时，马腾蛟师和马彦骑兵旅也撤退到宁夏石咀山地区整训。

各部队受命后，一〇一师转进到狼山湾板匠圪旦一带，新三十一师转进到圪圪补隆、柳树泉、付家圪旦等地区，均能相机灵活打击敌人。新三十二师转进到铁匠圪旦附近，将尾追该师的伪蒙骑兵师，诱至有利地形予以重创，而后转进到蛮会西北贾来宝圪旦地区，机动打击敌人。绥远省游击军，新二旅以及其它各部队，均各北依狼山或南靠黄河，向敌展开游击，相机消耗打击敌人。五原县李吉祥县长带领该县保安队三百余人，在该县南锦云圪旦附近伏击敌人，歼敌百余名。

二月四日由五原向临河西犯之敌，行到张家庙（临河县东二十余华里）附近沙梁地带，遭遇我预伏在该地的五临警备旅的沉重打击，使敌人进到临河城郊，迟迟不敢入城。当日下午敌继续西犯黄羊木头（临河县西南四十华里）。同日由

北路向陕坝西犯之敌，在临河东北八十华里的百川堡（今之新华乡）附近，被新三十二师的机动部队，拦腰截断将敌分割为二，予以重创。黄昏前我主动放弃陕坝，敌进占陕坝后，因我“空室清野”工作比较彻底，使敌一无所得。五日黄羊木头之敌，又西犯头道桥进至沙梁地带，遭我游击部队猛烈袭击，敌被迫退回临河。

（四）日寇被迫后撤，我军收复陕坝临河。

二月六日傅将军根据战况，通令各部与敌保持相当距离，监视敌军行动，轮番向敌袭扰。此时之日军孤军深入，战线太长，兵力分散，首尾不能相顾。再加当地民众实行“空室清野”，人吃马喂给养都成问题，不得不向东后撤。傅作义将军据此，即令我三十二师袁庆荣师长分兵向临河、陕坝急进，收复两地。日寇被迫撤到丰济渠以东地区。进犯河套的日军，大部向包、绥方向撤走。敌在撤退途中，不时遭到我军伏击，仅五原县李吉祥县长率县保安队，在兴旺堡附近截击退却之敌，即缴获敌白面、大米三百多袋、骆驼耕牛四十余头，弹药及医疗器材药品等。我一〇一师、新三十一师以及其他部队，均有缴获。敌为巩固其已侵占的五原一带，除在五原四周各据点加紧设防外，又网罗地主全喜亭、杜风山、刘耀山等汉奸成立伪政府。命汉奸匪首王英成立

伪绥西自治联军、并组织“宣抚队”为敌宣传“大东亚共荣圈”以诱骗民众，妄图安定其占领地区的社会秩序，巩固敌伪政权。

(五) 积极整训部队，待机收复失地。

我军收复陕坝、临河，日寇退到五原一带之后，副长官指挥部即由什纳格尔庙移至临河县东北之亚马赖。据可靠情报日军主力已向平绥、同蒲两线撤回原防，驻守河套日军精锐部队，最多超不过两个联队，其余则是无战斗力的伪蒙军骑兵师及汉奸王英的伪绥西联军和一些宪兵、特务、警备队等。

傅作义将军认为：日军主力回调，放弃陕坝、临河等地。一则华北日军兵力不足，唯恐平绥同蒲两线据点有失，且包头距临河六百余里，战线太长，兵力分散不易驻守；再则日寇错误的估计我军主力三十五军，已被打垮，短期内不能恢复，无力进行反攻。遂留少量日军，配以伪蒙军一部及王英的伪绥西联军，驻守五原一带，进可窥我大西北的前哨阵地，退可保绥包据点，且能搜刮河套之粮食，收“以战养战”之利。

傅将军为麻痹敌之错误估计，一方面对敌进行欺骗宣传，放出我军确已无力反攻的烟幕；另一方面命地方游击部队赵炽昌、刘占魁、张文梓、贺德胜等部以及新骑三师、新骑四师、新五

旅各部、留在丰济渠以东地区，不时向五原安北一带之敌进行游击袭扰；一方面则令三十五军各师，绥远游击军、五临警备旅、新六旅等部，在丰济渠以西地带集结，加紧整训，以备收复失地。同时抽调部队政工人员及地方行政干部，对日军西犯时所占领和所经过的城镇、乡村，动员民众进行清乡大检查，收缴敌人遗留的武器、弹药、物资，搜捕潜伏的敌探汉奸；对民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组织动员民众，准备反攻。为军民合作，共同协力消灭侵占河套之敌，打下良好基础。

这次战役在傅作义将军高超的指挥艺术下，既消耗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又保存了自己的战斗实力。在敌军的重压下，能机动灵活化整为零，不离开作战地区，为五原战役创造了条件。

三、五原歼灭战

五原战役是绥西战役的继续，是傅作义将军精心策划，亲自指挥的对日伪军进行一次毁灭性的打击，从而收复整个河套地区。这次战役，击毙敌绥西警备司令日本皇族水川中将一人，敌特务机关长桑原荒一郎中佐一人，敌联队长大桥大佐一人，战果辉煌，名闻中外，新闻界称之为“五原大捷”。

(一) 敌军分布情况

入侵绥西之敌为歼灭我军主力，曾西犯至临河西南四十华里的黄羊木头和以西的头道桥。由于孤军深入兵力不足，形成处处挨打之势，不得不急速龟缩，后撤到丰济渠以东地区。以五原县城为指挥中心，巩固其占领区。

当时日寇内部对是否永久占领五原，有两种不同意见：敌军参谋长田中新认为“不确保五原的作战，没有什么意义”（缴获文件中的田中一月十九日日记所载）军司令官冈部认为：“以现有的兵力去占领和确保五原是不自量力的，……归根结底目的不是要占领土地。”（出自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所著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田中表面上服从了司令官的意愿，而确保五原的思想并没有消除，故将日军留下二个联队，另有伪蒙军四个师及由察南和雁北地区抽调来的一部分地方守备队，还有匪首王英的伪绥西自治联军，日本宪兵队特务队等，总兵力约一万五千人。其高级指挥官有：日寇绥西警备司令水川伊夫中将，特务机关长桑原荒一郎中佐，联队长大桥大佐、浅沼次太郎等。日军分驻在五原平市官钱局（地方银行）屯垦办事处，及附近各院落。日宪兵、警官、指挥官、顾问，科技人员等，也都在五原城内。伪蒙军第四师的二十三

团及二十八团，伪蒙军二十二团及二十四团驻五原西南三十里之蛮可素。敌挺进队及守备队，炮兵大队均驻五原城内，伪绥西自治联军郭青云、陈秉义、常子义等部分驻五原南二十华里的南牛镇，同义隆及五原东北八十里的扒子补隆一带。伪五原行营主任乌古廷及伪绥西自治联军总司令汉奸王英驻旧日盛盐店及附近院内。日军为确保包头经大余大通往五原的交通要道，在五原以北的乌拉壕和乌加河上架设了坚固桥梁，并派有重兵扼守。调来日籍行政人员和技术人员约二百多人，准备开采我狼山矿产。根据我翻译的缴获日寇文件《狼山勘探矿产记实》所载，说明日本侵略者是妄图久占河套、大力开发资源，以达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目的。

（二）反攻前的整军会议

当日本侵略者进占我绥西河套后，蒋介石认为战局无法挽救，拟着傅作义将军到兰州代理朱绍良（已于前述），其它方面也认为我主力部队连续战斗近百日损失严重，元气大伤，败局已定，失地不易收复。但傅将军认为：如果我们不反攻五原、收复失地，今后不仅河套地区将被敌占领，即我西北后方各地，也将遭日寇侵犯。遂决心不惜牺牲一切，等时机一到，即采取果断行动，发起反攻。

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六日夜间傅将军在临河亚马赖召开参谋人员及团长以上部队长会议。会上傅将军首先简要地回顾了绥西战役，指出这次会议的目的：一是总结经验教训，整顿军纪；二是研究如何提高战斗士气，准备反攻，收复失地。在激烈的争论中有的认为，我军从一九三三年长城抗战开始，经过绥东抗战、百灵庙战役，直到转战山西，晋西北、河套地区已经七年多了，大小战役百余次；我们三十五军打了六、七年仗，部队打光多次，官兵伤亡太重，虽经多次整补，但未恢复元气。经过包头、绥西两战役，部队打的又快没有人了。如再继续打下去，就怕连老本也要完了，主张补充整训后再打；有的从各方面分析了我军及西北形势，认为“河套存亡，关系西北整个局势的安危，到后方整训补充，隔着八百多里沙漠地带，再打回来不太容易。丢下敌人不打，逃到后方整训，我军的光荣历史，将从此一扫而光。如不将日寇赶出河套，仅凭丰济渠一水之隔，是绝对存在不下去的。同时我军虽然损失惨重，装备劣于敌军。但士气旺盛，民心向我，坚持打下去，才是唯一出路。”其中以我和新三十一师参谋主任宋海潮，第九十三团团长安春山最为坚决。

傅将军最后总结说：“我军是抗日部队，每

个同志都是捍卫国家独立，民族生存的坚强战士。震惊中外的百灵庙战役，全国人民给了我军很高的荣誉，保卫祖国，收复失地，是我们每个同志应负的责任。应本我军一贯艰苦奋斗的精神，再大的困难，我们自己克服。誓与河套共存亡，虽剩一兵一卒也要战斗到底，为祖国为人民流尽最后一滴血。希望大家回去抓紧时机，加强部队训练，迎接新的战斗。”并宣布在绥西战役中，作战不利的绥远省游击军司令马秉仁，及在困难时刻，擅自脱离部队的新三十一师第九十一团团团长刘景新，交由军法处惩处。

（三）完成作战准备，待期反攻

亚马赖会议后，各部队开始了反攻五原的训练和准备工作。根据敌我形势的分析，傅作义将军认为我军反攻五原，敌增援部队最迟也不过三天即可到达。因此，我军必须采取速战速决的战术，先集中全力歼灭河套之敌，而后再打由包头经大余太前来增援五原之敌。作战方案是：首先攻击驻五原旧城的日军及其指挥部，而后分击五原四周的伪蒙军据点。他把这种打法名之为“掏心战术”。其次是“引水阻援”歼灭援敌。河套地区东西约三百华里，南北百余里，南临黄河，北依乌加河，东有乌梁素海退水渠，西与乌兰布和大沙漠接壤，八大干渠分布其间，支渠子渠纵

横交错构成河网区，隆冬季节，渠水冰封遍地可行。春还三月，冰消雪化，水涨春灌，路面翻浆，遍地泥泞，人骑尚难通行，汽车坦克更无法转动。傅作义将军乃决定利用春水上涨灌溉农田之际，集中兵力，一举全歼五原及其四周各据点之敌。在敌由包头增援路上，以乌加河与乌梁素海之间地区为重点，放水阻援，并断五原一带敌伪部队的退路，以达全歼之目的。预定反攻时间为一九四零年三月二十日夜。

傅作义将军对敌作战的要求是：“不打糊涂仗”“不打无准备之战，”“不打无把握之战。”为取得这次反攻战役的胜利，采取下列措施：

(1) 战前练兵。傅将军亲到各部队讲话，鼓舞士气。命令各部队加紧夜战、巷战、攻击坚固城镇据点的训练和演习。并亲自带着我和部队中的一些人员，到各部队进行战前动员讲话和战斗演习指挥。讲话内容最突出的有：“打敌必胜，怕敌必败，胆大沾光，胆小遭殃；敌前不危险，敌后最安全；轻伤不退，重伤不喊叫。坦克好打，汽车更好打。飞机不可怕，利用单人掩体即可掩护身体，只要炸弹丢不到掩体内，就不会受到杀伤。坦克有死角，打不着我们，用集束手榴弹就可以把它炸毁。汽车不可怕，打坏一

个轮胎，它就不能动。”高级军官这种激发士气的言语，对官兵斗志起到了鼓动作用。

(2) 组训掏心突击队。由新三十一师九十三团安春山团，绥远省游击军曹子谦团（番号是团，多次战斗减员，实际人数相当于营）及五临警备旅（原为屯垦部队）阎梦云营组成。以安曹二人分任正副指挥，制定反攻五原突击日寇指挥部的演习计划，多次进行反复演练。每次演习时，傅将军必带着我和其它有关人员亲自指导。从演习中假设的各种情况，到突击队受挫时的一些处置办法，都作了深刻详细的讲解和指导，为该队突袭日军指挥部的成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3) 缩编战斗部队。自亚马赖会议以后，各部队积极整训，尤其经过傅作义将军亲自指导之后，战斗情绪特别高涨。为了便于指挥，减少部队层次，充实战斗力量。暂将部队作战序列降级使用。即：师编为团，团编为营等等。

(4) 拟定“引水阻援”计划。特令新六旅王子修部在乌拉壕决口放水，并在附近地带阻击敌增援部队。其它各渠道的决口工作，由我和五原县县长李吉祥、安北县县长乔学曾会同水利“土专家”周二马、桂三娃等到现地缜密勘察，制定放水计划。其原则是：“掘口放水，必须是既能阻敌援军，又有利于农田灌溉”。计划拟出后由

傅作义将军亲自审定批准后，方可执行。

(5) 除上述措施外，还令一〇一师在丰济渠口，新三十一师在协城桥以北，趁渠水解冻前架设军用便桥，以备反攻之用；令驻天吉太桥的一〇一师三〇二团监视黄河动态，命令在桃力民休整的骑兵第七师于三月十日前到临河县以南的南台子、德和泉地区（实际来的是只有胡逢泰的一个团，由朱钜林副师长率领）；命令在石咀山休整的马腾蛟师开回临河，接替一〇一师和新三十一师的防务，使这两师得以专行准备反攻训练和其它有关一切。

(四) 黄河冰解渠开，我军发起总攻

一九四零年三月十八日，黄河及各渠已解冻，反攻的时机已到。傅作义将军令各参战部队，利用夜行军秘密向五原方向推进，并限于三月十九日，一律到达攻击准备位置。各部队到达后，傅将军即下达攻击命令如下：

(1) 我军定于三月二十日夜十二时开始向五原新旧两城及其周围各据点同时发起攻击。

(2) 安春山、曹子谦为掏心突击队正副指挥，率领该队从五原东南向五原旧城突进，猛攻城内义和渠以东地区的日军指挥部及其附近的日军。在袭击成功全部歼灭该敌后，突击队即归五原攻城总指挥孙兰峰指挥，全力歼击城内所有

之敌。

(3) 新三十一师师长孙兰峰为攻击五原总指挥，指挥新三十一师（欠九十三团），五临警备旅，炮兵第二十五团第一营，由五原城西向旧城城内义和渠以西地区，西关黑头圪旦及义和渠以东掏心突击队攻击目标以外之敌发起总攻，歼灭该敌。

(4) 新三十二师附炮兵第二十五团第三营为总预备队，令该师三〇一团王建业团长率领该团歼灭五原西北二十华里梅令庙及以北贾粉房圪旦防守乌加河桥之敌，破坏桥梁，阻击敌增援之敌。其余部队在消灭梅令庙之敌后，准备向县城及乌加河桥两个方面扩大战果。

(5) 朱钜休副师长指挥骑兵第七师之一部向五原西四十华里新公中西商之敌进攻。将该敌歼灭后，追击由五原方向溃退之敌。

(6) 新六旅旅长王子修部，先行爆破五原以北四十华里老杨圪旦附近的乌拉壕堤坝，放水浇灌万和长（乌拉壕北侧只有几户人家的一个小村子，距五原四十五华里）通往五原的公路，然后攻占万和长，阻击增援之敌。

(7) 绥远省游击军及新五旅跃进安北（扒子补隆）西山咀、马七渡口一线，选择地形隐蔽埋伏，阻击由南线公路增援之敌及截击从五原方

向溃退之敌。

(8) 新骑四师在攻克五原南二十华里南牛旗之后，即转为追击部队向败溃之敌进行追击。

(9) 第三游击支队司令李作栋率各游击部队在攻克五原西南三十华里蛮可素，五原西南二十五华里郝镜桥（五原到临河的公路上）之后，转为追击部队，向溃退之敌追击。

(10) 五原及安北两县政府尽力发动民众作好引水灌路，阻敌增援，协助部队歼灭敌人，收复失地。

傅作义将军为便于掌握各部队的作战情况，及时组织各部队战斗，在下达命令后，即率指挥部人员到梅令庙（五原西北二十余华里），亲自指挥作战。各部队战斗经过如下：

一、掏心突击队于三月二十日夜，由攻击准备位置五原城南三十华里的和合源出发，向五原旧城疾进，至已折毁的城门口时，发现两个日本兵和四个伪蒙军守卫。我战士乘敌不备，手刃两个日本兵，四个伪蒙兵投诚。我突击队未放一枪全部进入城内。当时，日军聚集在义和渠以东地区，主力部队及指挥部驻平市官钱局（地方银行），屯垦办事处和实验小学等处，各院落皆打通，并由筑有碉堡外壕铁丝网，构成一个坚固据点群。我军向敌发起猛攻，敌军从睡梦中惊醒，惶惶应

战。激战约三小时，将敌指挥部周围一些据点占领。只有盘踞在平市官钱局和屯垦办事处两个据点内的日寇拼死顽抗，我军屡战不克。天明，日寇飞机数架飞临上空。因我军尚未将已夺回来的据点上的日本太阳旗扯下来，敌机误认为这些据点仍为日军占领，同时又误将援敌的守备队当作我军，进行疯狂轰炸，无数炸弹落在伪守备队头上。战斗延续到二十一日上午九时许，我掏心突击队阎梦云营长率队向敌冲杀时，头部中弹牺牲。此时，敌机十二架分两批对我轰炸、扫射，并投掷摧泪瓦斯弹，掩护据点内日寇向我反攻。掏心突击队指挥安春山脚部受伤，曹子谦副指挥率领突击队向敌连续冲锋数次，敌拼命抵抗，仍未能攻克。

二、孙兰峰指挥的攻城主力部队，在掏心突击队战斗打响时，也向五原城西关和黑头圪旦之敌发起猛攻。守敌凭藉工事和障碍物以炽烈火力阻止我军进攻，战斗非常激烈。我五临警备旅第二团团团长贾世海胸部中弹，壮烈牺牲。从二十日夜十二时战至二十一日晨九时半，始将西关和黑头圪旦收复。二十一日午后，义和渠以西敌人全部肃清，与渠东的掏心突击队会师。正值掏心突击队攻击平市官钱局和屯垦办事处受挫之时，两处日寇一面负隅顽抗，一面用大幅白布标出“火

急救援”四个大字。敌机看见后，即以十二架飞机分二队轮流炸轰、扫射，掩护两处日寇，阻止我军攻击。下午一时许，敌机投下信筒一个，为我军截获。内云：“坚持到黄昏，援军一定赶来。”与此同时我军电台破译出包头日军致日寇一密电：内云也是“务要坚持到黄昏，夜间援军必到。”傅作义将军得悉后，决心在敌援军赶到之前，一举全歼两处日寇，以便集中全力围歼增援之敌。遂亲自用电话命令孙兰峰派该师副师长王雷震（兼九十一团团长），指挥该师九十一团和九十二团（每团实际只有一个营的兵力），务在黄昏前会同掏心突击队将五原城内之敌，全部歼灭。同时又派我带着配属一〇一师指挥的炮兵第三营蔡广训营前往支援督战（因我在日本东京陆军士官学校是炮兵科），并传达傅作义将军的口头命令。王雷震副师长遵照命令，同我研究后打破常规，把炮兵阵地推进到义和渠畔，利用房屋掩护，集中炮火，摧毁平市官钱局围墙，打开冲锋缺口，步兵奋勇突入，一举冲入敌院内，同敌进行白刃战，将守敌全部歼灭，攻占了平市官钱局。但屯垦办事处的守敌，仍作垂死挣扎，向我军反扑。我步兵在强大炮兵火力支援下，不顾敌寇的瓦斯毒气，奋勇冲杀，将顽抗之敌半数歼灭。至此，五原县城内日寇除少数被我俘虏外，其余均

被歼灭，五原光复。

在清扫战场时，发现日寇绥西警备司令水川伊夫中将率领少数残敌，突围逃窜。日寇特务机关长桑原中佐，也在激烈战斗时，乘敌飞机猛烈轰炸之机，率领特务人员内久保作、警官池田滨崎等部分敌人逃出城外。

三、新三十二师师长袁庆荣指挥该师于三月二十一夜十二时，由五原城西方向敌攻击。该师第九十四团（杨新剑团）附九十五团第一营（赵素江营），向五原旧城及前后补红之敌发起猛攻。第九十五团（张世珍团）的两个营向广盛西之敌进攻。因为我军是在毫无掩蔽的平坦开阔地带向凭借砖筑城堡和坚固工事据守的敌人进行强攻，任务非常艰巨。九十四团第三营（营长苗逢安）攻击战中受挫，全营向后溃退。傅作义将军因恐新三十二师攻击受挫，影响整个战局，特派我骑着最快好马前往该师督战联络，了解战斗进展情况，正巧碰上这个营退下来。当即将此情况如实地报告了傅将军。傅为整顿军纪，即令执法队将苗营长就地正法。经董其武和袁庆荣两个师长求情，令苗逢安营长带罪图功，继续向敌进攻，战况方始好转。战斗到二十一日上午十一时许，据守前后补红的敌人被我军歼灭，我赵春江营全营官兵最后只剩七人。赵营长本人曾亲自率

一个连向敌冲锋四次，在第四次冲锋中，头部中弹，为国牺牲。第九十五团的两个营，在攻击广盛西之敌的战斗中，伤亡也很大。该团第三营营长杨廷璧被敌机枪打断胳膊，第二营营长任双齐受伤。一〇一师董其武师长获知战况后，主动从总预备队中抽出一个营（三〇三团第三营），从广盛西的东边向敌侧背攻击。到二十一日下午，一〇一师三〇二团，在炮兵火力掩护下整个团投入攻击广盛西的战斗，守敌大部被我军歼灭，残余伪军四处溃逃。前后补红和广盛西敌占据点被我军攻克后，新城之敌陷于孤立。经我军反复冲杀，终将城内之敌歼灭，克复新城。但新城已成为一片瓦砾场。在攻击新城的战斗中，新三十二师师长袁庆荣负伤。

四、骑七师副师长朱钜林指挥该师胡逢泰团，于三月二十日夜十二时，向新公中之敌发起攻击。守敌顽强抵抗，激战一日，二十一日晚我军以一部留在原地佯攻，大部转向新公中以东的灶火渠畔，向西商之敌攻击。该敌用电台向五原日军指挥部请求增援。此时五原城内之敌已被我歼灭，副长官指挥部译出这件电报。即以五原日军特务机关的名义复去一电。大意为：“围困待援，无兵增援该部。”该敌接电后，即惶惶向东逃走。我军乘敌撤退混乱之际，从侧面向敌猛

攻，给以沉重打击，敌不支四处溃散，我军跟踪追击，除少数逃脱外，大部分被歼灭。

五、新六旅王子修部（实际只有三个营的兵力），于三月十二日夜二时到达乌拉壕预定的掘口放水地段该旅指定一、二两营为掩护部队，第三营（欠一连）为掘口作业部队。掘口队最初为了保持行动秘密，只用铁锹作业，进度甚慢。至天将拂晓，要掘开的三个口子，只完成了一半土工。待五原城内枪声大作，判断我军已进入城内，为了迅速完成掘口任务，改用黄色炸药炸开。六时左右，驻在万和长和二财主圪旦的敌人，向我军进攻，战斗约一小时，敌人被我军击退。七时半左右，乌拉壕水已将万和长通往五原的公路淹没，上午十时许，我新六旅向万和长之敌发起进攻，敌人向东溃退。我军夺回万和长，并彻底破坏了乌拉壕上的桥梁。

六、第三游击支队司令李作栋指挥的各游击部队，在三月二十日夜十二时，由邬家地东西南茅庵向郝镜桥、蛮可素之敌发起攻击。该处守敌一经与我军接触，即向南溃逃，我军尾追痛击。

七、担任总预备队的一〇一师，奉命以三〇二团郭景云团攻击乌加河侧二财主圪旦守桥之敌，并破坏乌加河上的桥梁。该团在二十日夜到达攻击准备位置后，将主力埋伏在桥南，另一部

由郭碾房渡河绕到桥北地段，向敌猛攻，敌不支退入桥南我伏击圈内，全部被歼灭。从而顺利地完成了歼敌和毁桥两项任务。

傅作义将军在我军攻击计划全部完成，新三十二师攻克新城及其附近据点后，即令该师改为预备队。令一〇一师师长董其武率三〇一、三〇三两团开赴乌加河南贾粉房圪旦附近地区，准备阻击敌增援部队。

（五）乌加河畔援军被阻击，乌梁素海逃敌遭聚歼

日寇由包头增援部队，于三月二十一日中午抵达河套境内乌拉壕畔。此时，五原城内的日寇，只有盘踞在平市官钱局和屯垦办事处的日军，仍作困兽斗。敌增援先头部队到达乌拉壕即遭我新六旅阻击。战斗至下午三时许，敌后继部队赶到，向新六旅猛攻。该旅为避免重大牺牲，暂撤至北山，伺机打敌侧背，敌人始能前进。但因万和长至五原公路已被我军放水淹没，汽车、坦克不能前进，日军无奈只得将汽车停在乌拉壕以北，徒步赶到乌拉壕以北。与此同时，董其武师长率领三〇一和三〇三两团，与在该处执行任务的三〇二团协力阻击敌人。日寇被迫退至折桂乡乌拉壕以北与我军隔河炮战，妄图用强大的炮火压制我军，掩护敌军修桥过河。但我军在桥南坚

守阵地，并集中炮火封锁架桥地段，使敌无计可施，敌不得已又派部队直接掩护架桥。我三〇二团团团长郭景云一直在桥头阵地指挥作战，腿及腹部两处受伤。董其武师长曾派三〇三团宋海潮团阻击修桥渡河之敌。敌昼夜攻击多次，均被我军击退。战斗相持到二十三日下午。我攻城部队已将五原县城内的重要物资，特别是武器弹药全部运至安全地点。并将城内隐藏的日军及汉奸一齐搜捕肃清，五原城内各处之敌半数被歼，所有据点全部收复。至此引水阻敌、打援任务胜利完成。但日军千方百计拼命架桥，主要是企图再次侵入五原城内，营救下落不明之敌。

由五原各地溃散的伪军，急向五原东北落荒而逃。但北有乌加河，南有黄河，东有乌梁素海，在这大片荒野土地上，皆被我军放水淹没，人马无法行走。除极少数逃到西山咀泅水渡过退水渠以外，其余不是被我军击毙，就是被我军俘虏。就连日军绥西警备司令水川伊夫中将也未能逃脱死亡的命运。他从五原带领数十骑逃到乌梁素海附近四柜圪旦，企图渡过海子到大余太。我游击军连长张汉三，佯称是安北县的保安队，将其诱到二驴子湾，伏兵四起将水川伊夫击毙，余敌全歼。张取了水川的首级，并缴获了他的指挥战刀。另由五原逃出的特务机关长桑原中佐，及同

他一起逃出的特务人员久保作，警官池田滨崎等百余人，逃至乌梁素海畔的刘石匠窑子附近时，被我追击扫荡部队全部歼灭，缴获军旗一面，乘马十余匹及军用地图和秘密文件等。伪绥西自治联军匪首汉奸王英，于二十一日天将拂晓在五原旧城，带着警卫数人，由北墙挖洞爬出，沿着义和渠东坝头，向北逃走，天亮后逃到城北二十余里的陈家圪旦村。此时，汉奸陈秉义带着骑兵数十人赶到，王英乃随陈乘马拼命向西山咀奔逃。适在此时，伪蒙军八、九两师残部，由乌古廷带领也逃到西山咀，企图履冰过乌梁素海逃命，但因冰薄，绝大部分人马均被淹死。由于安华亭与王英有旧（安原在王英的伪大汉义军当过旅长，百灵庙战役反正），特意将守桥部队撤离，放王英、乌古廷等汉奸残兵败将逃走。战后傅作义将军得知此事真相，将安扣捕法办。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在这次战役中许多农民同仇敌忾，奋勇杀敌。如五原县城东金先生圪旦王大老虎兄弟二人，用菜刀砍杀日军十一人，并将人头装在麻袋里交给我军一〇一师三〇一团王建业团长。他们说：“因我军放水淹没了道路和田地，日本鬼子由五原逃出，道路难辨，有十一个鬼子来到我家，敌人困乏已极，饭后沉睡。我们先将他们的枪收藏起来，然后持刀一连杀了九

个。这时两个鬼子惊醒，惶恐至极，一个欲夺枪抵抗，被我两人按倒在地将头切下来，一个想逃走，也被我们杀死。”最后他们说：“这十一个日本鬼子的人头交给你们，必须给我们开个收条，将人头给傅将军送去。”

此时，除大批增援日军仍在乌加河北与我一〇一师，隔河对峙外，据守五原及其周围的日伪军，全被我军歼灭。

（六）我军空城诱敌，日军收尸还军

日军增援部队被我一〇一师阻击于乌加河对岸，不得越雷池一步，乃于三月二十四日上午又增派骑兵集团主力及第二十六师团的一部配大炮数十门，橡皮艇十余只，蚁集乌加河畔，在飞机的扫射掩护下，以强大炮火向我茅圪旦一〇一师三〇三团轰炸，步兵则乘橡皮艇实施强渡。我军利用桥头阵地，集中火力顽强阻击，战斗达白热化。董其武师长亲到前线指挥三〇三和三〇一两团，对敌展开血战。敌数次强渡，均被我军击退。敌我伤亡都很惨重。我三〇一团营长冯增波，头部中弹壮烈牺牲，连长郝宝瑞身中数弹捐躯报国，三〇一团团长王建业臂部受伤。三〇三团宋海潮团长身负重伤。

当敌骑兵集团及第二十六师团，在乌加河旁由飞机大炮强大火力掩护，乘橡皮艇强行渡河之

时，傅作义将军考虑到占据河套的日伪军已被全部歼灭，新旧城也变成了瓦砾场，日军失败已成定局，为什么日军不惜牺牲还要调运这么大兵力，非要再进攻五原城内不可？主要是为了弄清日本皇族水川中将及其它官佐的下落，以便对国人有所交待。傅将军为减少我军伤亡，同时认为即使日寇再次进入五原，也无隘可守，相反正是我军诱敌深入，乘胜再歼击日寇的好机会。于是决定主动放弃乌加河河防阵地，运用“退出来，打进去”的战术，再给日军一击。遂命五原县县长李吉祥督率行政人员，组织民众实行“空室清野”，使五原成为空城；命令新三十一师选留精干官兵潜伏城内准备里应外合痛歼敌人。其余部队撤至五原西南有利地区待命；命令一〇一师相机脱离战斗，到五原西北之梅令庙附近集结待命。日军增援部队始得渡河进入五原城内。

日军入城后，乃遍寻日军官兵尸体，于当日晚火化装入骨灰盒内。是夜日军不时遭我城外突击小组袭击，同时又发现我军掘开乌加河南岸，放水淹没五原以北道路两侧地区，敌恐再遭我军围歼。二十五日晨在敌机引导下，惶惶向包头方向撤退。我军分路截击溃退之敌。敌军不敢恋战，争先脱离战斗逃走。我军重又收复五原。

此役，以日军大批援军于乌加河旁，同我一

○一师隔河架桥争夺战中的重大伤亡不计外，侵占五原及其周围的日军(伪军除外)，被我军击毙者计有：日绥西警备司令水川伊夫中将，联队长大桥大佐，特务机关长桑原中佐及科技、行政、警务等日人约三百余名；生俘敌浅沼庆太郎、西田信一(二人均为警务指挥官)等五十余人。浅沼庆太郎愿留我军工作，因他对我军很佩服，在被我军俘虏后说：“中国军队如都能象傅作义将军指挥的部队这样能打仗，日军早就被打败了，不会侵占中国这么多领土。”并认为日军早晚要被打败。所以愿意留在我军做对日军宣传工作。其余皆送后方俘虏集中营。俘获山炮、野炮及平射炮十余门，汽车四十余辆，五十瓦电台一部，轻重机枪十余挺，步、骑枪九百余支；纯系窒息性毒瓦斯筒一千余个，毒瓦斯弹二百余颗及各种弹药无数。日军在此次战役中，飞机投掷瓦斯弹，施放毒气，其惨无人性可知。

据日本防卫厅研究所编著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所载：“对于担任蒙古政府警官及蒙古军顾问在五原战死的三十四名日本人，由陆军中丞按十一月新规定加以批准，举行了追悼”(水川中将、大桥大佐、桑原中佐正式部队军人均不在内)，即可说明日军官兵在五原战役中的伤亡情况，并证实此次战役的激烈程度和辉煌的战绩。

（七）军事上的成就，历史的功绩

五原战役的胜利，当时在国民党各战场上是罕见的，国统区新闻界称之为“五原大捷”，给了较高的评价。蒋介石为此发布了给傅作义将军的嘉勉电。大意是：查五原屏障西北，为内蒙重镇。此次傅长官督率所部血战月余，三失三得最后能摧毁强寇，克竟全功。此役不仅保障西北，而且奠定收复失地驱逐敌寇之基础，在抗战全局上，关系尤为重要，其功绩彪炳，殊堪矜式。兹特呈请国民政府颁给傅副长官作义，最高荣誉之青天白日勋章，以资策勉。并对为国牺牲的贾宴如团长，赵春江营长，各进两级议叙，以示优异。其他殉国的官长各叙一级抚恤。所有其它出力官兵，希详叙姓名及功绩具报以资銓叙；并发奖金三十万元，由傅副长官就两次参加五原战役的部队官兵，妥为分配，以资奖励。”

全国抗战慰劳总会，组织了慰问团，到绥西前线慰问，并携带党政社会团体和社会名流赠给的百余面锦旗。

是年五月十六日傅作义将军到达重庆，向蒋介石呈递了辞勋电（电文从略），蒋介石当即复了电。略称：功不自居，归美部属，殊深嘉慰，惟中央授典策勋，实属斟酌至当，兄为所部将士之长官，则兄受国家殊勋，亦即全体将士共有之

光荣。望即诚敬领受，勿再谦辞……。授勋仪式，由何应钦主持，鹿钟麟为司仪官。当傅作义将军步入会场时，鹿高喊：“欢迎常胜将军傅作义。”会场上立时爆发了一片掌声。

本年八月间，傅作义将军在陕坝“中山堂”举行了隆重授勋大会，转发了国民党中央授予各级指挥官、参谋人员和战士的勋章。同时，傅作义将军以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和绥远省政府的名义，向群众英雄赠送了奖章。其中有手刃十一名日寇的王大老虎兄弟二人，不怕危险自愿为我军引路的老人张三娃，以及抬担架送伤员的小脚妇女陈三娘等。

授勋授奖大会的标语是：“五原战役是士气旺盛的胜利”；“五原战役是贯彻命令的胜利”；“五原战役是军民合作的胜利”。

经过袭取包头，会战绥西，五原歼灭战三个战役，我军伤亡减员确实是很惨重的。仅就三十五军来说，受伤的师长有三分之一；团长近二分之一；一〇一师三个团，先后就有四个团长受伤（三〇三团王赞臣团长受伤后，宋海潮团长又受伤）。营、连以下就更多了。在战役结束后，部队普遍减员三分之二。除了几乎整连殉国的以外，还有几乎整营殉国的。为了保卫国土，抗击日寇，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连续一百多天的

战斗。各大报纸誉谓：“我军完成了一次光荣壮烈之大歼灭战”，“五原战役开创最后胜利先声”。“军事学上辉煌成就”；“抗战史上罕见伟绩”。抗战胜利后，日军根本博少将的代表田中大佐在我方受降仪式上也不得不承认：“傅作义将军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他的部队是中国抗日部队中最好的部队”。

一九八四年四月二十日于呼和浩特市

此段史实有张汉三所撰“击毙水川伊夫亲历记”与本文略有出入。摘录其中描述：“……我们包围了敌人展开激战。因我已认准了敌人的军官，我同一个好枪法的战士叫卜特老，两人瞄准那个军官，一齐射击，一枪打中他的左臂，一枪从他的右脸皮擦过。他摇晃了一下没有跌倒，我们随即又一起打了两枪，都打中了他的胸膛，他立刻倒下去。指挥官一死，敌人全慌乱起来。我们缩小包围圈逼近敌人，并把抬上军官尸体要逃走的三个敌人打死，截留下尸体，又把机枪手打死，这时敌人才举手投降。”

又写到：“打扫战场时，检查日寇军官尸体，搜出个人图章一枚，手枪一支，战刀一把。根据他的肩章、图章，认出了他是侵占五原的日寇指挥官水川伊夫中将。”

并未说砍下首级，记此并存。

塞 外 硝 烟

——忆洪格尔图战斗

景璞口述 景朝阳整理

一九三六年，我在绥远省乡村建设委员会受训毕业后，任后生乡指导员。不久，即调到陶林县复和乡（即洪格尔图）任指导员，全权管理该乡民、财、建、教诸般事宜。洪格尔图之役，是抗日战争史上光辉的一页，意义甚大，影响深远。我是这场战斗的目击者和组织指挥者之一，现将我军民当时的可歌可泣状况，忆述如下：

紧张的战前准备

洪格尔图是陶林县东边的一个小镇，东和察哈尔的商都县境接壤，村中居民多种商都县土地。镇上有居民二百余户。有教堂一座，除部分商人和手艺人外，其余全是教民。大小买卖有三十多家，五花八门，应有尽有。虽说是一小镇，却是个可观的农村经济中心，是交通之要道，战争之要冲，实为绥远之门户。

小镇的东面和东北面，紧贴山地，山顶到镇边约二里之遥。西为平坦开阔地。南亦山地，但距小镇较远，中间有较大距离的开阔地，镇四周

原有四个防土匪的土碉堡，已无多大实用价值。

我到任之时，察哈尔已被日寇占领多时。敌人对绥远虎视眈眈，随时都有进犯的可能。因而，我的工作重点，则是动员地方力量，配合驻军加强防御。在我接任的前两个月，已开始修筑防御工事了，但进度甚慢。时已近冬，战事在睫，加紧动员民工完成工事，刻不容缓。我虽是个地方官，但说话远不如神甫灵。根据这里是教民集中之地的特点，我首先必须改变前任和教堂神甫的僵持局面。教堂的司铎（神甫）系满洲人氏，名尹世芳。我凡事与他商量，尽量在他同意下，或说服他同意下办事。这样，很快取得了他的好感和信任。派遣壮丁时，我开上证明，再由神甫安顿几句，便无须派人押送，教民们则都能尽力当差，从无差错。这样，工程进度大大加快了。此地气候条件恶劣，变化无常，施工较为艰苦，但民工分期分批，源源而来。碉堡是石头底座，顶部用砖旋成，白灰勾缝。所用石头、木料、白灰等，由国家出钱，向教堂和老乡购买。小镇四面各筑一个碉堡，镇子边缘挖有壕沟，宽两丈余，深约丈五，沟边筑有单人掩体。在小镇北边不远处，有两座新盖起的民房，在我和驻军副团长观察地形时，副团长建议将房子拆除。我只考虑老乡盖房不易，提出能否不拆，副团长未置

可否，只是自言自语道：“吃它的亏呀，吃它的亏呀！”副团长名叫张著，毕业于保定军校，事实证明他是有远见、有经验的，留下了这两座房子，确实对我军战斗不利。此是后话。

临战前的半月光景，从商都方面来了个骑毛驴的老汉。此人高个子，白净面皮，东北口音，五十上下年纪，一身普通百姓打扮。他自称是敌伪方面的上士文书，说受命前来送个口信。他说，商都集结了大量伪军，再过几日（确切日期记不清了），敌伪要大举进犯了。看他的来去情况和言谈举止，不象是奸细，副团长和我商量后，放他回去了。（据悉，商都敌伪内门树槐、包贵廷、包悦卿等人可能与绥远吉雅泰等人有联系）。其时，工事尚未完工，得知此情况后，又加紧动员力量，争取赶在敌人进攻之前。但到了那一日，敌人并未有进犯之举（在前一天已完成工事，民工已全部遣回）。这天，那个送信的老汉又来了，说敌人之所以未行动，原因是要等和飞机配合行动，但飞机未能如期到达。如今飞机已到了商都机场，不日即要进攻，望马上做好准备。实践证明，这些消息是确切的。

洪格尔图的兵力配备

洪格尔图的驻军，乃一军一师六团的两个半

连，（含半个机枪连），两挺重机枪，每班配有一挺轻机枪，由中校副团长张著率领。（此役之后升任师参谋长）。其余两个半连，由团长张培熊带领，驻扎在距洪格尔图六十里地的高家地。

为了配合战斗，我从村民中调集了六十名壮丁，但壮丁手无寸铁。听壮丁们说，教堂内有防备土匪的枪支，我当即去找神甫，要求他予以帮助，他欣然应允。这样，六十名壮丁一下子全武装起来了。但是，壮丁们未经过训练，没有作战经验。副团长考虑如果让壮丁们独当一面，万一有失，则坏了大事。于是商议决定，把壮丁们分编到各排，这样，有训练有素的战士们带领，既放心，又可增加部队战斗力。另外，战前一个月，调来了个守备队长，此人姓张，朔县人，他带有七八个战士，每人持冲锋枪一支，在镇东北方守一个碉堡。总计在洪格尔图的我方兵力不足三百人，面对的是一万余名敌人，战斗之残酷、艰险，可想而知。

塞上硝烟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初的一个早晨，初冬的寒风扫光了地上的白霜，萧索的小镇清冷而宁静。突然，传来了飞机的轰鸣声。只见日寇的三架侦察机从正东方向朝洪格尔图飞来，盘旋在小镇上

空。敌机的声音阴森可怖。不久，又来了三架日寇轰炸机，呼啸着在村中狂轰乱炸，洪格尔图顿时陷入火海之中，许多无辜的百姓惨遭杀害。

轰炸持续约一小时，敌伪军即潮水般地涌了上来。敌人由镇东向我阵地发起攻击，我军民也集中全部火力还击敌人。尽管敌人来势凶猛，但我军民沉着射击，火力集中而猛烈。在张副团长指挥下，往往等敌人冲到手榴弹杀伤范围内时，才开始还击。相持一小时许，敌人伤亡较重，开始溃退。敌人一转身，目标更大了，更便于射击命中，阵地前一个个活靶子应声倒下。凭着单人掩体，我军毫无伤亡。首战告捷，战士们的斗志更加高昂。

正东敌人被打退后，敌人的后续部队又源源不断地占领了东北方高地。在日寇的飞机又一次轰炸后，配合着山炮、迫击炮等中型武器，向我阵地发起了更加猛烈的冲锋。由于我们都伏在单人掩体内，敌人的炮火发挥不了多大作用。加之张副团长命令尽量把敌人放近再打，双方在短兵相接的情况下，飞机则发挥不了它的优势。敌人成密集型冲锋，我们射击的命中率则更高，敌人伤亡惨重，丢下了大片尸体，又一次溃退下去了。

敌人的飞机和大炮对我单人掩体内的军民杀

伤不大，碉堡则成了他们攻击的主要目标。敌人的炮打的极准，有几发炮弹不偏不倚地打入碉堡的射击孔，东北方的碉堡被炸毁，守备队的张队长挂了彩，随即和战士撤下来了。我们接受这个教训，把碉堡内的兵力全部调出来，布置在单人掩体内。

人多势众的敌人，虽然装备精良，来势凶猛，但对决心以死报国的不足三百军民，无可奈何。敌人每次冲锋前飞机轰炸的浮士，把我们的战士都埋起来了，但每次冲锋都是丢下一片尸体，别无便宜可占。

没有想到的是，小镇北边留下的那两座民房内，居然窜进去一伙敌人，他们带着两挺机枪向我军猛烈射击，对我军造成巨大威胁，情况十分不妙。我当时的懊悔之情实难言状。张副团长当机立断，调集火力，封锁了敌人的后路，截断了其联系给养，对房内之敌用猛烈的火力予以封锁，迫使其不能抬头还手。等到这天晚上，又组织更加有力的炮火，迫使房内之敌退出。而后，借着夜色把两间房迅速拆除了。

双方相持了一整天，我方以不足三百人的兵力，抵挡住了配以飞机大炮的一万之敌，战果辉煌。

刚接火时，我用电话向陶林县政府汇报了情

况（而后电线被密集炮火打断，失去了联系）。部队方面，一边通过电台向绥远保安司令部报告情况，一边和高家地驻军取得了联系。而后接到了傅作义将军的电令，大意是：全力以赴，不惜代价，坚持七天，等待援军。

第二天，我们采取了集中火力，四面防御，重点还击的办法。敌人从哪个方向冲来，我们即把所有的兵力集中起来，迅速地给冲上来的敌人以沉重打击，平均分配力量是不行的。庆幸的是西方和南方皆有较大的开阔地，不利于敌人隐蔽，加上敌人内部矛盾，为了各自保存实力，往往一方发起冲锋，另一方则不积极配合，特别是南山的石玉山部最为明显。（后据有关资料获悉，敌伪内部不能相互配合，则与共产党人和敌伪内部有民族气节的青年积极活动有关）。

这天晚上七时许，驻扎在六十里外的张培熊团长把部队拉到了洪格尔图外围，并派联络员与镇内取得了联系。因南山和西乡之敌距小镇较远，两部敌人中间有较大间隙，张团长带着部队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镇子边。我们用长木料在壕沟上架起了便桥，放他们进来。张团长的增援部队进来后，为了保存实力，作好坚持长时间的战斗准备，决定阵地上暂不增加兵力，而是轮流休息。只有六十名壮丁一刻也未下火线。

敌人在晚间也不给我们喘息的机会。首先是两侧之敌偷袭，我军虽然苦战一天，但斗志不减。等敌人摸到手榴弹杀伤范围时，立刻遭到了迎头痛击。敌人终于无机可乘。

夜已很深了，我拿着几支破枪来到教堂里。这里是我们的壮丁的后勤部。洪格尔图的村长是个刁滑的家伙，在战前十多日已逃离洪格尔图，副村长是个忠厚老实人，整个战斗中负责壮丁们的伙食等后勤工作。此刻，副村长正在烧水做饭，然后冒着枪林弹雨把饭送上阵地，再把发生故障的枪支带回来，交给神甫修理。

当我与神甫尹世芳谈起战斗情况时，他主动提出教堂内有两门土炮，还有一瓮火药，他愿献出来，为保卫村庄、保卫百姓、抗日杀敌出把力。这样，又增加了副村长的负担，他不停地把铁锅、烂铁砸碎，作为土炮的子弹。这个老人日夜不停地默默地干着，干着。

第二天，我们的阵地上装备了两门“重型武器”。土炮坐力很大，每打一炮就从工事上坐下来，人们又得费九牛二虎之力把它推拉上去，然后再放一炮。阵地上有些没拉响的手榴弹，壮丁们把它安在炮口上，连同火炮打出的碎铁一齐射向敌阵。谁知，奇迹出现了，手榴弹在极远的敌阵里开了花，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杀伤效力，它比

手榴弹的距离远了好多倍。一炮打出，只见远处的敌人被炸的昏头转向，抱头而逃，敌人还以为我们有了什么先进武器呢。此后，战士们干脆把好手榴弹也安在炮口上，在发炮的同时拉响手榴弹导火索，威力则更大。人民群众在战斗中表现了极大的聪明才智。在敌人用炮火和飞机狂轰滥炸下，不仅是正规战士，连壮丁也没有一个溜下火线的。他们那种英勇顽强的精神，确实可歌可泣。

敌人的三架轰炸机更加频繁地轰炸着，它们飞的很低，肆无忌惮地在低空盘旋，搜寻目标，以十倍的疯狂进行报复。我军开始伤亡了，情况渐渐地严重起来。不但东面、东北面的敌人以车轮战术轮番持续冲锋，南山和西面之敌也蜂涌而来。好在我军弹药充足，采取快速、集中火力的办法，压下东面和东北面之敌，打击敌人的气焰；对南山和西面之敌则采用土炮对付。刚一打退南山和西面之敌，马上把兵力集中到东面和东北面。全体军民同仇敌忾，抱定了与洪格尔图共存亡的决心，十分艰难地和敌人战斗着，隔不了几分钟，就是一次血与火的交锋。火光冲天，硝烟弥漫，密集的枪声、隆隆的炮声、愤怒的喊杀声、咒骂声、数里之外，充耳可闻。战士们有时连水也喝不上一口，壮丁们甚至连饭也吃不上，

从泥土里爬出来的战士们把自己的干粮分给壮丁们吃，但往往吃不上两口，敌人就冲上来了。

第二天的晚上，敌人偷袭更加频繁，但军民防守倍加严密，终究不能得逞。坚持到第三天，敌人未能夺去一寸阵地。第三天的白天，敌人的飞机炸得更凶，飞的更低，机翼下的炸弹清晰可见。在飞机和火炮的配合下，四方之敌同时出动，但我英勇军民仍按既定之策，勇猛奋战，打退了敌人的进攻。

夜幕又降临了，寒气逼人。爬在单人掩体里的军民们，忍受着连续作战的疲劳、寒冷和饥饿。战斗间隙，死一般的寂静，时而传来野狗争食尸首的吠叫声，凄厉森人。敌人的飞机晚上不出来，但敌人的汽车却来往频繁，来时拉着给养，走时拉着从阵地前偷运下去的尸体。

又打退了敌人几次偷袭后，已是后半夜了。阵地上又出现了令人惊心的暂时平静。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滑过，极度的疲劳折磨着战士们，人们都清楚，在敌我力量过份悬殊的情况下，越往后困难越大。时间呵，在孕育着什么呢？

突然，东南方向传来了密集的枪声。人们立即振奋精神，拿起武器，准备迎击敌人又一次的冲锋！然而，并没有一粒子弹落到阵地前。其实，那枪声大作之际，离此地有三里之遥。远远望

去，火光冲天，烈焰熊熊。耀眼的信号弹划破了夜空，冲锋号嘹亮雄壮，喊杀声震天动地——我们的增援部队冲上来了！增援部队从敌人背后杀来，打得敌人溃不成军。为首的将领就是有名的战将孙兰峰。

拂晓，敌人全线溃退，由洪格尔图东北方，向商都逃去。南面和西面之敌，绕洪格尔图向北逃窜。敌人跑得好快！原来敌人在这两部潜伏了数量惊人的骑兵。

孙兰峰将军率部追击，一举收复了商都。洪格尔图战斗胜利结束了。

日寇罪行一瞥

在洪格尔图之役中，由于日寇飞机的狂轰滥炸，村民们多是自寻躲藏之处。很多人躲入山药窖内，敌机炸起的泥土，一下子封死了窖口。战斗结束后，我们从好几个菜窖内挖出了一整家一整家的死人。

镇内有一家母子六人（男人在前线当壮丁）坐在炕角，日寇炸弹破房而入，落在炕边，母亲被炸成数块，小孩被炸死了四个，只有最小的婴儿幸免，还爬在只剩半截的母亲身上吸奶。屋内血肉横飞，惨状目不忍睹。后来，我将那个婴儿交给教堂修女抚养。

日寇的滔天罪行令人齿寒，同时，也更加激起我军民的抗日决心。

人民记着这段历史

洪格尔图之役的胜利，保全了绥远东北的大门，大大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捷报传开，各地的慰问信雪片般飞来，大批慰劳品从四面八方寄来，全国人民欢欣鼓舞。许多团体派来了慰问代表团。经过战斗洗礼的洪格尔图镇，好多天都沉浸在节日般的欢乐之中。

上海一个代表团的成员，下车后握着我们的手，连连不断地说：“民族英雄，民族英雄”！

新闻记者的采访接连不断，电影摄影师开着汽车拍片子，记得摄影师是个美国人。

傅作义将军接见了我们，和我进行了个别谈话，了解了许多情况，提出了许多问题，并给我发了奖金。省保安司令部给我颁发了一枚一等奖章。

朔宁罹难 惨遭浩劫

周维民

七七事变距今已四十六几年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使中国人民遭到空前的浩劫。我亲身经历和目睹惨绝人寰的山西朔县和宁武两地的浩劫，今天忆及犹觉触目惊心，兹忆述如下：

一九三七年忻口战役，日本帝国主义部队击溃了蒋、阎的主力部队后直逼太原，当时在晋北的国民党部队有骑兵第一军和何国柱的骑兵第二军。九月间日寇沿同浦路突进，对附近的县镇做临时的点线占领，朔县和宁武就是这样被占领的。骑兵第一军从原绥远省张北县转移到凉城、左云、右玉、朔县、宁武等县。何国柱的骑兵第二军也接踵而至。上级命令骑兵第一军派一个团死守朔县。骑兵死守城池，是舍其长取其短，为兵家之忌。但在当时混乱情况下，只可以用非所长来搪塞责任，其后果如何，根本不予考虑。骑兵团进驻朔宁县城正在构筑城防工事时，突然接到上级命令，将城防移交骑兵第二军的一个团接防，两位团长在交接防务时曾对骑兵死守都表示极大的不满，但慑于军法只可服从。

何军骑兵团进驻朔县，除在城墙上构筑工事，又向城里商号店铺要麻袋，装上沙土堆积在四座城门沟内，做防守的准备。九月三十日（旧历八月二十六日）日军包围了朔县。骑兵团凭藉城墙与日军激战，日军炮轰四门城楼，并以坦克猛撞四门，未几北门被撞开，日军蜂涌而进。何军骑兵因受日军炮兵的轰击，在城内大街小巷四处狂奔，巷战不久日军占据朔县四门，何军骑兵团全团被俘。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进行野蛮报复，开始了大屠杀：先将被俘的骑兵团官兵用铁丝穿通锁子骨，三十人一伙，五十人一伙，拉到广场用战刀杀害了；接着全城大屠杀，不分男女老少见人就杀，而且还到处搜找，几乎无一人幸免于难（东北军骑兵团在城陷时仅一名士兵生存，到达我在的骑兵部队哭述经过）。

我在的骑兵第二师，当时驻宁武西头冯营坝上一带。朔县失陷，日军大肆屠杀后，经阳防口又攻占了宁武。到达宁武后，于十月十一日（旧历九月初八，日期可能有出入），关闭城门，又开始了惨绝人性的全城大屠杀。日寇屠杀后，于翌日黎明乘汽车向朔县返去，骑兵部队十二日奉命出击时，日寇早已逃之夭夭。

路经宁武城时，真是惨不忍睹。从西门到东门这条石板铺路的大街上被日寇枪杀和用战刀砍

死的横躺竖卧而散乱满街的同胞尸体有500多具，部队骑马经过时，还发出战栗的吼声。我们当天驻在东门外数里地的小村里，（这村名可能叫河关村），下午部队奉命进城清理尸体，我跟随前去。

东门外就是一条宽约二百米的河滩，从西向东流着深没膝盖浅没脚面的水，但有数十条狗却卧在水里，只露着头或半截身子，据年岁大的士兵说，这是因为狗吃了人肉后烧心，只可卧到水里去减轻它们胃里的难过。

进东门路北有一所在当时盖得比较讲究的院落，既有正厅，又有东西厢房，还有一座小花园，花园中有人工修建的池塘，这是阎锡山在清末民初篡取山西大权而为阎到处奔走并兼管财政的南柱馨的府第。进入正门就发现东西厢房墙壁上有密密麻麻的弹痕，而且门窗玻璃都已粉碎。我从窗户外向里一看，民族仇恨由然而生，只见五十多具男女尸体互相挤压倒卧在地上。最使我仇恨的是一位二十六、七岁的妇女，敞怀，乳头上还有一岁左右的婴儿。根据现场情况推断，日寇将老乡先驱赶到东西房内，将门从外关住，然后架起机枪向东西房反复扫射。正厅台阶上下躺卧着二十多具无头或有头的男女尸体。穿过正厅到了花园到处是尸体，在干涸的池塘里躺卧着四十

多具男女尸体。从尸体情况上推测，可能是先枪杀然后倒上汽油燃烧，因为四肢不全，有的皮肤黄黑了。

除大街到处躺卧着数以百计的男女老少尸体外，小巷里到处也是尸体。我到一条小巷的一座小院里，看到一位身着蓝土布上下衣的妇女尸体，松散着头发，俯卧在院当中，腹部流了一滩血，旁边还躺着从母胎里挖出来的婴儿尸体。

宁武的吃水井都跳满了人。根据跳井情况推测，可能大屠杀开始人们恐怖到了极点，所以就争着跳井自杀。井深浅因我当时年岁小没有注意，但我所见的十几口井都是满满的尸体一直到井口。就这样，凶残成性的日寇，还放不过在每口井上端架起机枪从上向下扫射，因为接近井口的尸体上有密密麻麻的弹痕。

宁武做醋是著名的，缸房做的醋，从清朝乾隆年间，能保存到当时（有些缸有封闭年代），作坊里的大缸高一米三、四，圆周直径也在一米左右。我到作坊院里见作坊间的门敞开，有些妇女穿的小脚鞋散乱遗失在从大门到作坊间门的道上，我走进作坊里一看，真是毛骨悚然，天啊！中国人民有多大的灾难！这些善良的妇女犯了什么罪！只见每口大缸里，头朝下脚朝上栽进五、六名妇女自杀了。

宁武北城角有一座大庙，大庙院内被杀害的同胞尸体累累。从庙后登上城墙，只见有二百多具无头男女尸体倒卧在城墙上，从城墙向下一看，只见护城壕里的人头满满的，这是日寇用战刀杀死的，据估计全城有6,000多人死于日寇屠杀中，当时宁武成了死人城。

以上是我亲眼所见的事实，除向朔宁两县死难同胞致哀外，能将粗略所见写出来，让活着的人知道死难同胞的一些情况，也算是告慰死难同胞在天之灵了。

傅作义部进袭中公旗

王兴亚

“七七事变”前后，中公旗札萨克是林沁僧格（人称林王）。事变后他投靠日本，深得锡盟盟长德穆楚克栋鲁普及李守信的信任。

他投靠日本后，日本特务源源而来，分布在中公旗各地设特务机关，如：川井、胡鲁斯太、卜尔合少、巴音淖尔、杭盖诺其、乌力吉图等地都有。总负责人是大坂，其次有山本、古岛、冈田、泽藤等人。其情报网不仅包括中公旗，连绥西、宁夏、甘肃、青海以及外蒙等地均在其网内。

中公旗兵力，起初只有一个团，后又扩充到两个团，杭盖诺其还驻有日军一个连，合起来约有两千之众。

傅作义部进袭中公旗的动机和部署

中公旗与后套只是一山之隔，其间通道很多，但以乌不浪口，乌盖口、狼山口为最大。特别狼山口（石兰计附近）可以朝发而夕至。秦之蒙恬，汉之卫青霍去病，李广等进击匈奴多由此口出

入。鉴此，傅作义在一九三九年一到五原，即派宪兵班长李斐然（蒙古通）带四名工作人员入中公旗坐探情报。同时又命第二游击区副司令霍刚，不时袭扰该旗各镇。使林沁僧格的王府，经常迁移。如杭盖诺其，卜尔合少、川井、宝尔汗图等地都有王府。

五原战役傅部虽获全胜，但部队元气大伤，故对中公旗只能监视和小股游击性进扰，使其不敢有进窥后套之举动。

在一九四一年有苏联军事顾问团来陕坝，首席顾问安德列夫斯基，建议在狼山口内设置返光镜，以发现来犯之敌的兵种、兵力及其行动。因设置之原料缺乏，难寻，又加之一九四三年春苏联顾问撤走，事乃作罢。

一九四一年日美太平洋战争爆发，这时的日寇已成强弩之末，无力在中国境内大肆进犯，并且把散布在占领区的部队集中或调往他处。驻中公旗的一连日军也调走了。

我方派在中公旗的情报组，经过四年来的工作，对该旗的城镇、地理、军政及其兵力武器装备；官营企业，仓库储存；重要人物的活动，特务机关动态，甚至连主要人物和日蒙特务的居住房间都一清二楚。同时还发展了当地爱国的蒙汉商民及官署差役等三四十名，给我侦察情报，对

及时侦知敌情起了重要作用。

一九四四年八月初长官部接情报组报称：

“林王父子，今已由百灵庙归来，现住卜尔合少。除杭盖诺其驻兵较多约有一百多名外，其余各地仅三五十人不等。其军纪涣散，士气消沉。各地均无警戒设置”等情。

傅作义据报后，采取敏捷行动进袭该旗。并决定进行夜袭，拟定命令如下：

一、为后套安全计，乘敌无备，夜袭中公旗的杭盖诺其、乌力吉图、卜尔合少、川井，斯尔布朝海等五个日伪重要据点。由暂四军骑四师王宪章部全师三个团和驻五原的暂三军的暂十一师步兵一个团组成袭击部队。由暂四军参谋长张副元指挥。

二、先由骑兵派一个排在深夜袭击狼山后口（北口）到杭盖诺其之间的特务机关。再以三个骑兵连进袭川井；三个步兵连进袭杭盖诺其；其余三地由步骑二个连合同进袭。其余六个步骑连队，分别在各据点负责封锁、打援、堵截、支援等任务。

三、攻进各据点后，先将日伪守军和特务机关消灭。然后在许可的时间范围内，将官方企业，王府及军政设施等加以破坏，并将仓库物资抢运集中在杭盖诺其。

四、为了行动迅速，尽量不带俘虏。

五、勿使林沁僧格及日伪头目脱逃，不得已时可以击毙。

六、严禁进入私人商店和住宅，以及进行烧杀抢掠，奸淫妇女等行为。违者无论任何人一律枪毙。

七、尽可能拆毁王府、兵营、特务机关、仓库及官营企业的房舍。

八、各队完成任务后，齐集杭盖诺其待命。

九、务在当日黎明前后完成袭击任务，如届时完不成任务，即按情节予以究办。

决定于八月二十八日行动。

袭击狼山后口到杭盖诺其中途之特务机关的骑兵排，于是日深夜一时到达，包围了特务机关，因其门窗未闭，日伪八名（日寇二人，四个蒙人，两名汉人）尚在梦中，就被击毙。不到十分钟就完成了歼敌任务。并留在这里封锁路口，以免走漏风声。

进袭杭盖诺其的部队，时在天色未明，由情报员作向导，直奔该地伪蒙兵营。虽四外筑有高墙，又有两名岗哨，但因其正在入睡，及至发觉，业已被围，经半小时战斗，遂占领该地，除伤亡和投降者五十几名外，据供昨天有六十多人已调往王府。

进袭卜而合少王府的部队，在黎明时由向导引进王府。谁知林王不知何时逃走，故一枪未放，占领该地，在搜集物资中只有些衣服、头带、日常用品数目也不多。随后将王府焚毁。

进袭川井的部队，未到天亮即进入战斗，计打死伪蒙军四名，特务机关人员五名（无日人），抢运了一些物资，拆毁了特务机关和王府。

进袭乌力吉图的部队，天将黎明时进入攻击，击溃伪蒙军的一个连（约七八十人），打死二人，伤六人。捣毁特务机关，扣住一日特（后证实系蒙人），抢运了一些物资后，拆毁了王府和特务机关及仓库、合作社的房舍。

袭击斯尔布朝海的部队，经向导引入伪蒙军驻地，只和伪军互打了几枪，伪蒙军四五十人退逃，扣住特务代理头目仁沁。其余特务都穿着内衣逃跑，伪蒙军虽无伤亡，却打死打伤日伪行政人员六名，并拆毁特务机关和部份官府房舍，获得少数物资。

各进袭部队都在黎明前后完成了各自的任务，除抢运物资延缓的时间较长外，皆在当晚到杭盖诺其集结。

第二天的下午骑兵除留二个连派有任务外，其余都返回原防，步兵一个团留驻杭盖诺其，由团长梁畔池负责布防。

敌我双方死伤统计：

此役除杭盖诺其之敌，稍有抵抗之外，余均一击即溃。因此双方死伤不多，我骑兵只死二人，伤几人，步兵死十人，伤十余人。敌方伪军死二十余人，机关人员死十人，日本特务死三人，蒙特死十二人。后又经日伪军反扑三次我步兵死二十余人，日军死十余人。伪蒙军死二十余人（此系敌之遗尸数）。

战利品：

军马三百余匹，步枪二百余支，战刀十余把（指挥刀）子弹七万余发，手榴弹五箱，黄军毯三百条，军用卡车一辆，以及马靴、皮鞋、水壶、饭袋等。还有军用压轧食粮将近一千箱（每箱一百盒），军用药包五百多箱，以上是军用物资。非军用物资，计有驼毛七百多斤，羊毛五百多包，蒙疆钞票五箱，以及牛羊皮、衣服、布匹、毛毯、粮米等等约五千多件（包箱）

另外为了抢运物资，抓用居民的车辆牲畜计有大车二百多辆（包括牛马骡驴车），骆驼三百多峰，车和驼大多有原主跟随。

截获林沁僧格：

当我方派兵进袭乌中旗之时，林沁僧格将驻在杭盖诺其的兵调回五十多人守护王府。当天下午突然仓库起火，在惊惶中，有人给林王送来亲启

信一封并有三个“十”字（表示火急），当时没顾得看，直至火熄灭查明损失，分别指令有关人员追查人犯后，已将近深夜十二时。在用饭中想起这封信来，信还没看完，只吓得颜面失色，急得措手顿足。原来信上说“探知国民党派二千多兵力，定于本日深夜偷袭王府，请速想对策”等语。当时林沁僧格饭也没吃好，就赶紧收拾行装离开王府。并派人通知较近的杭盖诺其和乌力吉图两地注意，他急急忙忙离开卜尔合少。

先派随护他的部队八九十人为前站行路，他带着家属及随员三十多人（其中有他父巴布道尔济）在后随行。直奔川井逃去。约在凌晨二点多钟，突然前面枪声大作，前导伪军被我一步兵连截击。林沁僧格一行不敢前进，便落荒逃走。这时天色方晓又遇我军，全被截获。

经盘查自称是逃难蒙民，经持枪恫吓和捆打才供出系王府家属，并指认林王。起初林王拒不承认，结果被士兵打了几枪托才供认不讳。当即将其家属送往陕坝，住招待所，由二名宪兵守卫，软禁到日本投降后才把他开释。

敌伪不甘失败进行反扑：

在进袭任务完成后除杭盖诺其暂由步兵团驻守，配备防务梁畔池团长带二个连驻杭盖诺其为指挥部，其余的步骑兵以连为单位，选有利地形

埋伏在东去的大路上，以阻击援敌。

第二天深夜（八月三十日），突然由川井方向开来十余辆汽车向杭盖诺其进击。梁部即全军出动于外拒敌。埋伏部队也赶来参战，敌伪顿时四面受敌，不敢恋战，弃尸而逃。返回路上又被我军伏击。敌伪连续三昼夜进行三次反扑均被我击退。最后德王和李守信不得不调集各地的蒙军三千余名，连同住包日军一部约百余名，配以装甲车和坦克，拟与我军一决雌雄。及至赶到，我军早已撤走多日，只给日伪留下一片瓦砾和残垣断壁。

派员战地慰劳：

当胜利结束了这场进袭战之后，傅作义特派长官部副官处长温永栋为代表前往战地劳军，并派副官处课长王兴亚带宪兵三名顺便调查部队军纪。又派参谋处参谋周楚材随行查视战地地形。于九月一日晨由温永栋率队一行七人（内有温的警卫一人），由陕坝骑马先到蛮会骑四军军部用早饭，带响导。临行时，军长袁庆荣送给每人压轧食粮一包，内有麦干十块、糖干二块、酸干二块，军用药包一盒（内有感冒药、头痛药、牙疼药、泻肚药、滴眼药等十样），并说：“这是战利品，到返回时可以再带上几包。”我们在途中及狼山口内外，见到运载战利品的车驮络绎不绝。我们

因要赶到杭盖诺其，所以无暇询问他们。走在快出山后口时，见路旁有一所砖瓦建成的小院，决定在此休息打尖。此院门窗皆无，屋内除了散乱撕破的书籍外别无它物，遍查各书大多是推理侦探小说和情报工作报刊，约有五六千册之多。休息后我们继续行进，时至晚十一点，当距杭盖诺其十几里路时，突然传来枪声，我们停止前进，而枪声越来越密。不一会梁团长派传骑来告：“前方发生敌情请勿前进”。我们即于原地休息，而枪声时密时稀，时断时续的响个不停，直到深夜二时才沉寂无声。在天未亮我们即出发前进，梁团长也带四五十人来接迎。途中梁团长说：“昨晚是敌人第三次反扑，每次经我军有力还击，都被打得狼狈不堪，遗尸逃去”。

太阳才露头到了指挥部（杭盖诺其的营盘）只见四面围墙颇为壮观，壁上弹痕累累。四外别无人家，有两个大院，约有房六七十间占地十亩方圆，屋内空空如也，只有临时用砖垒的桌凳。

早饭，时商量发慰问金的手续，因情况不稳，不能将部队集中点名发放。只把指挥部的一连人按人点名发完，其余由团部代发。视查地形和军纪的饭后各自行动，只能就近看一下远处不能去，过十二点要赶回长官部，没有在那儿过夜，星夜返回陕坝。

嗣后长官部高级官佐开了一个研讨会，认为此役有成绩，但有一个大疑问，即林王和仁沁为什么于事先逃走？是否有敌特工渗入我内部？事后侦知给林王送信息的情报员，即是我派往中公旗坐探情报组长李斐然。原来他是两面特务。（做两面特务可以，但事先需征得上司同意）还有许多疑点待查方可结案。于是长官部乃令李某返部述职。李预感事已败露，从而逃往厚和市（今之呼和浩特市）。

直至日本投降后，他又随长官部侦察总队东去。

冯玉祥将军五原誓师

武英士 苏希贤整理

前 言

冯玉祥将军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爱国主义将领。他从一个晚清士兵，北洋军军官，经过曲折的历程，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位真挚朋友。当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时，他同情革命，在滦州举兵响应，立有勋。一九一五年当袁世凯叛国称帝时，他与蔡锷联络，促成四川独立，促使各省纷纷响应，使袁世凯只做了八十三天皇帝梦，便一命呜呼。一九一七年六月，当张勋拥立清室复辟时，他顺应全国人民的意愿，在先马厂誓师讨逆，击溃“辫兵”，保卫了共和。一九一八年当第二次“直奉战争”时，冯将军发动“首都革命”，推翻了曹锟的贿选政府，并力排众议，将废帝溥仪赶出宫外，铲除了复辟的祸根。一九二六年九月，冯将军五原誓师，响应北伐。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违背民意，发动内战。冯将军为揭露蒋介石倒行逆施的真象，于一九四七年以考

察水利为名，出访美国，发表了《告全国同胞书》和《我为什么与蒋决裂》的演说，揭露了蒋介石反共内战之行径。蒋介石为泄私愤，革除了冯将军公职，吊销了护照，开除了国民党党籍。冯将军虽然遭此报复，但仍然坚强不息地偕同夫人李德全揭露美国援助蒋介石打内战的内幕，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称赞。此文记述冯玉祥将军五原誓师之史料，是经我们走访了当时、当地健在的知情者白焕瑜、李述唐、李银枢、张喜兰、王乃忠、马锁子等人。并参阅了冯玉祥将军所著《我的生活》和宣侠父同志写的《西北远征记》，冯洪达、余华心著的《魂归中华》等有关资料后，加以归纳整理而成。特别是一九二四年，直系军阀曹锟，贿选当政，祸国殃民。冯将军毅然与孙岳、胡景翼联合，举行“首都革命”，以期实现国家的和平统一。詎料段祺瑞执政，仍然维护帝国主义的特权，对抗孙中山先生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使冯将军大失所望。退而就任西北边防督办，驻扎包头，一面垦殖，一面整训，并委派旅长石友三，率部修筑东自包头，西至宁夏的一条公路，便利了绥宁两省的交通。

一九二五年，奉系军阀张作霖，与日本帝国主义勾结，以承认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为条件，换取日本的军火供应，企图靠日帝的

支持，用武力统一中国。冯将军得悉内情后，痛心疾首，义愤填膺，与郭松龄联兵，毅然发起了正义的讨奉战争。战争初开，节节胜利，张作霖从奉天出游，准备下野。日本帝国主义为维护在东北的既得权利，出动大批飞机猛烈轰炸，并以日军乔装奉军，在日陆空配合下，使国民军受挫。冯将军为制止内战力主罢兵息争，遂通电全国，决定自己跳出国内的政治漩涡，先行引退，以期收到釜底抽薪之效，瓦解战争之功，以利人民。

没办法而去，有办法而回

一九二六年初，冯玉祥将军因为反对内战，同情革命，引起吴佩孚、张作霖、孙传芳等各派军阀的反对，北洋军阀各派以“讨赤为名”，联合进攻国民军。冯将军目睹连年战祸之惨烈，民不聊生之痛苦，为了避免内战，于是，将军权将西北边防督办之职，分别交给张之江和李鸣钟署理，自己毅然决定，到苏联学习考察，以寻求革命真理，拯救中华民族，实现富国强民的抱负。一九二六年五月七日，冯将军由平地泉出发，取道外蒙古库伦，历尽了千山万水，饱尝了雨露风霜，到达了莫斯科。在苏联，考察学习了三个多月时间，耳闻目睹十月革命胜利后的苏联，受到了深刻教益，对孙中山先生所主张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与

理解。

当冯将军出国以后，国内各派军阀吴佩孚、张作霖、张宗昌、李景林等组成反革命联军，对国民军施展了大规模的围击，迫使国民军弃天津，退北京，南口失陷，部队向西北退却。就在这个时候，南方的国民革命军已经北伐，攻下了湘赣，国内的革命，风起云涌，朝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冯将军的部将石友三，电促冯将军迅速回国主持大计。冯将军接电后，鉴于国内形势紧迫，决定急驰归国。乃于八月七日，偕同苏联顾问乌斯马诺夫和中共党员刘伯坚、以及部属李兴中、任右民、何其巩、赵亦云、李连海，还有翻译、随行人员等，从莫斯科动身，一路跋山涉水，历尽艰辛，取道库伦，在途中，又遇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于右任，两人联袂一道，向五原驰进。

在行至离五原不远的地方，冯将军的部将宋哲元前去迎迓。于九月十六日抵达五原。张之江甫抵宁夏，听到冯将军回到五原，带病来向冯将军汇报了国民军在南口溃败的情形。驻守在包头和五原的国民军全体官兵，听到冯将军回来，人人欢快，个个兴奋，有的士兵高兴地流下了幸福的眼泪。

冯将军回到五原的第二天，九月十七日，在

中国共产党和苏联顾问团的帮助下，国民军将领孙禹行、方振武、弓富魁、刘金忱、席液池、宋哲元、鹿钟麟、佟麟阁、张之江、李鸣钟以及何其巩、徐廷瑶、孙连仲、邓哲熙、过之翰、宋明轩、石敬亭、张允荣等二十多人，在五原县政府举行会议，公推冯玉祥将军为国民联军总司令。

九月十七日这天，是很不寻常的一天。五原县城里城外，大街小巷打扫得干干净净，商号铺面早早地开了市，学生儿童换穿了新衣裳，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迎风飘扬，整个五原城里显得象过节日的景象。中午十二时许，举行了中外闻名的国民军誓师北伐的受旗典礼大会。会场设在县政府西侧的广场上（现五原拖拉机站处）。誓师台是由士兵在头一天临时筑起的一个土台，台底两丈见方，台顶一丈见方，高六尺许，坐北面南，台北侧有登台通道。参加誓师典礼的官兵有数千人，分别列队在台的东西南三面。在五原的国民军将领全都参加了大会，就坐在台的前方。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于右任，中国共产党党员刘伯坚，苏联顾问乌斯马诺夫，绥远省民政厅长邓鉴山等，也出席了大会。五原县长刘必达，临河设治局长萧振瀛，地方绅士王英亦应邀参加了大会，就坐在台上的左右侧。

这一天风和日丽，阳光灿烂，与会的全体官兵

队列整齐，军容肃穆，人人喜气洋洋，个个精神振奋。誓师台上靠北，竖立着一根很高的旗杆，升起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冯玉祥将军身材魁伟，穿着一身普通士兵服装，精神焕发，满面春风地健步登上誓师台，慷慨激昂地陈词演讲。他列举大量事实，深入浅出的揭露和痛斥列强帝国主义勾结卖国求荣的封建军阀统治压榨中国人民的累累事实。他指出帝国主义利用中国军阀，压迫中国人民，是造成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号召全体官兵响应北伐，进行国民革命，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并宣布奉行三民主义，实行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他的演讲，声音宏亮，词义恳切，忧国忧民、痛恨暴政之感情，扣人心弦，义形于色。大大地鼓舞和激发了全体官兵的士气，人人磨拳擦掌，个个愤满胸膛，决心投入北伐，以求中华民族之解放。他的演说激励着到会军民。打倒列强！铲除军阀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响彻整个会场。

接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于右任，把一面北伐军旗授给冯玉祥将军。顿时，“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努力国民革命！努力国民革命！齐奋斗！齐奋斗！”的北伐军歌声响彻云霄，震荡着整个会场，随即发出《五原誓师》

通电宣言，晓喻中外，传檄天下。通电附有一段誓词：国民军之目的，以国民党的主义唤起民众，铲除卖国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以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独立，并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生死与共，不达目的不止。会后，随即组成国民军总司令部，设立两部、两厅、八司、两处。任命鹿钟麟为参谋长，何其巩为秘书长，李兴中为参谋处长，张吉墉为军法处长，陈连富为副官处长，徐廷瑶为军务处长，张允荣为内务处长，过之翰为军需处长，石敬亭为政治部长，中共党员刘伯坚为政治部副部长，薛笃弼为财政委员会委员长，聘请苏联顾问乌斯马诺夫为政治法律顾问。同时还遴选了政治工作人员分赴各军，成立政治处，在全军开展政训工作，并从事民众工作。这项工作，冯将军委由中共党员刘伯坚同志为主要负责人，促使国民军成为一支有主义、有信仰、守纪律的军队，在北伐战争中成为一支劲旅。

誓师会开过后，五原各界民众，又举行了隆重的庆祝《五原誓师》大会。会场搭起了戏台，由部队官兵唱革命歌，演文明戏，使五原人民豁然开朗，耳目一新。从而激发了民众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怒涛。为了纪念《五原誓师》的历史意义，庆祝会上宣布将五原县改为义旗县，至一

九二七年奉军进驻后，才恢复原县名。五原县长刘必达，遵从五原人民的意愿，为纪念《五原誓师》的功绩，在誓师台前刻石立碑，永垂后世。（此碑解放初尚存，如今下落不明）。

明镜沾灰尘，拂拭自然明

国民军在五原驻防期间，官兵的生活条件极度艰苦，衣不遮体，食不裹腹。但在冯将军治军严谨的要求下，军纪良好，买卖公平，秋毫无犯，社会秩序安宁。

冯将军于誓师后，亲自深入连队整顿军纪，召集部队官兵谆谆告诫说：“我们的队伍不管走到什么地方，不论遇到多么困难的处境，军纪必须维持”。在冯将军严谨的治军要求下，全体官兵无不衷心拥戴。表现在一点上，就是对他的要求和命令，绝对服从。致使训练有素，纪律性很强。

冯将军勤俭治军，为官清廉，深受五原民众之称颂。就拿誓师会后的聚餐来说，那样隆重的大会，参加的军政要员很多，还有苏联顾问与国民党中央委员于右任等头面人物，照常情，应当会一顿丰盛的餐。但是，仅仅一菜一饭，以白开水为汤。官兵们都在一起吃，取名为“革命饭”。后来，包头县长唐务，给冯将军送来一桌酒席，冯将军当即把酒席退还，并责问唐务：“你这种

行为，岂不是巴结长官？你是那里来的钱？凭你这样做，就不是爱惜人民国家”。又五原县长刘必达，不忍冯将军的生活艰苦清淡，特意送来两只鸭子，冯将军每只鸭子回敬了他十军棍，打了刘县长二十军棍。并说：“你只看到我每天吃咸菜，你就没见士兵吃不饱肚子！”从这几件事情，可以看出冯将军的刚正廉明之风。刘必达县长送鸭子、挨军棍、自讨没趣的事情，后来成为人们茶余饭后谈话的笑料。其实，冯将军亦深知刘县长是个好官，他之所以这样处置，是有其不得已的苦衷。后来，冯将军在张家口抗日时，刘必达也去了察哈尔省，又当了县长，在任内政绩卓著，民众给予好评。

民众帮忙功自成

当五原誓师的时候，时令已到深秋，士兵的穿衣问题急待解决。五原地方贫瘠，居民不多，住着这么多队伍，吃饭也成了大问题。奉军张作霖为置国民军于死地，封锁了交通，布匹之类用品到不了包头，来不了五原。国民军为解决士兵的衣着，把包头和五原市面上的布匹购买一空。但大都是土布，虽有少量宽幅匹的市布，其颜色不一样。用土布做衣里，用市布做衣面，做成衣服后，青兰相间地发给士兵穿上，彼此相视，不禁

互为一笑。但由于国民军平时训练有素，简朴成风，照样地精神振奋，号令严明。要是换成别的军队，处此困境，其军纪之废弛，实不堪设想。

民众把帮助国民军视为帮助革命。由于军民关系处得好，五原十八家六陈行和部分大商号，主动地给国民军资助粮食和椽檩木料，官兵们自己动手，修建了两座营房，（一座在东门外今农业试验站处，一座在旧城原县政府北首）。五原绅士王英，联合当地群众，给国民军捐赠了三万只羊，以羊肉供军食改善了官兵生活，用羊皮做成军装，接济了当时的军需。

冯将军在五原时间虽短，但因受苏联十月革命的教益与影响，深知欲达到国民革命之目的，必须唤起民众。所以十分重视民运工作，关心群众利益和地方文化教育事业。他协助地方，在县城建立了农会和商会，还建立起一所民众教育讲习所（所址在原西街完小院内）。民众们主动去听讲的男女老少，一天比一天增多。在以前，五原没有教育局，冯将军来后，增设了教育局。并给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校加聘教师，增设了班级，就学的学生大增。为了广开财源，增加收入，举办公益事业，还增设了财政局。五原民众对冯将军这些利民举措，非常赞颂。

一边整训，一边开拔

当五原誓师时，广东的国民革命北伐军已经攻克武汉，继续向前推进。冯将军权衡当时的形势，国民军究应东进直取北京，还是西进陕甘，举棋不定。这时中共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同志，从北京给冯将军来了密信，建议冯将军应和广东的北伐军靠拢，主张国民军应出宁夏，入甘陕，解西安之围，取潼关，会师中原。冯将军采纳了李大钊同志的作战计划，制定了“固甘、援陕、联晋、图豫”的八字作战方针。

国民军在南口败仗后，人员、马匹、军械急待补充。苏联援运的军事装备，取道外蒙，以汽车向五原运送。冯将军用苏援装备及弹药来扩充军队，一面严整部队纪律，加紧军事训练，冯将军还亲去包头检阅部队，他深入连队，召集官兵讲话，灌输革命思想，鼓舞革命士气。使国民军成为一支有主义，有信仰、守纪律的革命军队。为实行孙中山先生倡导的三民主义，完成国民革命的职志，提出了三个口号：一是军队政治化，二是打破官僚习气，三是拔除阳奉阴违的恶根。部队整训就绪后，冯将军按照李大钊同志的作战计划，分兵十路，陆续开拔。于同年十月间从包头回到五原，部署了军政事宜，十一月二十四

日，率部离开五原，浩浩荡荡的向西挺进。五原各界群众夹道欢送，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校长王兴，和部分年龄较大的学生杨林旺、党栋等，受到革命思潮的影响，毅然参加了国民军的北伐行列，随军前进。国民军穿过宁夏，入甘陕，旗开得胜，先解了西安之围，占据了潼关，于一九二七年八月，在豫东一战，击败了张宗昌的主力部队，俘虏达两万多人，打垮了北洋军的力量。

此战告捷后，冯将军挥师北上，下天津、占北京，推翻了北洋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完成了伟大的北伐革命。

附：五原誓师通电宣言

五原誓师通电宣言

玉祥本是一个武人，半生戎马，未尝学问，惟不自量，力图救国。怎奈才识短浅，对于革命的方法不得要领，所以飘然下野，去国远游。及至走到苏联，看见了世界革命，起了万丈高潮。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受国外帝国主义与国内军阀双重压迫，革命运动早已勃兴；又受世界的影响，民族解放的要求，愈加迫切，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与所领导的国民革命即由此而生，于是我明白了救国的要诀已经由他开辟了道路。中山先生说的好，行易知难。我既是知道了，自然是

刻不容缓的马上干起来。又因，最近中国的国民从国民军退后，受压迫比从前更厉害，我的热心沸腾起来，情不获已，遂赶紧回国，与诸同志上革命战线，共同奋斗。我这是没有办法而去，有了办法而来，走的时候不是洁然鸣高，来的时候不是怎么东山再起。现在当归国之始，有些必要的话，掬诚以告国人。我是生在工人家庭中，父为瓦工，贫无立锥，完全是无产阶级的人。自幼失学，及长入伍当兵，逢着庚子年，八国联军打中国结下辛丑条约，我受了强烈的刺激，愤政府失败，改革的思想于是萌芽。后来受了革命的影响，也形成了推翻满清的志愿。辛亥武昌起义，我与张之江、李鸣钟、张树声、韩复渠诸同仁。同僚王金铭、施从云、白亚雨诸烈士举兵响应，而有滦州之役；不幸被王怀庆所欺，功败垂成，王、施、白诸烈士即时成仁就义。我同张、李、韩均被递解回籍，仅以身免。民国以后，我又出来治兵，苦力经营，以成陆军第六混成旅。袁世凯叛国称帝，我在四川与蔡松坡联络，并助成四川独立。民六张勋复辟，我正去职，养病西山，疾到廊房，先马厂誓师而起兵，进攻北京，击溃辫兵。民七南北军战于长岳，十六混成旅停兵武穴以牵制南下之军。民国十三年，曹锟贿选窃位，吴佩孚骄纵横暴，用武力统一政策以乱川扰粤，

而直鲁鄂豫受其直辖，为祸更烈，并逞其凶残，惨杀工人学生，尤为国人所共弃。后来又动全国之兵，攻打奉天，穷兵黩武，涂炭生灵。我与胡景翼、孙岳，均痛心疾首，不能不取断然行动，遂率师回京，举行首都革命，倒曹败吴，并驱逐帝制余孽溥仪，以完辛亥革命未竟之功。这一次的意义，一是讨伐贿选，为中国人争人格；二是反对武力统一，用免兵祸；三是铲除帝制祸根，免得再闹复辟的乱子；四是开远东民族解放之局面。当时段祺瑞以革命政府相标榜，我们看着他遭过失败，养晦多年，当有觉悟，所以请他出来，此后，他仍是引用私人，败行失政，解决金佛朗案，使国家受莫大损失。国人至今，尤痛恨他的革命政府完全是假的。对于民众，不但不解放，而且严重的压迫，弄到后来，演成“三·一八”的毒杀案子，枪击学生，出了极暴烈的惨剧。政府成了杀人的政府，岂有再拥护他的余地？所以有倒段之举。以上这些事实，都是从革命路线上而作的。他人不知，乃斥为几次倒戈，责我为惯于逼官。这是由于不明白革命，所以我特写述出来，好使国人对于我有明确的认识。有人骂孙中山先生，说孙中山算是有点革命癖，无论走到什么地方，就是要革命，若是他的儿子孙科当了大总统，他也要革命的。在他人以为这是骂孙先生，其实孙先生

的伟大正是在此。一个革命者，只要看见统治者作的不对，就得要革命，无论他是亲属也好，长官也好，站在民族的意义，这些个人私情，一概都顾不得。吴佩孚张嘴闭嘴所抱守的纲常名教，尽可能由学究们放在纸堆里保存，不能拿到二十世纪的民主国家里害人。但是有一层，我虽然做过一点革命事业，我却没有鲜明的革命旗帜，因为我对于革命，只有笼统的观念，没有明确的主张。革命的主义，革命的方法，在从前我却没有考察，所以只有一二点改革式的革命，而没有彻底的作法。我也赤裸裸的说出来，好使国人知道我作得忽而是革命，忽而又不象革命，其缘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就革命的观点上说去，若说是中国革命者，是一个中山主义者，我都不配，至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与世界革命的话，更是说不上。不意当时有人说我赤化了，现在看起来，真是惭愧。当时的冯玉祥，哪里够得上赤化了？不但骂我的人不知赤化是什么，就是我自己，亦不知什么是赤化。骂我的人，也说不出根据来，只说不该与苏联亲善。我想世界各帝国主义者，用不平等条约压迫中国，致中国的死命，只有苏联自动的取消不平等条约，以平等待我们民族，自是引起我们的好感，使我们彼此亲善。若对于以平等待我的人，而不能与之亲善，反去巴

结以奴隶待我们的国家，这是何等亡国心理？这是要请国人明白的。至于吴佩孚乱造谣言，说我与苏联结了什么密约，尤其荒唐之语！我向来痛恶卖国贼与外国人结密约，岂有躬身自蹈之理？苏联把种种不平等的条约自动的取消了，哪里有再结不利于中国的条约之理？况且我个人的性格所在，绝不屑做这种鬼崇之事。如果有什么密约，也不能久于瞒人，什么密约，什么条件，何以绝无所闻？若说苏联帮助中国革命，有所怀疑，要知道苏联是以解放世界上被压迫者并扶助弱小民族为己任；主义在此，什么不利于人民的事都做不出来。吴佩孚肚子里比谁都明白，他明白冯玉祥不是结密约之人，无论如何做不出来这种事来的。他又知道离赤化离得很远，够不上带这帽子，而他偏要说什么密约，又是什么讨赤，完全是骗人来共同反对国民军，以泄他的私愤。大家不知道随声附和，实在上了他的大当。吴佩孚先是号召的所谓讨贼战争，后来忽一变而为反国民军的战争，国民军退天津，退北京，一再让步，谁知你越让，他越攻，军阀何以如此呢？军阀本身，实在无此力量，乃是帝国主义者背后支持。因此，我们要想战胜军阀，必须先要打倒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在中国压迫之甚，几使中国不能生存。工人、农民及一切受苦难的人为什么这样

穷？这样苦？就是帝国主义所给的。帝国主义的各国，强迫中国订立许多不平等条约，于是中国有租界，有租界地，有海陆空驻扎权，有航行权，有领事裁判权，修铁路，开矿山，把持中国的海关，强制中国行协定关税，压迫剥削，不一而足。例如抽关税，只能值百抽二五，使中国国库少收入，整理财政无从着手；而最大的害处，是在阻碍工商业之发展，制中国经济之死命，使他们的货物尽量输入，使中国的原料贱价输出。于是中国每年进口货超过出口货，其数量在三万万两银子之谱，赔款及外债，本息偿还，单是在关盐两税项下拨付的，每年就是九千八百万元。至于他们在中国经营的矿山轮船，各种工厂，各地银行纸币所吸收的大批现金更是无算。又因关税不自主，不能保护国货发展，致使洋货遍中国，吸去的现金不可胜计。如此中国只得贫困，而且穷到死的地步！帝国主义的侵略，把中国弄穷了，又用政治侵略陷中国于危境。东交民巷的公使团，是何等的强横，稍为明白中国政局的没有不知道的。他们对于中国的内政动辄加以干涉，如去年大沽事件，干涉国民军即是一例。其最厉害的是利用中国军阀压迫中国民众，又唆使军阀互相战争不已，以巩固其在华之权利。遂使民国成立十五年，年年都有战祸。已经被他们弄穷了的中

国，又加上十几年的战争，于是农人、工人、商人、学生、机关职员、新闻记者、兵士及一切的民众，穷得穷死，其原因都在于此。苦痛的来源已经求出了，我们要解除这深切的痛苦，惟有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因此我就投袂而起，与革命同志共同担负起这个使命。现在我所努力的是遵奉孙中山先生的遗嘱，进行国民革命，实行“三民主义”。所有国民党一、两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与议决案全部接受，并促其实现。今后将国民军建在民众的意义上，完全为民众的武力，与民众相结合。军队所在的地方，工人组织，农人组织，均当帮助，并联合其他民众团体，共负革命的责任。同时对于学生、教员、商人、机关职员、新闻记者及各阶级之利益均极力顾全意义是解放中国被压迫之民族，以与世界各民族平等，解除军阀之压迫，使工人不受剥削，农人不受穷苦，商人不破产，学生有书读，教员及机关职员都有薪水发，新闻记者不发生性命的危险，以及其他人民的痛苦均能解除。至于政治主张，我是一个国民党党员，又是国民政府委员之一，一切由国民党决定，国民政府主持。我惟有与诸同志集合全体的力量履行就是了，谨此宣言。

民国十五年九月十六日

冯玉祥五原誓师前后见闻补遗

李述唐

冯玉祥在任北京政府西北边防督办期间，响应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号召，进行改旗换帜、变制立新。第一件事是废除中华民国红、黄、兰、白、黑五色国旗，竖起了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追随孙中山先生进行革命，实行打倒列强、铲除军阀、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政策。冯玉祥本人去过苏联，曾和共产党合作共事。当时的五族学院，是旧绥远省时人所共知的，冯玉祥把这所学院改为“中山学院”。冯部的石友山第八混成旅，亦响应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号召，赶溥仪出宫。此时，被清廷利用的包头“哥老会”头目小五杨被冯清除后，冯玉祥于1926年（民国15年）在五原誓师西进，到达磴口。在此期间，又把混进革命阵营的，不守军纪、抢劫民财的国民军二军巩步魁部缴械，赶出革命队伍，为民除害，重整军纪。

冯玉祥还成立了随军干部学校，培养军政革命人才。五原县旧城南门外第一小学就曾设立过

干部学校。随军干部学校排除派系界线，一视同仁，广泛联络革命军人，团结多党派及爱国人士。当时人们说山西有一个半军人，一个是指赵守钰，半个是指张培美。赵守钰就参加了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任第一军第一师师长。还有些共产党人，也在冯的军队里工作。

冯玉祥干的第二件事是进行政治改革，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主权。在广泛宣传解放国民思想，救国救民的同时，结合国际国内的实际情况，改革国家体制。他把北京政府沿用的，满清政府设立的官衙体制，与国际上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以及束缚人民思想的旧风俗习惯，统统废除。在孙中山的国民革命尚未成功，国内未统一，国际上未承认的情况下，他借助各方面的有利条件，开展全民国家建设。当铁路修到包头之后，他取消了绥远的道尹衙门制。同时，一边改造旧职员，一边投放新的行政人员。以临河道尹为首，把清廷庚子赔款时划给外国帝国主义分子所有的土地，收回来，由政府接管，分给教内外人民耕种。他废除了三班六房衙役及县大人的旧统，而设立了农会、教育局、财务局等。教育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去掉官僚习气，爱民爱兵，官兵一体。旧制五原厅被废后，建立临河、安北、沃野、磴口等县，五原县改为“义旗县”。

下面是自己在此期间的所见所闻及收集的部分史料：

一、一九二五年（民国十四年）五原县长王文池卸任（由孙亲范接任）。王文池卸任时，地方绅士用木笼装了一双朝靴，挂在县城南门洞。含意是“清官挂靴，赃官脱帽”，吹捧王文池为官清正。刘必达随军西去之后，王文池复任五原县长，不久又被推下了台。人们都叫他“七口袋半”，说他临走时搜刮民财七口袋半银元。经过冯玉祥五原誓师后，人们对县长的前后看法和议论，是截然不同的。

二、肖道尹（其名不详）在临河把天主教堂的外国神甫召集来，向他们宣布国民革命的目的和政策。凡是能平等待我的国家，都愿意和他友好相处。并勒令他们把土地权移交给政府。但交涉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肖道尹说：“我姓肖（硝），你们是羊（洋），看我这硝把你们这些羊皮子熟软熟不软！”在军事、政治的双重压力下，据理力争，外国天主教神甫终于接受了国民革命政府的要求。按条约他们有在划定的区域内宣传教义权，没有土地所有权。过去他们放给教友的土地全部收回，向当地政府完粮纳税。（此事是岳成山提供，与当地教友说法一致）。

三、刘必达任五原县长时，冯玉祥的随军干

部学校设在五原县第一高等小学校内，从此学校停学了。我们同学中家庭贫寒、无家可归的学生仍住在学校。有一次，我去看望同学，见冯玉祥正给干校学员讲话，并把我們这些小學生也叫去听讲。冯玉祥说：“在北京赶宣统出官时，宣统给我们叩头如捣蒜。我说，你既是真龙天子，真龙给我叩头，我就该倒地死去，为啥你给我叩了这些头，我倒不了？看起来你这个真龙天子也是个假的！他一直给我叩头，叫我饶他性命，我一时心软放了他。放虎归山，以后必会伤人的。”言谈之间，颇有追悔之意。国民革命军西进之后，我又到学校玩，董荣说，干校学员一部分被冯玉祥保送去了苏联，一部分随军西进。我们同学中也有随军参加革命的，我们校长王兴也是就此随军西去的。

四、刘必达任五原县长时，在县政府墙上、监狱墙上写满了大字标语，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如要不报，时辰不到”、“你不犯法，谁能让你坐牢？”等等。

五、白怡道（即白焕瑜伯父）的羊被军队杀吃了，他便到冯玉祥司令部喊冤，门岗拦住不让进，白怡道就在门外喊：“国民军，你们是啥青天白日满地红，你该叫青天白日满地灰！”冯玉祥出来接见他，他跪在地下叫把他枪毙了。

冯玉祥双手把他扶起来说：“弟兄们到这里吃不上，穿不上，把你的羊杀得吃了，实在对不起，是我的不对，杀了多少只羊，我按价赔还给你，老大爷，快起来”。

六、据1926年参加过五原誓师的陈世义讲，刘少奇曾在冯玉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当过秘书长，制订过中国人民革命军步骑兵操典，门炳岳是当时的参谋主任。

七、冯玉祥在五原期间，抵制帝国主义文化侵略。许多教会学校的学生，都转学到县立第一小学读书了。

我在傅作义部三十五军作政治 工作的简忆

徐秀泉

抗日战争前，傅作义的嫡系部队只有一个军，即三十五军。部队中没有政工人员，不设专门的政治工作机构。抗日战争爆发后，傅作义率三十五军配合八路军参加了平型关战役，接着退守太原。日军围攻太原，因强弱悬殊，三十五军突围过黄河到山西石楼、中阳、离石一带整训。这时傅先生才开始筹划在部队中设置政工人员，建立政工机构。

首先成立了政治工作委员会，傅先生自任主任，周北峰任秘书长。下设两个组：一个是军工组，于纯斋任组长；一个是民工组，周钧任组长。

一九三七年派于纯斋赴西安招收一批流亡学生和有志青年，作为政工人员骨干，同时请求毛主席派人指导协助。一九三八年二月间，于纯斋从西安招了六十余人（据说从延安派的人也在

内)。通过潼关，临汾、汾阳到离石县柳林镇（当时三十五军总部设在柳林镇），在双塔寺集训。我是从山东经潼关直接到离石县柳林镇参加集训。

一九三八年三月初，日军进犯汾阳，集训的政工学员，随总部由军渡过黄河，到陕西吴堡县义和镇，编为一个大队，由李××任队长。下设两个小分队，我分在第二队，队长为白凤藻，每队三个班，班长由队里指定。不几天，日军占据汾阳，进到柳林镇。政工队从义和镇沿黄河西岸北上，经葭县，过黄河桃花渡到了山西临县，沿途又吸收数人参加。三十五军总部设在三交镇，政工队住鬼崩村。

一九三八年四月初，政工队开始分配，分为军工、民工两部分。军工部分派到部队工作；民工部分随部队做地方工作，有一部分到后方接领新兵，军工由于纯斋领导。当时傅作义部只有一个军（35军）两个师（101师和73师），四个旅，八个团。政工人员的分配是这样的：军部留三人随于纯斋工作：每师主任一人，干事二人，每旅主任一人，干事一人，每团指导员一人，干事一人，连队不设。不论主任、指导员、干事，均佩戴“政工员”符号，臂上戴“三十五军”红布臂章（长约三寸，宽约一寸），没有军

衔，不分级别，每人每月生活费约为二十元。

政工队在去部队之前，傅先生曾集合讲了一次话，大意是：到部队之后，不布置具体任务，只要求熟悉部队生活，与官兵建立感情，宣传抗战，鼓励士气。我与侯过极被分配到73师211旅421团，指定我为指导员，侯为干事，师长是刘奉滨，旅长是孙兰峰，团长是刘景新，我们到团部后和团长、团副（当时无副团长编制）及团部人员见了面，第三天集合官兵作了介绍。团部住在临县佛堂峪，大约住了七、八天，就奉命出发参加绥南战役。

部队经过房山、岚县、五寨，出长城红山口，过红河，一般都是夜间行军，白天休息。侯过极家在五寨，路过五寨时可能是请假，便和我分手了。在行军中，我始终和连队士兵在一起。休息时，便教给士兵抗战歌曲，主要的有《大刀进行曲》、《军民合作》、《流亡三部曲》等。有时讲些故事，有时讲些抗战必胜的道理。当时傅部官兵纪律严明，士气旺盛，明知赴前线作战，长途行军却很少有掉队的，更没有开小差的。记不清走了几天，便到达绥远省清水河县。

到达清水河县，拂晓开始攻击。我是初次参加战争，在枪响之前尚有胆虚之感，及至打响之后，始终与团部人员在一起。战斗大约进行了两

小时，敌人完全退却（敌人全是伪军，没有日军）。天明后进入清水河县城，我随团部住在东门外，于纯斋曾招集我们了解情况，并让我在城内墙壁上书写大字抗日标语。住一、两天后部队向北进发，到达和林县城，开始阶段，战斗短促，顺利地赶走敌人（也是伪军）。据说傅作义先生当时的部署是这样的：在进攻清水河县的同时，一部分兵力绕道至旗下营一带阻击日寇援军；一部分兵力越过和林向归绥（呼市）推进，准备收复归绥。但是攻下和林之后，向归绥推进的兵力在喇嘛庙受挫。日军骑兵尾追到了和林，展开战斗。是夜形成了混战状态。我团一个连摸到敌人安置马匹的山沟里，突然袭击将敌人的马匹俘获大半。敌人无马，纷纷退去。随后，日军大批增援又到，我军便转移撤退，敌人陆续追来，在大小双墩子和韭菜庄一带又展开激烈战斗，我军损失颇大，冒着大风大雨撤至偏关。敌人追至偏关，经过十分激烈的战斗后，退至河曲。敌人也从偏关退走。这时三十五军便住在偏关、河曲一带。军部设在河曲。

政工队在这一段都紧跟部队，做鼓励宣传，救护伤员工作。生活虽然艰苦危险，但情绪激昂，精神振奋。到了河曲集中在大营盘、唐家会整训。这时政工队又新增一批队员，一部分是原

绥远省的“乡导员”，一部分是从后方招来的流亡学生。整训后，军部正式成立了政训处，改由周钧任主任，于纯斋又被派到西安再招收一批政工人员。政训处共分四个科：一是总务科，二是民运科，三是宣传科，四是组织科。每科设科长一人，科员一至两人。我被重新分配到组织科任干事（即科员），科长为潘纪文同志。部队中除师、旅、团仍按以前编制外，各营都增加了指导员。

一九三八年八月间，由西安又招来一批学员，其中有女性六人，并有些青年学生。部队中无法安排，军政训处决定成立文工团，定名为“三十五军奋斗剧团”，派我担任该团主任。十月间于纯斋又率领一批新招的人员（约五十余人）来到河曲。这批人员没有分配在三十五军，在河曲略事休息，便进入河套。当时河套有李大超率领原绥远省国民兵组成的游击军，这批人员便分派在游击军政治部。傅作义进入河套后，游击军改编为正规军，扩编到三十五军内。这些政工人员连同一部分乡导员便组成了“绥远省动委会”，以后成了地方政府的骨干。

三十五军政训处在河曲住了半年光景，傅作义被国民党命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一九三九年四月，政工人员随部队一起开往河套。六月全体

政工人员参加了“抗建会”。经过抗建会讨论后，从延安来的同志便陆续离去。三十五军扩编为三个师九个团。这时奋斗剧团无形取消，我又被派到新31师93团任政治指导员，配有干事一人，通讯兵一人。军政训处改为政治部，仍为四个科，每科科长一人，科员二至三人不等。部队的政治工作重点放在连队。连指导员除了协助连长办理连队日常事务外，主要对士兵进行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不参加军事活动。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国民党中央派张彝鼎、苏寿余等筹设第八战区副长官政治部。原来的三十五军政工人员开始定了军衔，军政治部主任为将级，师政治部主任为上校，团指导员一般为中校（我也定为中校），连队为上尉或中尉，科长、科员、干事都比照定了级。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下旬，三十五军为配合湘北战场，袭击包头，损失颇重。退回河套后，日军尾追至河套。傅先生采取避战方法，使日军困惑仓惶退去，留大量伪军配合少量日军据守五原一带。傅先生又采取奇袭战术，进行了五原战役，获得大胜。把全部日军及大部伪军消灭。从此日军退至包头以东，以伪军据守包头以西至西山嘴一带，以后，再没有发生大的战役。

五原战役后，国民党中央派来的政工人员，

以张彝鼎、苏寿余为首成立了第八战区傅司令长官部政治部；同时在傅作义部队中建立国民党组织，政工人员必须入党；部队中政工组织也随着改变。先是将师政治部改为国民党特别党部，后又改为政治督导员室，以后又将军政治部改为特别党部；将师政治督导员室改为师政治部，由一名副师长兼任政治部主任。我在一九四〇年六月间（五原战役后），集体加入了国民党。由新31师93团政治指导员，调为新31师特别党部秘书。（特别党部书记长由该师参谋长孟昭第兼任）。不久改为政治督导员室，派来傅次曲为督导员（不久便又离去）。我仍任秘书，下设干事一人，通信兵一人，团连政工组织照旧。工作和以前一样，不过增加一些办理官兵集体加入国民党的手续。一九四二年三月，我被调至三十五军政治部任科长。五月被派到重庆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受训。六月结业傅作义命我留在汉中、城固一带招收一批地方行政人员。十月率领所招人员回到陕坝。这时军政治部已改为特别党部，我被调到傅长官政治部任科员。十二月被调到暂三军司令部任秘书。从此便脱离了部队政治工作。以后只知道第一批从西安招收的政工人员，有的离河套地区，有的改作其它工作，绝大部分脱离了部队政治工作。

傅作义任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后，政工组织没有变动，不过人员已陆续增加，日本投降后，傅作义东进，一九四七年三月，长官部政治部及军师政治部都改为新闻处，傅作义任五省“剿匪”总司令后，总部也成立了新闻处，团、连仍不变，各级政工人员的工作仍然协助部队长官办理部队中的事务，不参与军事活动，另外增加了国民党党务工作，严格检查防止共产党的活动。

我从一九四六年起脱离部队，转到地方行政部门，在国民党政府中任秘书。关于部队中的政治工作就完全不清楚了。

河套推行新县制的形势及其

人事训练配备概况

罗德宗

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先生，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芦沟桥事变后，任北路军总指挥，归第二战区长官阎锡山指挥。因绥包沦陷，绥远省政府迁至榆林办公。

一九三八年底，蒋介石在陕西武功召开西北军事会议，任命傅将军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归兰州朱绍良指挥，始脱离阎锡山控制。傅于一九三九年春，率军经河曲、偏关转来河套进驻陕坝（现杭锦后旗政府所在地），流亡陕西榆林的绥远省政府人员，亦相随来套，重整机构，开始办公。

当时在东从西山咀退水起，西至磴口止，狼山南、黄河北这一块富饶的土地上，居住着的蒙、汉、回等各族人民本来可以过安宁的生活，但是事实恰恰相反。其原因是自民国成立以来，

河套地区长期就是兵、匪窜扰之地。除杨侯小、赵半吊子、芦占魁、王英这些有名大股匪徒外，零星散匪不计其数；在蒙旗王公封建制度统治下，广大农牧民更是苦不堪言；汉族地主阶级剥削贫苦农民，心狠手毒；再加屯垦队的势力、天主教堂的特权、哥老会的暗中作祟，终年劳碌的人民大众不仅食不饱腹，衣不遮体，甚至连生命也得不到应有的保障。真是“匪如梳，兵如篦，团防自卫（地方武器）刀刀剔”，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过着极其痛苦的生活。

傅作义将军驻河套后的新气象

一九三五年，傅作义将军率部进驻河套，在陕坝成立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后，绥远省的党政各机关亦相继重整组织，在陕坝正式办公。河套地区经傅先生实施整军建政的各项措施后，暂时又出现了稳定的社会环境，农牧商学各安其业，生产有所发展。

傅统领的三十五军驻防河套后，一些自发组成的地方武装，蒙旗保安部队，都受到整编训练，军纪松弛、纪律不好的扰民行为受到约束或自动收敛，而土匪经剿灭基本绝迹，社会治安一度较为稳定。

一九三九年经过新公中、百川堡的抗建讨论

会后，军政干部意志集中，认识统一。五、临、安两个半县（当时安北县退水东已被日军占领，故称半个县）的行政组织也渐健全起来，对当时支援抗战，推行政令，作到有条不紊；再者当时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傅将军视野高远，采纳了一些共产党为国为民的有益措施，根据当时河套地区实际情况及抗战时期军事、政治的需要，组建绥远省动员委员会，动员民众，组成浩浩荡荡的抗日大军；把县级以下区乡行政人事任用，施政方针等权力全部给予行政，改变了军统政的现象。凡此种种在当时实属明智之举，也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身兼军政两职领导的傅将军，对发展农业生产非常重视，对这一保证军需供应，保障人民生活的大事，采取了一些应时的积极政令。比如：实行合理负担，减轻贫苦农民交税比例，调动军队挖渠修渠，扩大耕地面积，提高农作物产量，春播秋耕期间禁止军队向地方征用耕畜车辆，夏秋季节让军队协助农民抢收庄稼，防止水灾，抢堵决口等等，都对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省政府每年也兴修水利，调剂耕地，发放救济粮款、信贷、藉以恢复生产。春季组成春耕督导团，到各县指导生产，解决困难；冬季组成年

终检查团，到各县检查政绩。

由于军政机构的充实健全，农业生产的发展，随之各业也兴盛起来。不仅当时军政中心的陕坝商号林立，五原、临河县城、黄羊、蛮会、乌镇、扒子补隆等地亦见商号、小铺，碾磨房、油粉房等在四乡开业。后山、宁夏等地的商旅在河套往来不绝。一般日用品供应也较为充足。

“农民冬天皮袄皮裤，夏天一身老布（手工纺线织成），平时捞饭酸粥，过年过节酸菜猪肉。”这就是当时富裕些农民的生活实况。

在生产发展、社会安定的情况下，教育事业也逐渐恢复发展起来，国立绥中在三道桥梅令庙正式开学复课，各县的完全小学，区乡的初级小学，也都招生授课。

在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二年的四年时间里，除五原战役外，与日寇侵略军只在西山咀隔河对峙，再未发生大规模战斗。军队加紧整训，同时扩大编制，充实建制，增加兵员。

社会安定了，生产、教育和军事发展了，又给当时的社会带来新的矛盾。因人口急增，地域辽阔，交通不便，行政机关权力分散，动员委员会组织不符合行政系统要求，全国已推行新县制等诸种原因，河套现行地方政府急需调整改组，以便适应军事、政治、生产发展的要求。经过省

府充分酝酿，认为河套实施新县制条件已成熟，应列为紧迫任务来完成，随决定一九四二年夏，在绥西实施新县制。

河套实施新县制的人员训练

参加新县制训练班的人员来自四个方面：一是绥远省动员委员会的省、县、区、乡四级的全部人员；二是省、县、区、乡四级政府选送的行政人员；三是军队中的部分下级军官及政工人员；四是由地方推选的优秀青年（高小文化程度的积极分子），共计四百多人。

一九四二年初在八岱绥远省地方行政人员训练团内，开办了为期六个星期的施行新县制人员训练班。

受训人员按军事组织编成中队、小队、班。每班十六人，三班为一个小队，三小队为一个中队。中队长由校级军官担任，并委派指导员一人，由绥干团或省三青团干部中调人兼任。小队长都是尉级军官，班长在受训学员中自选。

开学典礼，由身兼八战区副司令长官、绥远省政府主席及绥远省行政干部训练团主任的傅作义先生亲自主持。省级机关、各县政府的军政首长全部参加，仪式甚为隆重。傅先生关于国内军事形势、绥西军政现况，实施新县制重要意义的

长篇讲话，更是激发斗志，鼓舞人心。

新县制干部训练班课程可分为三大类：政治课、军事课、精神训练课。

政治课的内容有：总理遗教，总裁言行，党团业务等。由省党部三青团省级负责人讲授。

行政课目讲授：民、财、建、教、水利、地政、保安等各种行政理论，由各负责厅、局出人担任教员，对训政时期实施新县制有关课目有所偏重。

军事课从基本训练到班排教练，并讲述军事常识，但均为徒手教练，未发武器。

河套地处前线，行政人员平时亦实行军事生活，身着军装，军风纪教育亦同样要求很严，所以又有精神训练一类课目。除每星期一总理纪念周外，每日早晚有升降旗讲话。军风纪素养教育要求做到：仪表严肃、威武、军装整齐划一，皮带、裹腿、鞋带都按规定装束。内务上被子叠成方块，有棱有角，脸巾、牙缸排列成三条直线，环境保持清洁卫生，坐要正、行要直，养成一个良好的作人作事的优良作风。

受训期间各课均在大礼堂内集中讲授，教官在讲台上讲解，学员抄本放在膝盖上记录，每日晚饭后在宿舍内，以小队为单位进行讨论复习。每天上午讲授四节，下午讲授两节。

军事课多在每日下午进行，两小时操练，由各自所属队长担任教官。因系行政人员，训练要求并不严格。

六周的训练是：第一周是入伍周，先讲此次集训目的、课程、生活安排、对学员要求等，号召学员象一张白纸，一个小学生那样，重新从头学起。第二周为学习周，第三周为再习周，一切课目都在两周内详细讲授。要求学员刻苦学习理论知识、行政业务、提高办事能力。第四周为巩固周，对所学课程要求学员记牢，深刻理解，在将来实际工作中有所遵循。第五周是实习周，进行混合（各队打破组织互相掺杂）小组讨论、大会发言等。第六周是结业周、学员互作联谊，交谈学习心得体会等，以增进友谊，互相了解，以期在结业分配工作后，同心协力，共促抗建伟业，早胜早成。

结业周内，在八岱东北举行了一次步炮联合军事演习，全体学员列队参观，使一些没有参加过战斗或未见过战斗场面的人，受到一次实地训练。

在黄羊木头还举行了一次空室清野演习。抗战还在进行，战斗随时均可发生，这样演习实属必要。对战时民众组训、疏散、粮食、财产的埋藏，水井填封、伤兵运送救护等有关工作，各级

地方政府、行政人员应作些什么，怎样去做等等，作了两天实地演习、训练，亦收到良好效果。

六周训练完毕，于五月中旬举行结业。在结业典礼上，傅将军亲临主持发表演讲，训勉大家廉洁自爱，奉公守法，实施新政，促使抗战早胜，建国早成。在结业典礼上还宣布了一项法令：凡在新县制实施后，工作有特殊成绩者，可破格提升为县长。这一鼓舞干部积极向上的决定，使一些行政人员在以后施政中工作很努力。因此，狼山太和乡张亨信曾提升晏江县长，乡长傅观澜调任陶力民组训处主任（县长级）。

为了加深对下级干部的了解，在结业前，傅作义将军曾在训练团内点名接见学习成绩好，表现好，有学识有才能的部分学员。傅长官在高教圪疸（团内教官驻地），个别点名接见。每人呼名入室，立正、敬礼，后简单问话数句，一两分钟便退出。这样略能看出你的外表仪容，举止态度，是否镇静惊慌，临事反映，谈吐个性等。

典礼前，公布人事分配名单，新设米仓、狼山、晏江三设治局（县的前身），再经过一段时间完成保甲整编，乡道修建，学校成立等工作后，报国民政府撤治改县。在各设治局（县）的人选上，党政军各派系争夺激烈、背景复杂，非

当事参与人员难知其详。当时发表米仓县县长是张福生，狼山设治局长赵国鼎，晏江设治局长家业竣。每县又发给一份干部名单。名单中第一列出科级人员名字，由各县局长按其学识能力分配工作，主管秘书科长职务。第二列出乡长名字，由县局长分配到各乡工作。第三列出一般人员名字，凡县里科员事务等人，各乡公所干事，都由这些人员分别选任。

这是一次任人唯贤的干部任用，县长不用一个私人，全由省府分配。经过训练期间的共同生活，认识了解，平时交往，上级介绍，自传熟悉等各种方式，基本上对分配人员，负责者是熟知的，所以后来派到各种岗位上，大都能人尽其才、胜任其职，成绩卓著。

受训期间，每个学员都要填写自传一份，其统一格式是：前言、学历，崇拜古今伟人是谁及其它等项目。在结业周初，写好上交。

参加新县制受训学员，在职者薪俸照旧，至分配工作报到任职时，再评级评薪。不管是什么人员，受训期供给伙食，每天两顿白面馒头，一碗奋斗菜（山药、粉条、白菜）。上自傅将军，下至伙马夫，一视同仁，不分高下。这种官兵一体的优良作风，在国民党部队，除傅部，其它军政各界尚不多见，故特一提。

训练期间，曾出刊“突击报”一份，是临时性的小型油印刊物，由宋永年等编印，不定期的出了四期。她以生动活泼的杂文、小品等写实文章，报导学员在受训期间的各种生活，对推动学习起到良好的作用。

中队各出过一次壁报，刊登各式文体，反映学习生活的稿件，相应的对写稿人的才智有所了解和提高。

歌咏活动也很活跃。每晚就宿前学唱革命歌曲，平时集合解散时也要唱歌。《绥西青年进行曲》、《全民总动员》，这些由乔东君、典清彰宋永年新编的歌曲，以后在河套广为流传。《保卫黄河》、《太行山上》、《西北青年进行曲》、《军民合作》等歌曲，也人人爱唱，普及民间。

民间艺人孙小辫、高大楞在受训期间到团献艺，演出魔术、九连灯等，丰富了受训期间的文艺生活。

党团调统在新县制干部训练班的活动

绥干团中没有建立国民党三青团的常设机构，在训练期间只派人前来参加临时工作。分别召集了两次党团员会议，指示在学习期内各方面作出表率，起到核心带头模范作用。

绥远调查统计室，在受训期间搞的特务罪恶活动，值得一叙，使现在的人们对旧社会各界民主爱国进步人士，所受迫害真象有所明瞭。

“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是旧中国执政的国民党实现其一党专政，一人独裁喊出的口号。“攘外必先安内”是反革命的既定政策，具体内容就是消灭共产党。调统室是国民党内进行特务活动的机构，魔爪伸向社会各个角落。已往绥远省动员委员会的作风、工作，早被那些破坏统一战线，坚持投降的反革命分子所痛恨，而这次全体人员参加受训后，又将分配到县、区、乡各级政府工作，对此特务们加紧暗中活动，控制人们思想、刺探可疑者言行，以实现其除之而后快的阴谋。

在这次训练期间，绥远省党部执行委员耿正模，在训练班主持党务工作，调统室专员魏纯美、王兰亭则在背后暗藏活动。其方法是：一、通过平时搜集的材料，对可疑人员进行言行观察，不时召集个别谈话、用“晓以大义”威胁利诱、伪造证据等卑劣方式，迫使坠其圈套；二、在各中队潜设监视人员，对某些人暗中监视，及时反映情况；三、在奋斗室（即团内图书室）中放置部分进步书刊，侦察借阅人员，定为“可疑分子”。

本人以学生出身投考军政干部学校，来到河套后，原分配动员委员会工作三年有余。我在后方时曾接触进步人士，阅读些进步书刊。来套工作后，常搞壁报、歌咏等，作抗日宣传工作。在此次训练期间，尽是原单位同事，是以听课笔记等常为人借阅传抄，又加性喜交往，故受无知蒙蔽者谎报行迹可疑，魏王二人对我倍加注意。耿正模曾找我单独谈话，赞赏我来前方抗战的爱国行动，而又说：“领导抗战建国非国民党，他党难成。”所以期望我“为党国效忠。”王兰亭找我谈话则尽述：“中国共产党不合国情，破坏抗战，倒行逆施。”魏纯美张牙舞爪，则审查诬我是后方来的奸党分子，只有脱党悔过自新重新做人，才有出路。三个人三种方式，一个目的；妄想逼迫我承认是共产党员，并揭发他人。其实我在四川时也接近过一些中共地下党员，来绥远三年多，早已失去联系，且从未闻其事，实无法满足特务们要求；而本人良知尚存，亦不愿用他人痛苦换取自身幸福。因此被定为“思想问题严重，共产党嫌疑分子。”当五月中旬新县制干部训练班结业时，公布各县干部名单中没有我的名字，接到的通知是留团（暂不分配工作待审），本人及亲近同事、好友无不惊叹。

当三位“七品”县官率其县乡僚属走马上任

时，我则背上行李，由一名武装士兵送到陕坝军警宪督察处报到，与当时社会上的各种“危害分子”共度了十五天的痛苦生活。后经同乡原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上校人事处长樊福宣多方说情营救，始保释放出，随即送国民党陕坝区党部，以三青团组织关系戴罪图功。七月份参加国民党，开始了以后四年多的党务工作。

留团被捕原因是绥远省三民主义青年团组长陈绍以后悄悄告诉我的，并嘱以后言行多加克制。因当时他是我受训所在的中队指导员，负政治思想工作之责，故知之。

以上所记，已是四十多年以前的事，时光流逝，人世沧桑，多有谬误，希知者指正。

回忆我在狱中和李本洪相处的日子里

李敏才

一九四五年八月我在傅作义的三十五军军部副官处当上尉副官。日本投降后我奉军长鲁英麟的命令，随同当时战区司令部受降官孙兰峰由五原出发前往包头、归绥、大同等地受降。到大同时我因和副官处长打架，怕他报复连夜偷跑回五原。后经副官处长“告我”谋杀他和临阵脱逃，由军部发出通缉我的命令。因此我在五原被捕入狱，数天后即被转送陕坝长官部军法处。当时军法处正在忙于结束案件东迁归绥，到本年十一月间，军法处所押犯人，杀的杀，判刑的判刑，放的放，最后只剩下我们三个犯人。因为是新送去的，当时不能结案，军法处又急待迁往归绥，所以将我们三个新犯人寄押到陕坝侦察队（即傅作义的宪兵队）。

在长官部军法处东迁归绥前结案时，还发生过这样一件怪事，当时军法处结案，到最后除我们三个新犯人未审讯，还有两个老犯人没问过。最后这天、审问其中一人，因为他们两个人是

钉的一付脚镣，所以那个犯人也跟了去。军法处牛法官一见就问看守长：“我叫×××一个人，你怎么带来两人？”看守长说：“因为他们两人带一付脚镣。”牛法官问：“谁是×××？”×××答：“我是。”“你是新来的吧？”那人说：“不是。”“你是什么时候到军法处的？”那人答：“已经两三年了。”“你叫什么名字？”那人答：“我叫×××。”“你犯的什么罪？”那人答：“不知道。”“那为什么把你抓来的？”答：“因为查户口，我没有户口，就把我抓来。”“那为什么没有户口？”答：“我是从山西河曲来卖海红子的，所以没有户口。”“审问过你几次？”答：“一次也没有问过。”牛法官随后即找他的案卷，找了几天，全部案卷都找过了也没有他的案卷，最后牛法官叫他在陕坝找个保人放他。他说：“我是从山西来陕坝卖海红子的，而且是第一次来，谁也不认识，到那里找保人。”军法处在迁归绥前一天把他释放了。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国民党草菅人命滥抓滥扑有多么随便，平民百姓那有一点人权保障。这是我亲眼见到的千真万确的事实。只不过是因年久，忘掉了该人姓名。

我们寄押到侦察队不久，一天下午送来一个叫李本洪的人，年龄三十有余，听说话口音是东

北人，衣着非常讲究，沉默寡言，从表面看好象是个大商人，有好几天不和任何人说话。其他犯人有的问他一句，他只很简单的回答，很不愿意和别人说话，因此以后别人就不理他了。后来从看守人员中得知，李本洪原来是个共产党。这里关押的犯人，绝大多数是一般刑事犯，归侦察队审讯。我们从军法处送来寄押的三个人，归军法处审问。唯独李本洪一人归国民党绥远省党部党政总队（即调统特务组织）审问。

过了一个多月以后，李本洪才开始和我们接近了。但是多数人因怕惹事却不愿和他接近，只有我们三个军官和另外一个班长和他比较接近，经常和他说说笑笑的。他对我们所谈的只不过是些社会新闻和笑话趣闻而已。对政治问题，从不谈起。过了三个多月以后，他问我：“怎么这些犯人就是咱们两个人带脚镣？”我说：“因为你是共产党，我是谋杀长官，临阵脱逃，军法是判死刑，所以给我也带脚镣。”时间长了他对每个人的案情和身世也都了解清楚了。这期间他对我和那个班长刘福全最为接近，比较信任我们二人。在关押期间我突然患病，高烧二十多天，侦察队不管。当时我有许多军官学校的同学在陕坝，因为他们大多都是连长、营长，所以通过他们从外面请来医生给我看病。而李本洪日夜守护我，给

我端屎倒尿，使我非常感激。我病愈后，两人亲如兄弟，我的一切都无所顾忌地和他谈了，而且表示，我要死不了，今后一定跟他走，他笑而不答。此后，我的同学和朋友时常从外面给我送饭来，我们一同吃。我们花钱也不分彼此，他想看书报，我利用同学和朋友关系给他送书进来。有一天他和我说想给他父亲写封信，问我是否能想办法，我说一定能办到。他说：“只要我父亲知道此事后，他一定能想办法营救我。”我说：“你就赶快写吧，有机会我就给你送出去。”他的信是用一个铅笔头写在纸烟盒上的。当时他父亲住在兰州。数天后，我的同学刘印海来看我，我问他是否能派个亲信将此信送到兰州，他说可以，我就将信交给了他。

在解放军贺龙部队围攻绥包时期，陕坝人心惶惶，日夜不安，这时李本洪除带脚镣外，又给他加上手铐。我问他：这是因为什么？他说：“这证明他们快完蛋了，在他们完蛋之前，一定先下手解决我。”接着，他就问我：“你是死刑，如果真的被枪毙，到那时你怎样打算？”我说：“真枪毙我也没办法。”他说：“那你就老老实实叫人家枪毙你？”我说：“手无寸铁，只好如此。”他说：“我们不能老老实实等死！要想办法活下去。你可利用外面的关系，设法越狱

潜逃，总之不能等死。”

一九四六年二月间，李本洪父亲李庶之得知儿子在陕坝被捕的消息后，立即来陕营救。李庶之原系东北张学良部队老军官，和马占山也同过事。他从兰州来时带有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给傅作义的亲笔信，叫释放李本洪。李庶之到陕坝后，先找当时陕坝最高负责人张濯清（傅作义的参谋长），张说李本洪案件重大，国民党调统说他是中共东北三省委员，所以我不能释放，请你到归绥（即现在的呼市）见傅先生去吧。李庶之在去归绥前又到安北县找到朱霁清，因朱曾是国民党中央委员，由朱又给傅作义写的信，请求释放李本洪。李到绥后适逢马占山也在归绥开会，遂由马占山领李庶之会见了傅作义，既有朱绍良和朱霁清的信，又有马占山当面说情，傅作义不好推托，当即亲笔给陕坝张濯清参谋长写了信。其内容大意是：李本洪一案交其父严加管训，并限期出境。李庶之返陕将信交予张参谋长，李本洪才恢复自由。

李本洪是怎样被捕的呢？抗日前他在北平上大学，“一、二九”学生运动要求抗日，他作为学生代表到南京请愿时，被国民党逮捕押在陆军监狱，直到芦沟桥事变，国共二次合作抗日，他才得到释放，遂即在上海做地下工作。

一九四一年又因“共党嫌疑”被日本特务机关逮捕，因无证据，又经过其父托人送礼，关押年余始获释放，当即随其父回到兰州。这时，他因此失掉组织关系，在兰州他父亲不准他出门，所以更难找到组织关系。一九四三年他叔父李润之，在临河县民众教育馆工作，给他父亲去信，他才知道叔父在临河县。因为他叔父也是中共党员，所以他经常给他叔父写信。后来绥远省党部特务发觉李润之有共产党嫌疑，准备逮捕。李润之闻知后，速即连夜转移。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李本洪得知苏联军队出兵东北，他想和叔父一同去东北搞革命工作，事先给他叔父用暗语写信告知此事。临河的特务得此信后，立即回信，说你如来时可由兰州坐船到黄羊木头下船，再到临河城内仁记酱园找我即可。李本洪接信后，即带其妹婿（会苏联话，原系八战区长官部苏联翻译），由兰州坐船到黄羊木头。下船后，李本洪怕出问题，叫他妹婿在黄羊木头等候，并说若不发生问题，一定来人接你；如果今夜十二时以后无人来，就是我出了问题，你就赶快一人去东北。嘱咐完后，李本洪即到临河城内找到仁记酱园，打听李润园通之。国民党特务早已安排好了，仁记酱知特务，李本洪当即被捕。

李本洪和我在陕坝侦察总队关押半年之久，

案情系由国民党绥远省党部党政总队审讯，每次审讯都是夜间秘密过堂，特务们的主要证据就是李本洪给他叔父写的几封信。最后一封信中李本洪说，抗日胜利后的中国，将在暗跃中急速前进。特务们说暗跃中急速前进就是指共党而言。李坚决不承认是共党，最后几次审讯，由于李坚决不承认，对他施加酷刑，如灌凉水，坐老虎凳等刑法。但李坚贞不屈，始终也未承认。

在被押期间，有个看守长是侦察总队的一个班长，对待犯人非常蛮横，经常打骂犯人，所有犯人都对他恨之入骨，但也没有办法。而这个看守长却经常在夜间和犯人一块赌博推牌九，经常是输了不给钱，赢了拿上走。因此李本洪给出主意，叫犯人利用放风时路过总队部办公室门口，大声吼叫看守长赌博输了钱不给我们，结果第二天就又换了一个新的看守长。后来知道，原来那个看守长就因为和犯人赌博被一打二开了。（即打完军棍开除了）。

我被捕后，因“谋杀长官和临阵脱逃罪”，被军法处拟判处死刑。但傅作义有规定，凡是三十五军上尉以上军官判处死刑必须由他本人批准才能执行。当时解放军正在围攻绥远、包头，可巧在绥东作战的军长袁庆荣，因作战失利被傅作义撤职后调为十二战区参谋长。判我死刑的三次

电报，均被袁庆荣置之不理，既未呈阅傅作义，也未给军法处答复。因此军法处怀疑我与傅作义有某种关系，后改判十二年，当即经袁庆荣批准（因袁庆荣是我多年的老上司）。此事是以后我听袁庆荣和我说的。

在李本洪父亲由兰州到达陕坝时，曾看望过李本洪。他对我说：“我父亲来了，你肯定会恢复自由的。我出去后一定请我父亲设法把你弄出去，因为你的问题比我的问题好办得多。”果然在李本洪恢复自由不久，经过他父亲托当地驻军暂十师政治部主任陈鸣霄（陈也是东北人）说情，并给军法处牛法官送礼，以“因病保外就医”名义，由陈鸣霄做保人，我也恢复了自由。

在李庶之去归绥设法营救李本洪这段时间内，我们两人经常讨论出狱后怎么办的问題。最后决定，我们出去后先在包头、归绥，联络可靠的、有进步要求的、对现实不满的失意军官，和我的老同学、同事等，然后，再看情况进行具体的革命工作。但是，李本洪估计他父亲一定要带他回兰州，绝不会再叫他做革命工作。所以，我们又商量好对他父亲说我们俩个要做生意，假称在陕坝收购葫麻油，运到绥包销售，可获巨利，以此达到不和他父亲回兰州的目的。

李本洪他父亲住在陕坝“塞上新舍”，这是

傅作义为了招待外宾和高级官员专门修盖的一个招待所。我和李本洪恢复自由后，就和他父亲住在一室。他父亲叫我帮助他说服李本洪和他一块回兰州经商。我说我和李本洪在狱中就研究过，出狱后准备在陕坝收购葫麻油，运到绥、包去卖可获巨利。他父亲说交通不便，既不通汽车，又不通火车，靠牛车运成本就大了。我说：我们计划从水路用船运至包头，运费不大。李本洪也和他父亲如此谈，最后他父亲同意了。在塞上新舍住了十几天后，他父亲就回兰州去了。临走时还给李本洪留下三百五十块银元，以做买卖葫油的资本。

李庶之走后，我和李本洪即相随到包头。因包头驻军多系游杂部队，我认识的人不多，当时三十五军住在归绥，我们旋即又到归绥。到归绥后找我的一个老同学，他和我关系很好，叫张典成，任第十二战区战车大队少校大队附。我将李本洪介绍给他，为了安全起见，我就叫李本洪住在张典成的办公室内（张现在呼市人大工作），我也住在张典成那里。在呼市共住了一个多月，我联络了七个失意军官，都是被撤职无工作的；他们大多数是我在军官学校的同学，都和李本洪见过面，谈过话；但因这些军官无工作，无法生活，特别是结过婚的，生活更困难，就靠同学、

朋友等帮助渡日，李本洪也经常从经济上帮助他们。

有一天李本洪和我说，他准备叫我和他去趟解放区，一是请示工作，二是要点经费。问我愿不愿去。我说没问题，一定跟你去。他又说在路上国民党统治区的安全和其他由你负责，到解放区的一切由我负责。我说可以。

一九四六年六月初，到解放区的准备工作大致就绪。我和李本洪都穿国民党军服，李本洪佩戴少校军衔，我佩戴上尉军衔，并由张典成给我们开得第十二战区长官部战车大队的通行证明，一路无阻，顺利地到达旗下营国民党军的前沿阵地。旗下营东边就是解放区了。当时长官部命令前沿部队，没有特别许可证，任何人不准东去。当时傅作义部队的十七师正在旗下营驻防，我的一个同学杨炳文在该师师部工兵连当连长（此人现在呼市建筑公司工作，已退休）。我找到他，告知我要去解放区参加革命，请他设法帮助通过前沿阵地。他当时不愿叫我去，怕到解放区有危险。我说：绝对没有危险，就是真有危险，我也得去，因为我在监狱中是共产党把我救出来的。他见我一定要去，他说要通过前沿阵地必须等到夜间，我想法把你们送过去。在杨炳文处吃过晚饭，到夜间十一时左右，杨见我穿的单军服怕夜间

冷，给了我们二人一人一个日本军呢大衣，还给了我一百元钱，由他带领我们通过他们连的阵地。离开旗下营，大约走了不到一里地，即遇到解放军的哨兵，见到我们后，大声吼叫站住，先叫去一个人，李本洪就过去了。约有十几分钟的时间，又叫我也过去。我过去后，派由二个战士持枪押送我们去连部。到连部后叫李本洪进连长屋内谈话，约有半小时才将我们二人送到一个店内住下，夜间还有解放军二人站岗。第二天天刚亮，就用一辆胶皮大车送我们到集宁，路上仍有解放军护送。到集宁后，把我们送到贺龙的三五八旅旅部政治部。李本洪和政治部负责人谈话，我在另一屋内等候。约一个多小时后，李本洪才来和我说准备去丰镇。走时三五八旅派了一名军官送我们到集宁车站，并给我们二人买了车票，直到火车开动，那位军官才和我们举手告别。

我们到丰镇后，即到晋绥野战军政治部，住在政治部的招待所内，这时李本洪忙于写材料。现在想来他当时因为失掉组织关系，不可能当时就能得到组织的信任。在丰镇住约月余，有一天，突然政治部锄奸科长找我谈话，认为我有特务嫌疑，需要剥夺我的自由，进行审查，从此我与李本洪失掉联系。后来听苏开久说（此人是中共党员在抗日期间给傅作义当过参谋处长、军官

学校教育长、高级参谋等职，解放后在中央公安部工作），李本洪由丰镇又到上海，作地下工作去了，以后再无联系，估计李本洪现在不在上海工作，就在其原籍东北工作。

临河戒烟所始末

王廷英

统治阶级愚弄人民种植鸦片掠夺巨额财富

民国初年军阀割据，战争频繁，各霸一方。绥远地区广种鸦片，城镇普遍开设烟馆。“清水净烟”的招牌触目皆是，两旁贴着鲜艳的红对联：“去病增寿饭后一袋烟，守灯静养胜做活神仙”。烟土烟具，充塞市场，公开交易，乌烟瘴气。到处能看到面黄肌瘦，皮薄如纸，肚膨如鼓，头浮如斗的人。在茶楼酒肆常看到有人向顾客索钱，或沿街讨饭，或街头背巷卖儿鬻女。在靠近城墙的暗角处、破庙里或道路旁的渠沟里，常能遇到饿殍僵尸。

一九二六年直奉晋三方军阀，（指吴佩孚、张作霖、阎锡山）联合围攻冯玉祥部时，阎锡山乘国民军急急西退之际，把封建割据势力，由山西扩充到绥远，把军队也改编为晋绥军，但给绥远人民却带来了极大的灾难。

一九三二年，阎锡山假借裁减老弱官兵，屯垦绥西为幌子，而实质是利用屯垦之名行种植鸦片之实，每年征缴六十万两烟土。又在归绥开设敬业祥烟土店，用压价手段广收察绥陕北的烟土。

阎把大批烟土运回山西，制成饼子形状，美其名曰：“戒烟药饼”，实为变相专卖，垄断市场，牟取暴利。这一勾当不仅人民反对，连阎的部下也不赞成，特别是有正义感的傅作义，内心更为愤恨。

日寇进犯绥远，变本加厉推行毒化政策。

一九三七年日寇大举侵略我国，绥东地区大部沦陷，日伪疯狂推行毒化政策。在城镇里，各种毒品（指鸦片烟，料面、金丹、吗啡针）挂牌公开交易，烟馆林立，雇用青年妇女招待，诱人抽吸。他们陪顾客围灯横卧，烧烟待茶，或暗地卖淫，骗取钱财，有伤风化，致使社会道德败坏。吸料面时，将料面撒在一块锡纸上，下面用火柴烧燎，张口把烟吸入，美其名曰，“坐飞机”，或将料面装在卷烟里，点火吸食，名曰：

“速战速决”。打吗啡是用针管注入人体内，顿觉一身轻松舒坦。但刺激性强，成瘾亦速，危害性更大。日伪在农村里威迫利诱群众，弃农种植鸦片，种时由基层各乡核定任务，收割时按册强行征收。绥远省民众抗日自卫军是多种土匪，他们也不甘人后，成群结队，身配双枪（另一支是烟枪）时常光临，名为保护人民，实是混水摸鱼，明要暗偷，饱其私囊。弄得人民烟净粮光，无法生活。如太乐乡乔江一家三口，夫妻二人吸毒成

癮，甚至连一个不满三周岁的男孩，也从胎里带来烟癮，要大人按时给他喷烟。他家境非常贫困，吃的糜子糊糊加苦菜，穿的是山羊皮袄，冬天毛朝里，夏天毛朝外，但大烟却离不开，卖得一千二净人起炕光。好多有烟癮的青壮年背井离乡，四出谋生，涉世不深的人，竟沦落为匪盗或参加敌伪军；吸毒上瘾的妇女，犯癮时四肢酸痛，急燥难忍，辗转反侧，通宵达旦，为了吸毒有的甚至出卖自己的肉体与灵魂；有吸毒嗜好的老弱病残，只好携儿带女行乞为生。而大批土地荒芜，十室九空，令人惨不忍睹。

傅作义坐镇绥西，励精图治，禁种鸦片，号召烟民戒癮。

一九三九年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从晋西北转战绥西，五原光复后，进驻陕坝。绥远省政府也由榆林迁来。此时傅作义彻底地摆脱了阎锡山的羁绊与掣肘，集党政军权于一身。

傅为了安定绥西，重整旗鼓，收复绥东的失地，遂于一九四二年改行新县制。定陕坝市为绥远省临时省会，设五、临、安、米、狼、宴六县。在已恢复正常秩序的基础上，采取火速清理户籍，整编保甲，清丈土地、兴修水利，广筑公路，规划城镇市区，营建房舍，开办学校等一系列措施，并严禁种植、贩运、吸食鸦片，特于一

九四三年，在临河成立了戒烟所。本着重点试办，总结经验，逐步推广的原则，使已吸烟成瘾的人，逐步戒除，成为新人。

临河戒烟所置于县政府院内北侧，（今之临河市法院），面积约五百余平米。房舍及办公室约二百平方米左右。其组织编制人员有主任王子耀，事务员季山，总务李明源，看守、工役三人。办理戒烟事宜。所的周围，高筑围墙。虽无武装岗哨，但气氛森严，令人生畏。每期戒烟时间，预定一个月，人数二十至三十人。县政府依据各乡上报烟民登记表，按比例指定，由各乡按时送所戒瘾。

戒烟所是穷苦人的牢狱，官僚地主逍遥法外。

烟民进所后，男女分居，行李自备，伙食由所供应。经办人员从中贪污自肥，烟民常常吃不饱饭。房屋破旧，酷暑时期，墙缝臭虫涌出，室内跳蚤横行，空气窒息，臭气难闻；严寒季节，烟民被子单薄，破旧棉衣，难以御寒。土炕终年如冰。烟民的精神肉体，都受到折磨，近似囚徒生活。由于戒烟的人，来自各个乡镇，成份复杂，九流三教，不伦不类，无奇不有。在管理上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天吉太桥的巫婆何风莲，在所里一骂二哭三上吊四下跪，疯疯颠颠，连所内

的管理人员，都忍气吞声，退让她三分。她高兴时眼睛笑成一条缝，浑身象洋气球里打了氧气，飘飘然象大仙临凡，使人啼笑皆非。但大多数都是面黄肌瘦，骨瘦如柴，衣不遮体的善良穷苦人。他们大都少言寡语或唉声叹气，有时偶而问话，鼻子一酸，眼泪刷地就流下来了。但凶狠的看守员，毫无一点恻隐之心，经常对他们拳打脚踢。有个河南商邱人李朝臣，原为孙殿英部营长，因攻打宁夏失败后，流落陕坝开烟馆。一九四三年特务威迫老李到临河戒烟所戒烟，因老李年事已高，身体虚弱，不能在所戒瘾，准予缓期。李回家后，卧床不起，不久便送掉一条老命。

上面所说的这些穷苦人中的烟鬼，大多数是既来此戒瘾，愿意重做新人，因而对所内的规定，都能严格遵守，并进行轻微劳动，锻炼身体，争取早回家乡。其中也确有少数人，无理取闹或无病呻吟，但经过反复的训导、体罚，（罚跪二至三小时）甚至用皮鞭抽打或延期整训，采取强行手段，务使其戒烟方令出所。

但对官僚地主豪绅巨商之流的人物，从未做过烟民登记，或强制他们戒烟，他们自然是逍遥法外，仍过着世外桃源生活。追其原因是：他们依仗“神通广大的权力，小鬼推磨阎王垂涎的钱”这两个法宝，说来也真灵验，县乡长一级的

官儿，对他们从来也是百依百顺，唯命是从，让这些人物戒瘾，岂不是太岁头上动土？一样的烟瘾，两种对待，人们敢怒而不敢言。

据说大官僚潘秀仁过瘾时，很讲排场。头部偏倚在檀香枕上，嘴里含着红玛瑙嘴的烟枪，用金钎子挑着黑黄色的烟泡，得意地瘪鼓嘴吸着烟雾，满屋子黄澄澄的烟雾，散发着苦涩的香味。盘龙灯冒出昏红的火苗，映在他腊黄的脸上，微弱的光线，若明若暗，俨然入了仙境。据了解，恶霸地主李三毛旦（居沙海乡新红村）某年做寿时，他的狐朋狗党，孝敬他一付豪华的烟具：紫檀木大烟盘，银丝编织的盘龙灯，琥珀嘴的烟枪，老鸱眼大烟杆，宜兴的陶瓷烟斗……。在绥西来说都是独一无二的。其他豪绅巨贾抽烟的家具，也极其美观雅致。出名的烟具有太谷景泰蓝的烟灯，景德镇的陶瓷大烟盘，潞安府的烟杆子。更有用竹木玉石制造的各种烟枪，上面用金银铜质镶焊，镂刻精美，再配上宜兴的烟斗，也别具一格。

戒烟的成绩与失败的原因

临河戒烟所，自一九四三年成立，截止抗战胜利前夕，共进行了十期戒烟训练，总计人数四百五十八人。其中大多数都彻底戒掉烟瘾，恢复健康，成为新人。如太乐乡（现杭后红旗乡）

乔红一家人戒烟后，积极从事农业生产，兼营配种牲畜，其儿子宝元至今健在。陕坝韩子彬戒烟后，又返回机关工作。太平乡王业女戒烟后，身体变好。她古铜色的四方脸上又出现了红光，满面春风，回家后参加劳动，博得全家人的喜爱。永昌乡（现临河市团结乡）王长有的母亲，在所内表态说：“冷茶冷饭易吃，冷言冷语难听”。她戒烟回家，主动帮助儿媳操持家务，带领孙男孙女玩耍，再也听不到三长四短的风凉话了。

在国民党统治的西北地区，如宁、甘、青、新等省，长期广种鸦片，且以绥远为销售地，因而对绥西禁烟戒瘾来说，是十分不利的，加以敌伪勾结官僚、地主、王公、奸商，暗中捣鬼，进行倒卖，从中渔利，大发国难财，不能断绝鸦片的来源，致使临河戒烟所的工作，趋于失败。

本文根据李明源、季山两同志的回忆，又征求了知情者撰写而成，在此一并致谢。但事隔多年恐有错误之处，仍希知情者补充指正。

禁烟禁赌亲历记

吴辉生

我于一九三九年随部队进驻河套，直到一九四九年，此期间曾亲历傅作义下禁烟禁赌令前后一段历史，现将一些琐事陋闻回顾如下，以见旧日社会官场之一斑。

傅作义初进河套，急欲整军经武，励精图治以备再战。而当时之河套，烟赌风靡一时，不论仕农工商，不分男女老少，非烟即赌，吸毒者尤甚。

嗜毒成瘾者，骨瘦如柴，面目铁青，其状如鬼。为毒瘾所迫丧失廉耻，为盗者有之，为娼者有之，沦为乞丐者有之，更有甚者，卖儿鬻女，典妻当地，造成家破人亡。真是人无谋生之力，民无可可用之丁。而嗜赌者为求一逞，如是为官者不惜贪脏枉法；平民百姓则堕落偷摸，造成民风日下。傅长官对此劣风，深恶痛绝、遂下禁烟禁赌令，决意杜绝。岂知一项善政，在旧日官场之中几经转折，颁行无效，竟成一纸空文，甚而弊端百出，丑闻不断，贻为笑柄。

禁令初下，街上倒是取掉了“清水净烟”的招牌，而烟馆却由明转暗。吸毒方法也从用考究的烟具，改为简易的铁条烫吸。因而吸烟的人更多了，而县、区、乡的禁烟员们却乘机在禁令的掩护下，大量贩运、销售，吸食鸦片，毒源不断。他们趁此大发其财，而他们违法违禁竟无人过问。

真正被禁止和被处治者，并非官僚和富贾，都是贫民百姓。

一九四三年时傅作义部队新三十二师驻扎五原县南牛渠，司令部有个炊事员，有烟瘾爱烫大烟。可他是一个穷兵没钱，不能经常吸食。有一次他用攒下的糊锅疤，换了两小片大烟，碰巧赶上查烟，不幸被查出来。没几天就被枪决了。

我当时在这个师任上尉译电组长。一九四四年师长袁庆荣调任骑四军军长，从新三十二师带去的军需、军医、副官等都随之晋升一级。我却因为编制所限，不能晋级。因此情绪低落，当时又赶上部队整训，译电事务不多，有两三个组员，足以应付得了。所以我以消遣解闷为由，竟自暴自弃，恣意吸毒嫖赌，结果不到半月就染上了烟瘾，终日发瘾难以自拔。恰在此时被袁军长查知，于是把我送特务连禁闭。

起初，我非常害怕，因为禁烟令是傅作义下达的，所以会有杀头的危险。可是过了七天也

没提审我，也没人过问我，我便以试探口吻，给军长写了个“因病请求住院治疗”的笺呈。结果第二天传令兵送来通知，“准予住院治疗。”于当天我就住进了医院，这时我的恐惧才缓和下来。看样子，不会因此被杀了。本来我就没有病，住院是为了躲避处置，所以住了六天就回了军部。见了军长报告病好了。军长说：“好了回来吧！”又说“你也不要回译电室了，秘书处有个少校秘书缺，你去秘书处吧”。于是我就因祸得福成了少校军官。

当时赌博盛行，种类极多，诸如打麻将、掏宝、推牌九，掷骰子，别棍，碰胡等等。军队流行推牌九，因其简单，输赢快，都叫它“一翻两瞪眼”。

禁烟禁赌令一发，宪兵警察有了生财之道。他们抓赌有三种办法：对上司人物、视而不见，见而不抓，惹不起，怕吃亏；对有钱人是抓而不放，以罚款私分了事，大饱私囊；对穷苦人，是先搜赌资以中饱，而后带回献功。

记得一九四五年冬，我在归绥南街赵光祥家打麻将，有赵参谋、马副官、刘秘书。因房屋临街，又是夜间，响声很大，两个巡逻警察，闻声敲门，进门后瞪眼举枪大喊，“别动”！当时我们也掏出了手枪，质问：“你们要干什么？！”

两个警察一看阵势不对，马上放下枪，点头哈腰的说：“长官们对不起，惊动你们了。”等他们坐下抽烟喝茶时才说了实话：“我们只当是老百姓要钱，想闹几个外快零花。不想把长官们惊动了，真对不起。”他们说：“你们可以把我们押回报功啊？他们说：“不敢、不敢。上个月倒抓了两个当兵的，带回去，派出所长把我们骂了个狗血喷头，还说我们给他惹事找麻烦。事后所长给人家说了很多好话，才把人家打发走。你们想，我们抓他们放，没功还挨骂，谁还干这傻事。”不言而喻，抓赌实为抓钱，那管什么禁烟禁赌令呢。

磴口地区的汉族嫁娶婚俗

朱永丰

按语：本期选载的关于旧社会“嫁娶”、“丧葬”两篇史料带有封建迷信的色彩，做法繁琐、铺张浪费，实属陈规陋俗。然而只有了解了过去，才能改革今日，发表这两篇史实，无疑将对移风易俗、树立新风有所裨益。

亘古及今，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乃世俗常理，人之常情。我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各民族就有五十六种之多。因其居住条件、地理环境、宗教信仰各异，因此其风俗习惯也各有所不同。

磴口地区居住着十一种民族，人口九万四千七百二十一人。汉族占百分之九十一·八七，多数来源于山西、陕西等省。其风俗习惯与河套地区基本相同。

远之不说，就民国时期记述，其婚俗亦是光怪陆离，无奇不有。

一、几种婚姻形式：

旧中国，在婚姻问题上没有法律，此地存在着多种婚姻。

1、指腹为婚：

所谓指腹为婚，是指双方妻室怀孕后议定：如一家生男，一家生女，长大后结成夫妻而言。有的两家往来密切愿意世辈交好，一旦“指腹为婚”后，果然一家生男，一家生女时，长大必须遵照父母之命结亲，为父母者了却了心愿，但从不顾及青年人的痛苦或反对。

2、续婚：

此种婚姻，多数是半路失妻之后，丢下一男半女，双方老人，唯恐子女受罪，岳家将其女续嫁，使内妹（小姨子）成为妻室。这里流行一句小曲：“大花鞋，摆窗台，姐姐走了妹子来”，就是反映这种婚姻形式。在这里也有兄弟娶嫂嫂，哥哥娶弟妻的事实。常言道：“老嫂顶母”。又云：小叔子（弟）躲在怀，大伯子（哥）躲在崖”。就是说，弟弟是不能娶嫂嫂。但由于子女关系，或因家中贫困，不用再花钱等原因，造成了这种婚姻。此地人称之为“续婚”。

由于不懂科学道理，近亲结婚者很多，如两姨结婚，姑舅结婚等等。结果给下一代带来了

白痴等后遗症者很多。

3、童养媳：

这种婚姻，从小由双方父母决定，女方几岁或十几岁就到了婆家，给婆家打猪喂狗，烧火剥葱，从小就成了婆家的长工，受尽蹂躏。一般到十四、五岁上就结了婚。由于从小在一块长大，也不知道爱情与感情。童养媳，从小就受着压迫，也不知道什么叫反抗，只知道“嫁鸡随鸡飞，嫁狗随狗走”，是命里注定。这种童养媳的早婚形式，一般谓之童养媳婚姻。

4、抢寡妇：

在旧社会有这样说法：“先嫁由父母，后嫁由本身”。但这种说法是名不符其实的，死了男人的妇女，谓之寡妇。婆家看见寡妇要改嫁时，就不通过女方知道，把她卖掉，女方若不同意时，出钱者便把寡妇抢回去，成为他的老婆，此地谓之抢寡妇。

此地有“抢亲有罪”的说法——指抢闺女有罪而言，抢寡妇，好象成为天经地义的事并不犯法。只要抢回去就行。社会舆论也就形成了寡妇理当应抢无人谴责的不合理的犯法习俗。

5、一夫多妻制：

旧社会没有婚姻法，男女平等根本谈不到，一夫多妻者有之。唯官僚、地主、买办资产阶级

老爷们，一个家庭有多妻组成，生男育女，各有所护。造成家庭四分五裂，纠纷百出。斗争之际，必有胜败，败者厌世，多数寻于自尽，了却一生。而玩弄女性的男性们，却若无其事云：“妻为墙上泥，剥了一层又一层”。其结果：以钱通神路，金钱结案，草菅人命。有钱有势者，再娶一妻或一妾，谓之续妻或续妾。

他们把妇女当成一种玩物，以度花天酒地的生活。

6、一夫一妻制：

在国民党时期，虽然没有婚姻法，但一夫一妻较为普遍。特别在有天主堂的教区内，教会规定，不允许纳妾，只许一夫一妻，还得经过神甫婚配，①才承认其为夫妻。

二、结婚的过程：

在旧社会，由于买卖婚姻的存在，造成了许多家庭悲剧。还说什么“掏到的银子买到的马，任我骑来任我打。”把妇女当成商品出卖，比之以畜。又云：“打到的老婆揉到的面”，不把妇女当人看待。真是黑格洞洞枯井万丈深，妇女压在最底层！

国民党时期，城市的婚姻，已经有了恋爱过程。但磴口地区，在旧社会由于文化落后，封建

思想严重，男女青年根本不知什么是恋爱，什么是婚姻自由，女子大了，也不敢见男人。青年男女互相谈话，认为是“不要脸”。这个地区的儿童念书，从小就是男女分校。男女授受不亲的思想，在小学教育里就扎根于幼小的心灵。儿女大了，婚姻的媒介，全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青年男女不见面，全凭媒人传话，所以有这样的说法：“跑惯的腿，媒人的嘴”。男女双方的好坏，全出于媒婆之口。她的嘴，可以把“麻脸”说成“光眉俊眼”，可以把“独眼”说成“双目炯炯”。使结婚者成了“袋里买猫，里外不知”。

找对象时，首先看男女双方大相合不合。就是说，有无相克之意，能否白头到老。有一整套的讲究和说法，看是否犯月：即正蛇、二鼠、三牛头，四虎、五兔、六狗狗，七猪、八马、九羊头，十月的猴泪长流，十一月金鸡架上愁，十二月老龙海底游。男女双方凡在这个月份所生，即谓“犯月”，是找对象的一大禁忌。

属象相克：看男女双方的属象是否相克，有云：从来白马躲青牛。老鼠必然啃羊头。龙兔相斗无休止。金鸡见猴泪长流。老虎常怕蛇钻口。猪狗相争一旦休。

凡上述属象如要相克，则不能成亲，成亲后

必克，即克寿——年轻夭折。克财——不能富贵。克子——少儿缺女。

最好的相配属象为：蛇盘兔必定富。（男属蛇，女属兔，谓之：男蛇盘女兔，越盘家越富，此为夫妻最好的属象。）老龙金鸡两相凑。猴骑虎背往高攀。猪肥马壮常年富。

财礼：这个地区以买卖婚姻为主，一切情况，由媒人给双方传递，双方主家不对面，双方同意后，首先是要财礼。财礼由双方议定，一般低者40元，高者120元（指银币）。衣服讲究要四身、六身、八身（每身为两件）。女方陪送大红柜一个，梳洗用具，油脂面粉等物。

定亲：财礼议定后，即是定亲（也称喝酒）。定亲中参加者有男方长辈负责人及媒人，女婿不去。女方请一些长辈和亲戚参加，这些亲戚七嘴八舌的开始要衣服等物，媒人从中调停，双方议定交付品名数额，实际上在定亲以前媒人已将各项事务办妥。但在亲戚面前也要走这个形式。亲戚们也明知道一切事物早已说妥，也要在定亲这天乱要一顿，以示对出嫁者负责。主家还假仁假义地把亲戚所要之物，全都记好，以表示对亲戚们的感激。

男方交纳财礼钱，交部分衣服，并带有肥绵羯羊一只，馒头四盘、六盘、八盘均可（每盘为

八个)，两瓶酒，酒瓶上贴有双喜（囍）二字，（表示吉庆）用红头绳将两瓶酒拴住，（表示千里姻缘一线牵）。所带衣服等物，全用红布包裹，红头绳捆扎，表示吉利富贵。男方回时，女方给男方回少量的钱、酒、馒头等物，谓之“有来有往”。表示亲戚常来常往。

蒸馒头亦有讲究，如馒头上有裂缝，叫“开花馒头”谓之吉庆，表示欢笑，主家便高兴。馒头上必点朱红，谓之“红喜”。

探话：亲定以后，即是协商结婚日期，谓之探话。探话时，男方带有探话羊、探话酒、探话馒头。数量与定亲时一样。吉日的选定，一般以双日为好，表示“成双配对，吉庆有余”。但不择带有“四”、“六”两个数字的日期。因为有“四、六不成财”之说，谓之不利。日子择定后，就是娶亲。在娶亲前，一切事情均已办妥，再无纠缠和隔阂。

娶亲：娶亲时，男方带有娶亲羊、娶亲酒，一套装新棉衣服，另外还有从里到外，从头到脚的穿穿戴戴。即便在夏季结婚，也得带上棉衣，表示厚成。

娶亲车走时，讲究“离娘馍馍离娘糕”，由男方给女方带两个糕鱼和十二个馍馍，谓之催装。女方再给男方回四个馍馍。两个供新郎、

新娘食用，表示“和气到老”。两个给赶车的享受，表示谢意。

娶亲分两种：一谓等亲，一谓迎亲。等亲：就是女婿不上岳父门，在家等候。等亲讲究娶三送四，这个数字不能变，（甘、宁等省人，另有规矩）送亲的辈数，要看娶亲的辈数而定，要相辅相成。

娶、送亲讲究：“姑不娶，姨不送，妗子送在黑风洞，老娘送在米面瓮，姐姐送了妹子的命，姐姐娶的神俏棍，姐夫送小姨子驴圈寻。”这就是此地送亲的习俗。

娶亲皆用轿车，（即将原来的马车或牛车，上面用毡毯等物搭有椭圆形的凉棚即可）。车套双马，不使毛驴。就是穷人家，也得有这个礼俗。

娶亲时，娶的在前，送的在后。如生活富裕者，可定鼓匠吹打，在沿路所过村舍也要吹打，一直到女家。

迎亲：迎亲就是女婿上门，不限制娶三送四。必须是对子马，四对、六对、八对均可，送的人数要着男方，必须成对。男方“披红”女方“挂绿”。表示青梅竹马，男红女绿（乐）。并增加一个陪伴者，谓之“伴女婿”。伴女婿的角色，一般都要姐夫来充当。还有一套固定的语言，在

新人上轿时，必先放连二大炮。炮一响，伴女婿和女婿站在一起，伴女婿开始念道：“炮响一声天门开，五位天神送喜来，前头安的摇钱树，后头安的聚宝盆。聚宝盆，是一家，荣华富贵两亲家。门也当，户也对，一对青年龙凤配。喜见红梅多结子，儿孙满堂出孝子。男的就如左金童，女的就象玉皇女，金童玉女多相称，白头到老不相欺。亲家常来又常往，两家富贵数第一……。”请金花（小舅子拿金花，给姐夫插在头上），并随口说几句云：“扁担（意为板蛋，指姐夫头，玩笑之意）上开花，瓮沿上结瓜，我给姐夫狗头上插两朵金花”。挂绿绦，请出内弟披彩红，（此时女方一人给女婿披挂一绿色绸帐），“三块大洋出了怀，（这个数字无规定，由伴女婿给插金花钱，出几块，念为几块大洋）五凤银钱头一名……再请他娘舅姐家、舅舅妗妗、姑姑姨姨、姑舅两姨……远的亲，近的邻，叔伯两旁站的人，房上的、地下的、铡草的、喂马的，大、二厨房烧火的。高家的亲戚都请上”（娶谁家女说谁家姓）接着炮响开车，娶亲上路。

迎亲必须有鼓匠吹打坐席，等亲要看经济条件而决定。

“坐席”：分四盘、六盘、八盘、。四盘即烧猪肉、清蒸羊、酥鸡、肉丸子，六盘、八盘另

加菜。坐席时每桌六人，也是按资排辈，先安正、副二席。如有不妥之处，则有翻桌倒菜之危。这就是所谓“酒席宴前争高低”，必须小心从事，以免发生纠纷。另一种是用大烩菜，从简待人。

这里的风俗，一般是待人三天，每天三顿饭。来者出礼钱，礼钱多少不等，以礼还礼。

不论“迎亲”还是“等亲”，娶回的新娘子，脚不落地，皆由女方长辈抱着新娘子送进新房。

送女方者，必须有新娘子的一个弟弟，谓之“压轿人”亦称“压柜子的人”。压轿人由男方给予“压轿钱”，不给不下车，数量不限。

不论“迎亲”、“等亲”，不论男方、女方，在开饭前，必须给厨房送礼，谓之“探厨”。实质上是礼遇以待，请快上饭菜，也是厨师的一个“吃口”。这种探厨形式，娶亲、送亲，互为有之。如有一方不探，饭菜即不上桌。探厨礼物，多少不限，所赐之物，皆归厨师所获。

娶送戚吃过早饭后，由男方出面，请女方送戚给新娘子“开脸”。即把面部的汗毛用线掠之一光，表示已不是黄毛丫头了，现在已正式成为媳妇。

拜人：开脸后即进行“拜人”拜人这种形

式，由新郎、新娘同拜，还有两个陪拜之人，多数为嫂嫂、姐夫。他们的任务：是新郎、新娘遇有不顺心及不悦之事，陪拜人予以劝之。拜人时，是按资排辈，先娘舅后姨姑等以辈数类推之。拜必须叫音称呼。一人唱念，一人收礼。如：给他大舅磕头啦！收礼人即喊：“他大舅请知啦！大洋五元”。新郎新娘即磕头。凡受头者，均得出赐金钱，数量不限。以此类推，一直将亲朋拜完。如若漏拜，或者应先拜者而后拜，则错了伦次，便会出现一场纠纷。所以拜人前，长辈们必须在一块严肃议定，拉出名单，以防有误，避免纠纷。

抓富贵：拜完人后，新郎新娘“抓富贵”。就是由一人端一个盘子，内放金钱若干，端盘人随手摇来摇去，或高或低，或左或右，或前或后，以抓完盘内的金钱为止。所抓之钱，谁抓归谁有。这一着，是考验新郎新娘是否精机伶俐，心灵手巧，否则即被认为笨拙迟钝。

抓富贵完后，长辈全散，只有同辈开始娱乐，新郎新娘“抢新房”。

抢新房：是要新郎、新娘同时抢入新房。谁先抢进去，表示谁有智慧，聪明精干。同辈人挡住新房的门不让进去。此时也可有贿赂，买通同伙，帮助新郎新娘抢入新房，出现了拉弓的、射

箭的，红脸黑脸都唱的人。最后新郎新娘闯不进新房，就只好听从别人摆布，或唱歌，或给以烟酒糖果。直到大家满意，不挡而入，取笑而散。

晚间，由男方长辈给新人一个猪肘，二人同时吃完，表示和睦团结，白头到老。

洞房花烛：这里叫“入洞房”。在入洞房前，由同辈人搞个馒头，一碟烩菜，叫新郎新娘吃“和气饭”。顾名思义，就是吃了此饭，一辈子和气，为的是取个吉利。吃饭时给新郎新娘弄两双带刺的弯曲筷子，还是长短不齐，粗细不匀，难以捉拿。扬言此筷来之不易，派人专程到南京、上海购来。吃饭时要求新郎新娘同时举菜，同时入口。如吃不着，惹得众人哈哈大笑，如吃得利落，众口称服，认为聪明贤慧。

闹洞房：这是对新人最后取笑的机会。同辈人在新房内大肆耍笑。让新郎新娘在一起，紧靠不离，取笑者，便开始了他们事先准备好的节目。如两人同时吃一块圆形的糖，叫“龙凤戏珠”。两人同时抽一根烟，叫“文明抽烟”。新郎新娘唱个歌子，这是最文明的举动。还有什么“裱仰尘”、“摸跳蚤”等等低级趣味的戏闹，多数是“说令子”，试验新娘是否声音清脆，口齿伶俐。实际上是些绕口令。如“一进门，粉壁墙，粉壁墙上画凤凰。（女）：红凤凰，粉凤

凰，红粉凤凰粉凤凰”如此等等，不胜枚举。一般男方说的较容易，女方说的较难，而且要求说快，一口气说完，以便叫新娘滚嘴说错，以取一笑。但也有一些淫秽语言。如果新娘新郎嫌难听不说，只好以糖烟等物说情，免其纠缠，直到大家满意，夜深后，才让新郎新娘休息。

洞房：洞房内，只留一毡、一被、一个枕头。其原因是为让其同被而卧，以求得和睦。第三天，才把其余被褥、枕头送入洞房。洞房之夜，一夜灯火通明，不准熄灭，谓之“长命灯”。

长命灯：顾名思义，就是白头到老，长命百岁。如果黑夜不点灯，或因人睡着不知道而灯熄灭了，皆为不祥之兆，与主不利。不过在洞房之夜，新郎新娘是不好入睡的，因为一夜之间，不断有人在“听房”。

听房：这种习俗，男方长辈，恐儿媳不和，便去偷听，看有无不和的迹象，实际上是调查情况，对症下药。同时有的同辈也去听房，以便掌握情况，次日玩耍揭短。所以，一夜之间，人来人往，是难以睡眠的。新郎为了防止偷袭，洞房之夜，严加防备，门窗加固，亮不可出。就这样，也有偷入洞房，盗走新人衣物的事情发生，次日便以物换物，进行交易，逼使新郎新娘拿出

烟酒糖果等物，换回被盗物品，揭示内幕，传为笑料，取之以乐。

第二天，男女双方，由送戚带领，回拜岳父岳母，谓之“回门”。回门前由男方将女婿交与女方送戚。男方表示人已交到。女方表示人已收到。但其中间还有“藏女婿”一节。

藏女婿：藏女婿就是男方把女婿交与女方后再偷回来。此时此刻，因为时间关系，女方急着要走，而女婿却意外地失踪，不能启程，男方哈哈大笑，女方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急着无处寻找。送戚只好向男方说情，并送以酒果赎回女婿，方能顺利而返。

回门：就是新娘和新郎同时到岳父家，岳父家待女婿，新郎向女方亲戚“认大小”。以便今后有来有往。晚间为正式待女婿，第一顿饭是吃饺子，谓之“下马饺子”。

女婿到岳父家，必须安“正席”。媳妇到婆婆家也必须是安“正席”。

下马饺子：此饺由同辈人所包，馅内有盐的，谓之“盐饺”，有辣的，谓之“辣饺”，有花椒的，谓之“花椒饺”等等。种类繁多，吃饺时。再请一些长辈或同辈，陪同女婿，同桌而食，递饺人以猜谜的形式，无次序的递出，以考验女婿的精明强干与否。如女婿吃了盐、辣、花

椒饺等，则认为女婿迟钝。反之，则传颂为机灵女婿。新郎在岳父家只宿一晚，次日一对新人必须双双而归，不能单独行动。意在双往双回，永不分离。新郎新娘由岳父或岳母送回，谓之“小送”。这是新亲家第一次登门。

新娘在婆家住七天，便回娘家，但必须由娘家来请。在娘家住八天，返回婆家，谓之“住七住八”。这个天数不能随意更改。

谢媒：婚事完了，就得“谢媒”。这里的谢媒风俗，一般给一个猪头为谢。但也有给些其他实物的。在这里媒人也称“冰公大人”。

拜年：在过年期间，新人必须拜年。先拜婆家亲戚，婆家拜完后，娘家的人必须来请女婿，女婿才能去拜年。这是新人结婚的第一个年头。讲究不能空过，凡被拜年的亲朋，必给“压岁钱”。数量不限，随意而给，所得之钱，谁挣归谁。一般是给婆家亲戚拜年，钱给新娘的多。到岳父家，只是女婿拜年。

注：①婚配：是天主堂一种圣规，凡教友结婚，都得到教堂由神甫通过教仪，进行婚配。

河套地区解放前汉族丧葬习俗

居正

我国各民族丧葬习俗迥然不同，就是同民族，在不同的地区，丧葬习俗也有差异。河套地区汉族（信奉天主教者除外）丧葬习俗与其它地区有所不同，现将所见所闻略述如下：

备棺木、老衣：一般都是老人年岁高迈时，儿女们即把棺木和老衣备妥当，等待老人临终时使用。此地老年人最喜欢松柏木棺材。因此，谁家的儿女给老人备下松柏木棺材，就要受到邻居们的垂青。此地还有请画匠油画棺材的习惯，一般是棺材两侧画“郭巨埋儿”、“唐氏奶母”等二十四贤孝图中的一节；棺盖和大小堵头男女各有讲究，棺盖男画龙，女画凤；大堵头男画庙，女画屋；小堵头男画蛇盘兔，女画脚踏莲。老衣是用兰色绸子做成上下衣或袍子，用红绸子或红布做里子或做被褥。女子给做寿鞋和寿袜。老人的棺木和老衣备妥之后，做儿女的就了却了一件心愿。因为此地有“父欠子妻，子欠父葬”之说。

送终：当老人生命垂危，奄奄一息之际，儿女们都要守在跟前，远方的儿女事先都要通知回来。此时，儿女们要给老人穿老衣、洗脸、剃头（女的则要梳头）。一旦老人气断逝世，就停放在早已做好的棺材盖上（也有停放在门板上的）。然后烧几张白麻纸，称为“送终纸”，也有叫“归天纸”或“倒头纸”的。还要在死者的口里放入一两个硬币或铜元，有钱的放银元，称作“口含钱”。

搭灵棚：老人死了，停放好后，紧接着就是搭灵棚。灵棚搭在院子里的一角或一侧，用数根椽子搭一个棚架，外盖柳芭，有条件的则盖苫布。把棺材放在里面，然后在灵棚口处或院门外挂一缕用白麻纸扎成一尺多长的穗子，称为“冲天纸”，以示老人已“归天”。“冲天纸”穗子的数目要视死者岁数而定，多少岁就扎多少根穗子。

入殓：在老人死后的第二天或当天，一般由村里的长者帮助把死人装入棺材，称为“入殓”。入殓前要把棺材里面用花色纸糊裱一新。入殓时，先在棺材里铺一些谷草或糜草，把褥子铺在草上面，然后才把死者放入，盖上被单。还要放入死者遗物一两件，才能把棺盖盖上，但不往住钉。入殓后，在棺材旁放一个小罐，称为

“遗饭罐”，至出丧之前，每日每顿吃饭时，都要往小罐里添一些食物，意为让死者每顿饭也吃一些。同时还要放一个瓦盆，称作“叫纸盆”，将每次烧纸的纸灰盛入里面。

上祭子：在已入殓的棺材前放一张桌子，上面摆着一些食物，称为“祭子”。一般是死者的女儿女婿们上祭品，儿子不上。祭品有整猪、整羊、整鸡等，这要以女儿们的生活情况，经济条件而定。有的邻居也上祭菜，祭菜是炒肉、粉条等而已。

戴孝：儿、媳、女、婿皆为重孝，头戴孝帽，帽子男女有别，男为两角方帽，女为圆帽，身穿孝衫；脚穿孝鞋，腰间还缠一根麻辫子长长地拖在地上，此即所谓“披麻戴孝”。除此而外，凡参加葬礼的人都要戴孝，这也有讲究，死者的儿女亲家戴腰孝，即扎一白布腰带；孙子戴的孝帽子上缀一块铜钱大小的红布，外孙戴的孝帽子上面缀铜钱大小的一块蓝布。所谓“花孙子孝外孙”即此也。邻居一般都是戴一个孝帽子。如果是未过门的儿媳，还要在孝衫上披蓝、黑布两块，邻居们一看就知道这是未过门的媳妇。凡戴孝者均不能穿红、绿、花色衣服，讲究孝要戴得干净。待出丧后，棺木入土，儿女们即除去孝帽孝衫等，并将麻辫扔在棺木上，用土掩埋，只

留孝鞋，或在左臂上戴一块上写白色“孝”字的黑布，继续戴孝，此时即称“守孝”，守孝一般为三年。

请人：凡死者的嫡系亲属、生前好友，都要请到，还要请出丧时帮忙抬重（即抬棺材）的十六人。请人时死者的儿子（即孝子），每到一家，首先跪在院子里磕一个头，然后才起身进家，进家时不能把孝帽子戴回家，要放在屋外，否则就要挨骂。请人一般在出丧前停灵的几天内进行。停灵最少三天，最多七天，意在等候未到的儿女、亲戚。即使在炎热的夏季，也是如此，如少于三天，就要受邻居的笑话。

叫夜：在出丧的前一天晚上，孝子贤孙们以及亲戚朋友、邻居一大帮人，于天黑后打着灯笼火把向墓地方向走去，一边走一边有人向路两旁丢火种，回头望去，犹如两条火龙，遇到十字路口时停下，点燃两堆柴火，方才回还。如果附近有庙宇的，则要一直走到庙里才返回。这样做，据说是往出送死者的灵魂，因而也有把叫夜称为送行的。

打墓坑：在出丧的前一天白天，由请到的抬重者十人及孝子一人，在预先选好的墓地挖墓坑。也有用土坯或坷垃圈住盖顶抹泥的墓葬，称为明葬，有钱人是用砖圈的明葬。如果是明葬的，

则要把坷垃土坯或砖在这一天拉到墓地上。临走时带两瓶烧酒，到墓地后，先痛饮一番，才开始行动。在打墓坑或圈明葬时，都是事先由阴阳先生选定好地方，然后用罗盘定墓穴的位置。

刮灵：在出丧前一天晚上，女儿们要不时跪在灵前痛哭一场，直至次日天亮。大多数是请一班鼓匠吹吹打打，通宵不停。鼓匠们吹奏诸如“小寡妇上坟”之类的悲调，用以代替女儿们的哭声。因此，请鼓匠的费用，即鼓匠钱由女儿们付出。另外这天晚上，讲究以死者女婿们偷吃部分祭品为吉利。

出灵：即出丧。这一天早饭后，由一名长者将出丧所需东西安排就绪后，喊一声：“动灵啦！”这时所有的人便齐集于灵棚前，孝子贤孙们则跪下一片。由那位长者给抬重的人每人敬一杯烧酒，每敬一杯，孝子们都要磕一个头。那位长者再说一声：“烧纸啦！”于是，先由儿、媳、女、婿，而后其他亲朋轮流烧纸。烧纸时口中念念有词：如“大大（即爸爸）寻钱来……”。烧完纸后，紧接就是动灵，此时就要把棺盖钉住了。钉棺盖之前一般都要打开棺盖让死者儿女们再瞻仰一下遗容，还要用棉花蘸着白酒擦洗死者面部七窍，名曰“开光”。有的地方还把死者的衣襟扯下一块，事后每人分一小块，缝在自己的

衣服上，意思是不要把福气让老人全带走，儿女们每人分享一点。钉棺盖称为“打银钉”，木匠每用斧钉一下，孝子们都要按死者的辈数称呼喊叫如：大大（即爸爸）或妈妈或爷爷“躲钉！”意在给死者说清，要钉棺材了，老人家要小心躲着。还要由死者女儿给钉棺盖的木匠几块钱，称为“银钉钱”，这是固定的礼路，不给就要有人笑话说：“老人身上还克扣”，即谓之不孝。棺盖钉好后，由几个抬重的把棺材抬出灵棚，放在抬杆上。此时，死者长子把那个盛纸灰的瓦盆举过头顶，用力摔在地下砸烂。而那个“遗饭罐”则要带上，准备埋入墓里。随着几个人即将灵棚拆除。

送葬走在最前面的是死者的长孙（即长子的大儿子），扛一根长长的引魂幡；后面是孝子们扯着拉灵布，每逢过桥或渠沟时，孝子们都要喊：“大（或妈）过桥或过渠啦……”抬重的十六人，分两班轮流替换：无论过桥或过渠不能停下休息。意在恐怕放在地上死人走不了，讲究走得越快越好，不是屈死。这些抬重的人都在上衣扣子上拴一个小红布条，据说是怕被死人冲着，以此避邪。后面尾随乡邻一大群人，有来送葬寄托哀思的老人，也有帮忙的年轻人，更多的是看热闹的孩子。其中一人一边走一边向路旁撒纸

钱，称为“买路钱”，如果死者“犯七”，还要向路边插小白纸旗。走在最后面的是死者的女儿、媳妇和其他女亲戚，她们一路上哭哭啼啼，直到墓地为止。

到墓地后，将棺材大头朝北，小头朝南放入墓坑，在靠近棺材大头旁挖一个小窑，放入那个“遗饭罐”。然后长子又用孝衫前襟盛一些土，绕墓坑四周用手徐徐撒土，接着抬重的人们便七手八脚地将棺材掩埋，堆起一个土堆。

送葬若路过村庄某家门口时，某家就在门前烧一堆火，此有二说，一说是为祭奠死者，一说是以火驱邪。

葬毕，送葬的儿女以及亲朋们回来后要从火堆上跳过去。在院门口摆着一张桌子，上面用几个碗扣着几样东西，如纸币、硬币、肉块、馒头、油糕等等，有的则扣个空碗。送葬回来的人都要上去揭开一个碗，看一看里面扣的是什么东西。意在根据所揭碗里东西的价质，以论其福气大小。

复三：在将老人埋葬后的第三天，儿女们重新上坟，痛哭一场，抛撒一些食物，烧一些纸钱，称为复三。复三这天拂晓（趁太阳未出之前），死者长子要拿几块青砖到墓地，在老人墓堆南边立一个小门，称为“墓门神”。

孝子还要亲持铁锹修墓加土，名曰：“圆坟”。这天，儿女们还将锅、碗、瓢、勺等炊具带到墓地，称为“安灶”。“复三”后，每当逢年过节，都要给老人散泼些食物，烧一些纸钱。意在让老人在阴曹地府下也有饭吃，有钱花。

尽七与百天：复三以后，每七天过一次七，过至七七四十九天为尽七，每一七都要上坟祭奠，直至一百天之为过百天，也要上坟祭奠。

过周年：分为头周年、二周年、三周年，一般头周年和二周年小过，三周年大过。过周年时，死者儿女们聚集在一起上坟给老人烧纸、泼散一些食物，然后回来根据经济条件摆宴请客，吃喝一顿。也有给老人烧纸活的。纸活有四合头院子，院里骡马成群，猪羊满圈，房子里箱笼屉柜、铺盖衣服应有尽有，其次还有童男童女、金斗银斗等等。意在让九泉之下的老人享荣华、受富贵，不受贫穷。纸活匠人们做的这些纸活琳琅满目、栩栩如生，把这些东西抬到坟上付之一炬。即算尽了孝道。

添坟：每年清明节儿女们要上坟给老人墓堆上添一些新土，如果是明葬的则再抹一层泥巴，还要打扫墓地。此举也有称为“扫墓”的。

合葬：待父母双亡后，即将两个老人安葬在

一起，称为“合葬”。如果有私人坟地者，即和祖先按资排辈地葬在一起。至此做儿女的才算是心安理得了。

安北基督教会史略

董玉奇

清王朝末期，朝政废弛，腐败落后，内不能强国富民，外无力抗强御暴，因而导致各帝国主义列强，在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等进行侵略，妄图把我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他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

当时帝国主义列强，为了达到瓜分中国之目的，曾向我国进行过多次侵略战争，如一八四〇年中英鸦片战争，一八五七年英法联军战争，一八八四年中法战争，一八九四年中日战争，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战争等等。由于清王朝腐败无能，历次战争均告失败。清王朝的皇亲国戚，官吏幕僚，只图安逸，享受富贵，从不顾及丧权辱国，鱼肉百姓的悲惨境地，于是先后与帝国主义列强，签定了包括赔款割地，五口通商、租借土地、“洋人”在华享有驻军权、领事裁判权、经营企业权、开设银行等等为内容的不平等条约以及准许“洋人”来华传教、办教育等麻醉毒害我国人民思想精神的文化侵略特权。

一八五六年，英、法、美、俄各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先后签订了三个“天津条

约”，规定俄、英、法、美各国，在我国内地各处，有传播天主教、基督教的特权，从此“洋人”打开我国传教的门户。除帝国主义国家以外，象瑞典、荷兰、比利时、芬兰、挪威等国，也纷纷派遣牧师、教师（女性称教师）来我国内地及边远地区，修建教堂，传播教义，煞费苦心，广收教徒。

凡来我国传基督教的各国牧师、教师，因其信仰相同，企图一致，故表面上互相支持，彼此友好，然实质上由于他们的国籍不同，主张有别，意见分歧，于是形成各种支派，基督教的名称竟达数十种之多。若从其活动地区范围划分，则有“内地会”“协同会”之别。

“内地会”，设“内地总会”与“内地分会”。总会设在各来华传教者的国内；分会设在我国内地各省、市，各地区。总会向分会派遣牧师、教师，在所确定的地区内传教，其对象以汉人为主。

“协同会”由美国和瑞典等国联合举办。

“协同总会”设在美国。他们派遣牧师、教师，来蒙古族地区（包括蒙古人民共和国在内）传教，以库伦（今乌兰巴托）、昭和、扒子补隆（属五原县管辖）、宁夏定远营等地为传教基地，传教对象，以蒙古族为主。

“协同”的含意有二：一是美国与瑞典等国协同传教的意思。因在义和团起义时，曾杀死了些瑞典来蒙古传教的牧师、教师，而在其举义失败以后，瑞典人凭恃美国的势力办理赔偿损失案，不仅双方捞到意料不到的经济利益，而且美国人更扩大了势力范围。可见“协同”行事获利非浅，故继续“协同”起来，派遣牧师、教师来我国传教；二是与“内地会”协同传教的意思，因“协同会”向荒凉落后人烟稀少的蒙古族地区传教，无论在物质生活、语言文字、传播教义、交通工具等方面困难多端，需要得到“内地会”的支持，而“内地会”为了传播其共同信仰的宗教，也乐于大力协助。如在蒙区传教需要用蒙文圣经，则由“内地会”协助印刷出版，署名“内地、协同会印”。所以“内地会”、“协同会”是同一信仰，不同后台，既有合作，又有区分的两种教派。原安北扒子补隆的基督教会，属于“协同会”。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扒子补隆教会借杀死牧师、教师为由，向清朝政府索得四百二十五顷赔款地。民国十二年（1923年）又向达拉特旗王爷骗得永租地四百顷。从此费安河经营农副各业，收入累年增加，传教经费十分充足，因而在蒙古地区的基督教会中享有盛名。现将“洋

人”传教，杀死牧师，赔偿土地、修建教堂、兴办水利、经营各业、争权夺利、教会分裂、外人绝迹，以及安北基督教会的正式成立等等，分别记叙如下：

1、洋人来华 传播教义

约在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间，瑞典国即派基督教牧师，来我国传教。他们从瑞典出发，长途跋涉，来到蒙古地区的库伦，然后分头经过茫茫无际的草原，越过绵绵无垠的沙漠，到各地流动传教。以马××（名不详）牧师为首的三名传教士，是最早来原三公旗北山及大余太一带传教的牧师。由于他们无定居下来，修建教堂，长期传教的打算，于是不久便转移到他处。

与此同时，美国基督教会中的上层人物，也积极掀起到国外传教的热潮。他们鼓动青年人，

“立志到东方未开化的民族地区传道”、“要在这一辈子把整个世界基督化”。教会中许多中坚分子，响应了号召，服从了调遣，离开舒适的生活条件，远涉重洋，来到广阔遥远的蒙古族地区传教。费安河（又名费尔灵顿）便是最早来到扒子补隆定居，修建教堂，传播基督教的牧师。

费安河系美籍瑞典国人，他出生于一八六五年元月，十六岁时信奉基督，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信道的虔诚，成为教会中的骨干。光绪二十三年

(1897年)他接受派遣,告别亲友离开美国,飘洋过海,踏上我国领土。曾先在张家口“内地分会”(又说在协同分会)学习蒙汉语一年,为到蒙古族地区传教作了准备。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费安河来到旷野草滩中的扒子补隆。先住在蒙古包里传教,以后修筑了三间茅庵,一作卧室,一作厨房,中间作为礼拜堂讲经传道地点,另外由于他身穿中式服,头蓄长辫发,能讲蒙古语,会说汉人话,举止言谈,与农牧民群众无甚差异,在极易接近群众进行传教活动的情况下,以完成其上司派遣的使命。

2、杀死牧师 赔偿土地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我国爆发了义和团运动。义军所到之处杀死洋人,焚烧教堂,与费安河同来河套一带传教的牧师沙立、曾脱,教师安得生、卡拉辣等四人被杀死在大余太一带。埋葬于莎尔沁村西及萨拉齐城东两处。费安河侥幸漏网,保住性命,只身逃往恰克图之北的俄国境内,为俄人工作,苦学苦练俄语、蒙语。当他转赴库伦担任英商翻译员时,仍然继续从事其传教活动。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洋人纷纷向清政府提出解决焚毁教堂,杀死传教士问题(名曰

办教案)强迫赔偿损失。费安河风尘仆仆,来往于京绥之间。他在美国人出头支持下,以杀死“协同会”四名牧师为由,强迫清政府赔偿损失。光绪三十年(1904年)清政府竟将原五原县东,达拉特旗的四百二十五顷土地,赔给费安河了事。

费安河捞到如此宽广的土地后重返扒子补隆,除雇工耕种一百多顷土地之外,其余全部划等出租,收以租金。从此,扒子补隆基督教会大发其财,传教经费,生活费用极为充足富有。

3、大兴土木修建教堂

费安河以庞大的资财费用,聘请萨县手艺高强的泥瓦匠,在扒子补隆修建了一座砖木结构,可容二百多人祈祷的美式礼拜堂,还为他修建了宽敞明亮舒适的住宅。从此,传教居住条件大为改观,不用挤在茅庵里传道了。

接着他又在其住宅的东侧,建筑起柜房、库房、厨房以及座西向东的备用房,座南向北的牛圈、油坊、碾磨坊;座东向西的长工住房、马棚、存草处;座北向南可住二三百人的兵房(原住蒙古兵,以后房屋倒塌,惟后墙犹存)。这样四周均有背墙拦挡,形成一个防御匪患保卫财产和人身安全的城堡,村民称为“堡子”。正南正东各开一个大门,两侧开两个便门。陌生人不得随

意入内，零星股匪也不敢为所欲为，就连拥有五百多人马的卢占魁匪部，在其它地方十分猖獗，而经过扒子补隆时，只给了他们些粮草，堡子内竟没有受到搔扰。

另外，在堡子的东西两侧和西北端，开辟了三个树园。西树园植榆树，东树园植柳树，北树园四周植杂树，中间培育各种果树和种植蔬菜。如今笔直挺拔，粗壮古老的通天杨，即为当时的长工牛双靠所植。随着岁月的流逝，各个树园现已不复存在，惟原安北县府院（今新安乡乡政府院），犹残存着教堂的痕迹。当时的教堂，若与今日的礼堂相比，真是相形见绌，微不足道。然与清朝末年，农牧民居住的简陋茅庵相比，可谓豪华壮观，风景优美，堪称优雅所在，故人称此地为“洋堂”或“福音堂”。

4、兴修水利 综合发展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费安河为了提高农作物产量，增加收入，决定在其获得的土地上开渠引水灌溉。于是，请后套有开渠经验的王同春实地勘察设计后，决定：从塔布渠以南六十里的布袋口子，天生壕下凹地西边黄河岸开口，由西向东到二顺才圪疸开渠，在哈惠桥以东即乌梁素海子西河畔入海。渠口上宽为二丈四尺，渠底下宽为二丈，渠深四至五尺。渠长共五十华里。为了保

质保量早日竣工，费安河出重资雇用保德人童二娃、山西人樊桂、托县人耿二喇嘛等三人为领工头，按照王同春的设计，带领工人破土挖渠。

当时开渠，完全靠招雇工人用铁锹、萝头、扁担等工具承担修挖任务。为了不影响工程进度。费安河从五原、包头大量购置了上述工具。至于锅、碗、瓢、杓等炊事用具，准备齐全，应有尽有。工人人数极盛时，达千人以上，为了鼓励多出劳力，工资报酬较高，平日的吃喝较好，每礼拜还犒赏一次馒头、猪肉烩菜，所以工人劲头足，施工进度快，工程质量也不错。

开这道渠，绝大多数农民赞同拥护，个别人也有反抗者。如在合硕公中种地多年的朱庆林，原籍河北人，本人生性耿直，因开渠损毁了他的一点儿土地，便愤起反抗。一天，费安河亲自巡视工地时，与朱庆林相遇，朱向费扑去，大骂费为“羊杂碎！”要用铁锹劈死费安河。费见势不好，急忙躲避，说：“这是个疯子！”由于朱庆林势单力孤，同时开渠乃一件好事，他终于无可奈何地罢了。

光绪三十三年春(1907年)，全渠基本竣工，人称“洋人渠”。为了浇灌有序，实行由口到梢或由梢到口轮浇办法。从此，四百多顷土地可以及时灌溉，产量逐渐提高。费安河对其出

租的土地，每顷收租银六两、十两、二十两不等，以每顷平均收十两计，每年可收租金三四千两银子。由于他除向佃农收地租外，再无其他摊派杂役，所以农民感到种“洋人”的地利索，于是来“洋人渠”流域种地落户者逐渐增多。

按照费安河的意愿，除出租地外，在教堂附近雇工耕种了近二百顷土地，种植小麦、糜子、薯类、菜蔬、葫麻等作物。小麦亩产达九斗（二百七十斤）以上，若平均亩产以二百斤计，年产量达三四百万斤之多。于是他在扒子补隆修建了二十多个库房，贮存粮食，还在教堂附近设立十个耕作区，每处都设有场面和临时存粮的地方，编为一至十号。如今七号、八号、九号等村，即原来的第七、八、九场面所在地。

随着农作物产量的增加积累，费安河还经营了其它各业：设油坊一处，雇工榨油，经常储存食油两大柜，约达二千斤左右；开碾磨坊一座，加工粮食以供食用；设专人放牧，计有马三百匹、牛二百头、羊一千只；设专人育树种菜；派专人打柴、做饭、侍俸牧师等等。各种农工、技工、杂工及侍俸费安河本人的仆人等最多时达二百人以上。

费安河在家业扩大后，设立长老一人，由萨

县人所谓道深名高的段世斌担任，负责协助牧师进行传经讲道等教务大事；设执事一人，由白锦玉担任，负责协助牧师办理有关教会事物杂务等项；设记帐先生一人，由王瑞担任，人称“坐柜先生”，负责记载收支帐目；设总管家一人，由敖老虎担任，负责督促榨油、碾磨、放牧、打柴、做饭等工头，各执其事。至于费安河本人不仅是传教、经营各业的主宰者，而且是现金财物的保管支付者，故人们称他为“掌柜的”。

在“掌柜的”主持下，每逢礼拜对所有到会的教友和非教徒，一律招待一顿美餐。所谓“礼拜礼拜，卷子（花卷）烩菜”，即由此时流传在民间，信教人数逐渐增多。接着他向五原、大余太等地派人讲道，继而设立分会，其传教活动的地区范围逐渐扩大起来。

5、兴办教育 抚育婴孩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时，来到“福音堂”所在地——扒子补隆居住的人口更为增多。费安河为了让儿童识字并从幼少年起即培养具有信仰基督的心灵，于是聘请二王先生为教师，招收十几名学生，学习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以及圣经中的一些警句。这是扒子补隆有史以来最早的学校。

民国三年（1914年），费安河成立了教

会主办的“育英小学”，按蒙汉分校授课，汉校男女生分班学习。校长由费安河担任（民国十一年由安牧师担任）。蒙校先由二王先生负责并教学，后于民国八年由蒙藏学院毕业的韩文源负责教学。汉男校由程自铨负责，由程及其他四位教师教学；汉女校由毛安乐负责，由毛及王州馨等教师教学。蒙生以学蒙语蒙文、算术为主，汉生以学国文、算术为主。蒙生约二三十人，汉男生八九十人，汉女生二三十人，共一百五六十人。以后随着形势的变革，改为县立小学，学生四五百人，学制为“三、三”六年制。这是执子补隆在“育英小学”基础上，演变成当时比较正规的小学校。

育英小学所需要的教师工资、学生课本文具用品等各项费用，全由教会负担。凡学习成绩优良者，由教会花钱送往外地深造。计送往北京者有小尔居白彦、尔居巴图；送往西安者有段子高、毛静斋·路鸿德；送往张家口者有段子光、侯升阁；送往归绥者有曹继贤、王世英、崔继章；送往萨县者有王明德等人。

教会学校不仅培养出许多忠实信徒，成为传教的骨干力量，而且也确实为社会上培养了不少人才。据统计从育英小学、执子补隆小学毕业，转赴外地逐级深造，而今担任部长级、师团级、

总工程师级者不乏其人，任科局级和一般干部者更为数不少，总共参加了革命工作者达一百五十多人。

在办小学的同时，费安河于正庭后面，修建了婴儿院，由他的女人詹尼·玛丽亚，收容了六名孤儿，尽心抚养。所需的衣服、被褥、吃食、杂用等费用，全由教会负担。他们从小就培养孩子们信奉“上帝”，以期长大成人后成为忠实信徒。孩子们与费安河的女儿威望，一块学习玩耍，生活得愉快。由于他们都无父母，个个赐姓为“费”，有费兰香、费素兰、费汝香、费棠香、费汝几各玛、费梨香。

6、费安河歿 牧师争利

民国九年（1920年）七月，费安河长途跋涉，去张家口接其女儿威望返扒避暑，途中染斑疹伤寒症，医治无效，逝世于张家口，生年五十五岁。其女人詹尼·玛丽亚，由于悲痛忧伤成疾，于民国十年（1921年）夏病故。他夫妇二人合葬于扒子补隆西树园。费安河来华传教二十余载，他以谦虚和蔼、不骄不躁，任劳任怨，赐人恩惠等作法，使不少蒙汉人民得到好感，所以在其死后吊祭者约近千人。其信徒靳春圃、王卓甫、段世斌等多人，于民国九年岁次庚申菊月中浣，立碑以示悼念。其女儿威望以后回国。

民国十年（1921年）冬，美国“协同总会”认为扒子补隆教会不能无人主持，于是调遣曾在甘肃、兰州传过教的瑞典人郭发兰到扒子补隆教会任牧师。

民国十一年（1922年）春，“协同总会”又调派曾在陕西西安一带传过教的美籍瑞典人旦乐森（又译为旦尼尔森），也来到扒子补隆教会任牧师。由于他身材很高，人称“旦不浪牧师”。同年夏天“总会”又从美国选派安××（有人称安德森不准确）也来到扒子补隆。

他三人先后来到扒子补隆以后，为了争权夺利而产生矛盾，闹得长期不和。郭发兰认为他奉命主持教务，掌管财经大权名正言顺；旦乐森、安××牧师也认为他们掌管支配这个教会的一切理所当然，各持己见，各有遵循。后来由于旦、安二人勾结在一起，拉拢教会中的一些华人，共同排挤郭发兰，企图逼迫郭发兰自动离扒而后已。谁想郭为人耿直，性格倔强，他坚持按“总会”的调遣办事，纵然掌不了权，也要坚守岗位，至死不离扒子补隆。于是郭一人住在大庭后院，由阎四牛当佣人。他按时参加礼拜，平常给人看看病、传传教，与此同时，接二连三向美国“总会”上报告打官司。可能因路途遥远，也可能因“总会”内的意见分歧，矛盾长期得不到解

决。

旦乐森上任以后，把他的女人（系大夫）及两个小孩，安置在教会里居住。不久安××牧师与山东教会的一位教师结了婚也住教会。他们觉得住宅窄小不舒适，于是大兴土木，在正庭后面又修建了东西两个庭。美国式样，砖木结构。东庭由安××牧师居住，西庭由旦乐森牧师居住。此外在他们的宅后，挖了个冰窖贮存冰块，以备夏季冰镇食品。

民国十二年（1923年）安××牧师因病逝世，葬于扒子补隆。其女人以后回国。美国总会派美籍芬兰人聂尔门来扒子补隆任牧师。聂到任以后，仍然为主持大事者，郭发兰仍住在后院，无权过问一切。

聂尔门为了再扩大财经收入，曾请示“总会”批准，向达拉特旗王爷租得五原以东水地四百顷，连同赔款地四百二十五顷共达八百多顷，实际亩数约达千顷。他把租到的土地转租给农民耕种，再索收租金，归教会享有。

这年，“洋人渠”因黄河泥沙沉积游塞不畅，如果疏挖渠床，工程繁重，费用庞大。聂尔门虽然不是水利专家，但却有高深的文化水准。（美芝加哥大学肄业）他到渠口引水处用水平仪进行勘察以后，决定在原引水口的下游处重新开

口，以倒扬水法引水入渠。当时许多农民甚至连开渠有经验的人都不同意，结果按他的设计施工引水，因新开口处水位高，聚水深广，果然畅通无阻。

民国十三年（1924年），“总会”派普博爱来执子补隆任牧师，仍与聂尔门为一派与郭发兰对立。本年旦乐森回国。

民国十六年（1927年），聂尔门也回国，由普博爱主持教务大事。

7、教会分裂 放垦收地

民国十八年（1929年），广大贫苦农民，有了获得土地的强烈愿望，于是在达拉特旗呈报放垦土地以后，驻五原县的第五垦务分局，将原安北境内“洋人渠”域的土地，除留给教会数顷外，其余分等定价，宣招人民购领。原租种教会土地的教民，都认为地属教会所有，“耶稣至上”，官庭岂能中途撤收重新丈量？深信有“主”保佑，徘徊观望，不肯向垦务局登记购领。而普博爱也不许可教民购领，惟恐丧失其拥有大量土地的特权。结果大部分土地尽归非教民购领而去，教民求救于牧师，牧师无能为力，祈祷耶稣，耶稣也不显灵。从此，“洋人渠”改名为民复渠，由绥远省包西水利管理局管辖。

普博爱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到绥远省交涉，

阻挡放垦，要按清朝政府签定的条约规定办事，然而时日拖延长久不见端倪，十分沮丧。后来普博爱又去张家口分会，申请美国驻华公使，向南京政府提出抗议，企图挽回败局，恢复旧规定，结果仍如石沉大海，只好垂头丧气重返执子补隆。

接着普博爱以任期已满为由回国。在国内结婚以后，于民国十九年（1930年），带其女人又踏入我国领土，来到执子补隆领上尔居巴图、毛生银二人前往宁夏定远营神召会上任。

民国十九年（1930年），美国“总会”派昭和教会的李德洪，来执子补隆任教师。他在途中疑神疑鬼，惟恐发生意外，结果走到包头至安北之间，果然遭到抢劫，所带财物被掠一空，十分惊惧，他能留下一条命就感到万幸。李德洪上任之时正值官府收地放垦无法开脱之际，达拉特旗王爷提出，要收回教会租种的四百顷土地，李德洪以原系永租地，“许退不许收”为由，再三不退，旗扎萨克坚决力争反对，他只好把租地如数退归达拉特旗处理。

另外教会中的些华人，鉴于形势转变，如不购领些土地，一旦被非教徒全部购完，他们将无法生活。于是也向垦务局登记购领了部分土地，谁想李德洪到任以后，仍坚持四百二十五顷土地归教会所有的立场，强迫教徒们把购地

地照交出，他准备去国民政府换成外国地照。购地的教民，向五原垦务分局讲了这些事实以后，垦务分局为了维护放垦土地的合法权利，便查照存根另开了证明文约。这时，约一百多名教徒，与“洋人”离心离德，当李德洪准备坐汽车进京之际，被大家挡住没有走成。

从此，教会内出现了两派：一派为“西差派”，即以洋人为首，坚持按清朝政府条约办事，认为四百二十五顷土地应归教会所有。在这一派中又可分“神召会”“安息日会”等等；另一派可谓“中华派”，全部是华人，主张按民国政府规定办事，认为洋人可以传教，但不应掌管财经大权。这一派中又有“中华自立会”、“中华基督教会”、“耶稣家庭”“聚会处”等等。

教会分裂之后，李德洪为了维护其总领地位，进行改组。即在牧师下组成委员会，设委员七人，其中一人任委员长。委员长在牧师支配下，总揽一切生产、事务、财经事宜。而“中华派”反对这种作法，坚持仍设长老、执事制办事。长老由毛安乐担任，执事也更改了人选（名不详），其矛盾日益明显激化。

8、洋人绝迹 教会独立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扒子补隆开始有个别户盖房作小买卖。民国二十四年（19

35年)，大部份教民和非教民，在扒子补隆桥北大路两侧，修建商店住房。但又遭到李德洪无理阻拦，有的户已盖起半截房子，被李德洪推倒，其理由是在教堂的地界内进行建筑，有损他们的利益。这一举动遭到群众的反对，教徒李书顺出头去归绥告状。省城派人实地调查并清丈了土地，结果宣布群众的占地与购领的土地面积相符，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筑房舍铺面，完全合理合法。闹得李德洪十分尴尬，束手无策。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李德洪带上其女人及两个孩子（叫达尼，地地）去宁夏定远营，投靠神召会，并把夺得教民的购领土地执照带走，妄图待机再向政府换成外国地照。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日寇投降后），美国总会派巴××牧师（名不详）来扒子补隆，向教会交接手续，然而这时教会财产无几。因为民国十五年被国民军军长胡经义抄走二百多匹马，宰杀吃掉数百（头）只牛羊；民国十八年以后，除扒子补隆附近约留五顷多地外，其余赔款地，重新丈量垦种；租种地四百顷归还达拉特旗；仓库存粮，因闹荒年借给农民吃了二年。当时仅留下二十多匹马，少数牛羊托人代牧，以后逢年过节，逐渐宰杀吃掉。所以巴××将剩余财产移交给教会主持人（华人）后回总会复命。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美国总会派耿赛尔牧师，乘坐他的汽车，带上女人及小孩和奶羊，由昭和来到扒子补隆，调解郭发兰告状打官司一案。动员郭发兰回国，不要再告，闲住生气。而郭发兰坚持己见说：“如让我回国也可以，但美国总会必须公开道歉认错，还要赔偿其数十年的损失，否则宁可死在扒子补隆也不回国”。耿赛尔无奈，只好到处游览一番后他去。郭发兰仍住在扒子补隆。

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在解放前夕，耿赛尔全家和包头教会挪威人白××教师（名不详）相随，逃赴兰州，全家坐飞机，到香港然后回国。白教师没赶上飞机，于是她又骑上毛驴由伊盟绕道返回包头转去北京，解放后遣返回国。

这年，郭发兰病故，由包头内地会瑞典人瑞××牧师（名不详），来扒子补隆治丧，投标拍卖了郭的衣物财产，连同遗书寄回国内。郭发兰葬于西树园。从此扒子补隆再见不到一个洋人传教了。

一九四九年，“九、一九”绥远省起义以后，在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下，安北的“中华基督教会”、“耶稣家庭”、“聚会处”照常进行礼拜活动。

一九五〇年，“中华基督教会”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整顿改革工作，把个别不纯分子且在教会内担负重要职务者清除出会，以民主讨论的方式，解决教会重大事务。这年随着新政策的颁布执行，教会内的师荣庭在取得大家的同意后做了三项工作：

首先是，在政府开展减租减息运动时，教会主动提出对出租的土地，一律不收租金，把五顷多可耕地连同地契，交给农村，为土改工作创造了条件。

其二是，对外国传教士留给教会的桌椅、用具以及医药器械，详细造册一式三份，报送安北县委、县政府备案。

第三是，建议党政领导批准，以外国人留下的医药器械为基础，开办卫生所。得到了领导批准，于是把所有药物器械移交卫生所使用。

一九五一年，师荣庭被选为执事长，他觉得同是信仰基督的教徒，但却有“中华基督教会”、“耶稣家庭”、“聚会处”等名堂，不便于传教和领导，于是倡议三个教会合并起来。经过一定的工作和商讨以后，取得一致意见，三个教派实行合并，改名为“安北基督教会”，并对七人的执事委员会进行了调整，吸收了“耶稣家庭”、“聚会处”等教派中的领导人参加。从此，

“安北基督教会”正式成立，它是不受外人干涉把持的独立自主的教会。特别是在河套地区建立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以后，安北基督教会和其他教会一样，向反帝爱国的大道上迈进。

传 播 基 督 教 士 简 况 表

226

姓名	国籍	籍贯	来安年月	大事	记事	要离	去年月	去向	备注
马△△	瑞	瑞典	光緒二十三年 (1897年)	他与另外三名牧师，由库伦来安北，在北山、余太一带传过教。		不	不详	不明	来安年月为大约期
费安河	美瑞	美瑞	光緒二十四年 (1898年)	光緒二十三年到张家口，学习蒙汉语一年，二十四年来扒，义和团起义时，杀死同行传教士四人，他只身逃往恰克图之北俄境内，后到库伦任翻译员，光緒二十八年办教案，获得赔款地四百二十五顷，开“洋人渠”，办学校，民国九年接其女儿返扒时染病死亡。		不	民国九年七月 (1920年)	死亡	其女玛丽亚，于民国十年故，与费安河合葬于扒子补隆，其女儿回国。
沙 立			光緒二十四年 (1898年)	在安北北山及余太一带传过教，被义和团杀害。			光緒二十六年 (1900年)	被杀害	
曾 脱			光緒二十四年 (1898年)	在安北北山及余太一带传过教，被义和团杀害。			光緒二十六年 (1900年)	被杀害	

安得生	瑞典	光緒二十四年 (1898年)	在安北北山及余太一带传过教，被义和团杀害。	光緒二十六年 (1900年)	被害	系女教师
卡拉辣	瑞典	光緒二十四年 (1898年)	在安北北山及余太一带传过教，被义和团杀害。	光緒二十六年 (1900年)	被害	系女教师
郭发兰	瑞典	民國十年冬 (1921年)	原在甘肃兰州一带传教，协同总会调遣来扒，遭到其他牧师反对，他坚守岗位打官司，直到死亡。	民國三十年秋 (1949年)	病故	葬于扒子补隆
且乐森	瑞典	民國十一年春 (1922年)	原在陕西西安一带传教，协同总会调遣来扒，带女人及两个小孩，修筑后院东西庭。	民國十三年 (1924年)	回国	有译名为且尼尔森者
安德森	瑞典	民國十一年夏 (1922年)	由协同总会调遣来扒，与山东教会教师结婚，修筑后院东西庭。	民國十二年 (1923年)	病故	葬于扒子补隆，其女人回国
聂尔门	美芬籍	民國十二年春 (1923年)	由协同总会派遣来扒，向达拉特旗王爷租地四百顷，改修过“洋人渠”渠口。	民國十六年 (1927年)	回国	

- 普博爱 瑞典 民国三十三年春 (1924年) 由协同总会派遣来扒，阻挡华人收回赔款地，民国十八年回国，结婚后经扒去宁夏定远营入神召会。 民国十八年 (1929年) 回国
- 李德洪 美国 民国十九年 (1930年) 原在张家口昭和传教，奉协同总会调遣来扒，带女人及两个小孩，维护满清赔款地规定，不许群众修住房商店。 民国二十五年 (1936年) 宁夏定远营
- 巴△△ 瑞典 民国三十四年 (1945年) 奉协同总会之命，来扒子补隆向当地办理教会交接手续。 不详 回国
- 耿赛尔 美国 民国三十五年 (1946年) 奉协同总会指示来扒子补隆解决郭发兰的问题，自备汽车一辆，每去一处都带女人、小孩及奶羊，民国三十八年全家逃往兰州飞香港回国。 不详 他处传教
- 瑞△△ 瑞典 民国三十八年 (1949年) 为郭发兰治丧，拍卖了郭发兰的衣物财产，寄回本国后返包头。 来安不久 包头
- 白△△ 挪威 民国三十八年 (1949年) 随耿赛尔去兰州，准备回国，耿赛尔一家飞走，她没赶上飞机，又经扒返包头，解放后回国。 来安不久 包头 系女教师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巴彦淖尔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

作者 =

页数 = 2 6 6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目录
正文